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16期

【思想文化】

Exit：一个有出口的革命
——文革随感录之二/老方

【百年中国】

对党内斗争的看法/吴忠口述 陈楚三、李大震整理
画说我的一生（20）/刘海鸥
——继续革命无止境（1968-1976）

【评论】

试析蒯大富们制造的清华“两案”/陈楚三

【述往】

父亲经历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王端阳

【口述与访谈】

《上班记》选载（一）/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
1. 北图编目员 2. 教书西北大学
我的一生——从广东台山到内蒙古/叶林
附：悼叶林/贺乃斌
我拼命喊：“不能打！”
——北京师大二附中吴淑欣口述/季烨记录整理

【资料】

关于孙蓬一的资料与书信（二）/胡宗式 章铎 编辑整理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Exit: 一个有出口的革命

——文革随感录之二

老方

1966年6月至1968年8月的中国，很像一个剧场，剧场有舞台，有观众席，有进口也有出口。那两年，不是专政对象的国人都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当演员，也可以做观众，可以进剧场看看热闹，也可以出剧场自在逍遥——下下围棋，看看闲书，打打毛衣，做做家具。这一点很重要。它说明，毛可以统一思想，但不能统一兴趣。王小波说，天下的事分两种，一种是有趣，一种是无趣。剧场里的人觉得文革有趣，剧场外的人觉得文革无趣。充其量，他们不过是剧场外的旁观者。

这些人，研究文革的称之为“逍遥派”。这是一个松散的，庞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的群体。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用各自的理由，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游离于运动之外。¹

1966年文革初起时，除了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有问题的之外，北京高校的多数师生都投身到运动之中。但是，人数和热情随着时间和派争而递减。清华大学教职员加上学生总计24000人，井冈山号称九千人，414号称七千人，总共16000人，其余的八千人哪儿去了。北大有学生9000多人，教职工大约7000多人，加起来总共16000人。新北大公社最盛时号称七千人，井冈山号称五千人。两派相加，最多时有12000人，其余的四千人在干什么？北师大教职员和学生近一万，谭厚兰的井冈山人数最多时达五千人，王颂平的造反兵团总共不过二百人，两派加起来不过5200人，另外的二分之一何在？

¹ 出口（退场口）这个概念，最早是叶维丽提出来的。史丹福大学的Walder教授在《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书中说，文革中对立的两派之所以打得你死我活，是因为，他们争的既不是利益，也不是权益，而是怎样才能“不输”。因为如果输了，后果严重，会影响到失败一方今后的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谁也输不起。叶维丽撰文提出两点质疑。第一，她认为，在Walder的眼中，只有参与运动的两派，没有不参与运动的人群。而事实上是，这个松散的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变越大。文革是个有“退场口”的运动，这个群体的存在，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但往往被文革研究者忽略。这个群体生存空间的出现，也说明文革中的中国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漏洞百出。第二，她认为，Walder对两派“铁杆”缺乏深入了解。除了有“利害输赢”的权衡之外，还有“信念”的坚守。那代人里不乏不计利害、“走火入魔”的。“唯我独革”、走极端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叶维丽：《亲历者的感想——〈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读后》，见《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台湾，秀威，2012，第344页。）

运动的时间越长，参加的人越少。武斗时人最少。清华百日武斗，双方加起来不过五六百人。连团派中的鸽派也卷行李走人了。北大武斗时，两派加起来也不过四五百人，大批学生连夜逃亡。北师大井冈山围剿造反兵团时，双方加起来也不过二百余人。余下的或走或藏。

我问过清华大学的老五届，文革造反那两年，什么时候来学校的人数最多，人家告诉我：每月领粮票的时候，来校的人数最多。相信全国高校皆如此。

何兆武先生说，“我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一生满足于旁观者的角色，不过是浮生中一个匆匆的过客。这就像演戏一样，何必人人都上台表演，做个观众不也很好？如果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观者，能够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相信大多数人在文革，在毛时代，在政治运动中都有类似的想法。

旁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演戏没兴趣，对剧情不喜欢。更意味着思想人格的自由散漫。逍遥派都是旁观者，冷淡、厌烦、逃避是对革命的腐蚀剂。话说回来，不厌烦也难——文革是极端化，形式化和庸俗化的集大成，有谁天天说着套话空话废话早请示晚汇报而乐此不疲？有谁天天听着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看到的却是满眼凋敝，还会真心地拥护赞美高呼就是好就是好？换句话说，是文革把本初的拥趸、粉丝都变成了旁观者，变成了逍遥派。这种运动能坚持十年，全凭毛还没有咽气。

厌烦反感逃避文革的人们在政治上保守，在思想上远离激进和极端。他们不想当英雄，只想当个平民百姓。他们不习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只想按部就班地过平静的生活。像何兆武先生一样，逍遥派觉得做一个旁观者就很好。他们是“天下大乱”的天敌，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文革亚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小趣味小世界，将宏大的信念信心信仰消蚀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之中。无意之中，他们拉了“继续革命”的后腿，成了时代政治的惰性力量。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这里说的“许多人”应该包括逍遥派这个庞大的群体的，但是，他们的怀疑观望并非因为提高了觉悟，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对剧场对演戏没有兴趣。■

【百年中国】

对党内斗争的看法

吴忠口述 陈楚三、李大震整理

一、党内高级政治生活不正常

我参加革命五十三年了，经历了很多，感到党内斗争很多是偏激、偏重了，正常的也有，少。

我佩服彭老总（彭德怀），同情彭老总，为他平反我很拥护，但我们党内在处理彭德怀问题时有几个站在彭一边替他说话？好像是毛主席一个人做的决定，其实大家都跟上去，都贬彭德怀。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贺老总（贺龙）是土匪，刘帅也这样说²，我很不舒服。总理倒没说。就算是土匪，南昌起义人家是军长，北伐军的军长；洪湖、湘鄂西，两把菜刀闹革命；抗日战争是120师师长，后来又是元帅，为什么要跟着人家说他是土匪？聂老总也这样说啊！³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在中南海批判彭德怀，那时我在机械化师当师长，参加了会议，感觉到会议的气氛不大舒服。不管怎么说，彭德怀是有功劳的，平江起义不算晚。斗争过火了。比如罗瑞卿同志指着彭德怀的鼻子训斥：你说长征中我们一军团杀你三军团掉队的人，彭说“没说过”，罗说“说过！”林彪主持会议，在后面说：造谣！可耻！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是感觉很过火、刻薄。林彪讲得更狠了，说彭有野心，原来叫彭得华，要得中华，叫石穿，滴水穿石。唯心得很！没有一个人替彭说话。总理说彭很像冯玉祥，是个伪君子。这样评价彭，我听了也不舒服。陈老总（陈毅）在党内以直爽著称，口才好，他说彭在朝鲜时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饮马洛东江”，要打到釜山，把美国赶出朝

² 刘帅，即刘伯承(1892.12—1986.10)，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八届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8年遭到错误的批判。

³ 聂老总，聂荣臻(1899.12—1992.5)，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中共七届至十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鲜，陈老总以讽刺的口吻说：啊！成了诗人了！我听了很不舒服。彭德怀很冷静，也没发火，庄重地坐着，顶着压力。这次中南海会议，我的印象很不好。

批判彭德怀时，没有一个人站在彭一边替彭说半句话，可能有但我不知道。当然是毛主席要整彭德怀。我最赞成黄克诚同志的讲话，他在谈到对毛主席评价时说的：他受了很多冤枉，文革时搞到山西那么多年。他说，我们当时在中央工作，参加中央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如果都反对，毛主席能犯那样大的错误？我认为他的这个话是很公道的，他不只是指彭德怀的事。有人说，毛主席多霸道，谁敢说啊！我不赞成。你当政治局委员、常委，毛主席讲的你不敢说，不是混饭吃吗？如果大家替彭德怀说话，不赞成那样整彭，我不相信毛主席一个人做决定处理彭德怀。现在好像大家都同情彭，当时是这样情况吗？要公道。这种不公道很不好，对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不好。我对总理很尊敬，可他在九大上的讲话不好，他说，南昌起义的优秀代表、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到井冈山与伟大领袖毛主席会师了。我听了不舒服，历来讲朱毛会师，朱德就坐在前台，总理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林彪那时是连长，和陈毅同志都不能比，怎么能和朱老总比呢？朱德的扁担也在林彪肩上扛？我们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不正常。

为彭德怀平反是应该的，我很赞成；但在庐山会议上谁替彭德怀同志说过话？我赞成黄克诚同志讲的：当时我们在中央工作，中央作出这个错误决定，我们参加讨论、参加研究，如果我们反对的话，毛主席能犯这样大的错误吗？有人说，那不能反对呀，毛主席厉害得很、独裁得很呀！我不赞成。你还是害怕呀，那你当政治局委员、当副主席、常委，不能混饭吃啊！我赞成黄克诚。当然毛主席的责任大，但参加会议的、赞成决定的都有责任。为彭德怀平反时应该说清楚，当时没有给毛主席当好参谋，有责任。黄克诚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我拥护。党风不正。不从这些问题上搞起，不从上面搞起，党风端正得了吗？端正不了！

彭德怀有缺点。反教条主义整刘帅，说把苏联的条令都照搬到中国了，但哪个条令没有你国防部长签字呀！你能说不知道？朝鲜战争180师被搞掉了¹，彭说：不是说刘瞎子的部队能打仗吗？怎么不能打啊？这个话说得不像话，部队是归你指挥的，怎么能怪刘帅？还刘瞎子呢，不尊重。刘帅德高望重，教条主义作

¹ 朝鲜战争180师被搞掉：1951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三兵团六十军180师由于上级指挥失误等原因，在后撤过程中陷入美军重围，伤亡二千余人，突围返回四千余人，因弹尽粮绝、近四千人被俘，造成重大损失。

了检讨，说光讲战术不讲战略，军事冲击了政治，检讨很深刻。眼睛看不见，上台都站不稳，主席让他坐下他不坐；肖华不错¹，扶他坐下他不坐，检讨嘛！我看了心里很不是味道，彭老总喜笑颜开。陈毅、邓小平在批刘伯承时说了好话。邓小平说，毛主席讲过，刘很支持政治委员制度，对政委很尊重；陈毅说了好话。这时罗帅²在，也说了刘帅的好话。这次会总政搞得很凶，肖华是副主任，主任是谭政³；肖华很活跃，动员写大字报。我在的小组，组长邓华⁴，副组长程世才⁵，我发言说拥护批肖克⁶的教条主义，但引进这些条令，照抄照搬，总政什么态度？是反对还是赞成？我认为总政是赞成的，发文号召大家学习五个条例，怎么都成了肖克的、刘伯承的？总政一点责任没有？为什么没有自我批评？好家伙，我发言时总政姓邵的一个处长刷刷记录，整理好要出简报，叫我修改，准备整我。我一看记得很好，都是我的话。没什么可改的；再一想，简报一出来不就要批判我？会议有规定，发言允许收回，我就宣布收回发言，简报上一句：吴忠同志的发言已收回。熟悉的同志问我发言内容，为什么收回？我说没什么，只是给总政提了点意见。我知道不会放过我的，果然机械化师反教条主义搞了43天。

那时机械化师有好多苏联顾问，苏联是一长制，“师长决心图”“团长决心图”等等，我们有政委，应该是“首长决心图”，包括政委、副师长、副政委，是集体领导。有位老兄揭发我教条主义，说我玩弄语言技巧，耍花招。重点是批参谋长，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反教条主义，我对彭老总印象不好，总政推卸责任，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后来又收回了；当时黄永胜也发言提了意见，家属问题等，甘泗淇⁷发言好一顿批判黄永胜。

¹ 肖华(1916.1—1985.8)，历任解放军空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1975年后，历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² 罗帅，即罗荣桓元帅，“罗帅”是广大军政干部对罗荣桓元帅的敬称。

³ 谭政(1906.6—1988.11)，历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受到错误的批判；1975年任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⁴ 邓华(1910.4—1980.7)，历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⁵ 程世才(1912.8—1990.11)，历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⁶ 萧克(1907.7—2008.10)，历任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后任农垦部副部长，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

⁷ 甘泗淇(1904.12—1964.2)，历任第一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宣布说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听了很反感。她这样讲话，我们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指责过她吗？我没听到。当时在场的中央领导不会太少，她哪有权力讲这些话？不正常。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就是专案组搞了一个材料，江青第一个在材料上批的，说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传阅传到康生，康生把江青歌颂了一番，总理也把江青批的这段话歌颂了一番，这都有档案。看起来好像是毛主席给刘少奇定的叛徒、内奸、工贼，我看不是，他相信了这些材料，偏听偏信。有的同志对主席说：主席，我有错误；主席说：我的错误比你大，偏听偏信。当然这些话没有向下传达。

我到了卫戍区，首先要看卡片。卫戍区在公安干校、交通干校、四方庵（音）监护了很多人。那时温玉成¹副总长兼卫戍区司令，我是第一副司令，政委谢富治、吴德等几个。我看相当一部分被关的人是总理批的，有的是总理建议、毛主席同意，林彪跟着同意、完全同意。当然，总理这种做法也是好意，隔离起来群众就不能随便斗了，不受喷气式的苦了。张霖之²是中央委员、煤炭部长，被活活打死，总理讲过好几次“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很沉痛。张霖之性格爽直，很公道。我说过，幸亏我在军队工作，如果在地方，非打死我不可，因为让我低头我不干，不干就打，打我也不干，狠打不就打死了吗？在锦州时，要在地方工作就被打死了。总理的意图是保护这些同志，有些先后出来工作了，对总理很感激，万里³同志就是一个。在广州当过市长的朱光⁴怎么死的，我不清楚。

贺老总有一段住在西山，是总理的房子，总理让他住的；下面一栋是乌兰夫⁵同志住。电影上，老部下看望他是隔着铁窗说话，哪来的铁窗？房子怎么能没有水，还要接雨水？不对嘛！虽然电影允许夸张，但要有历史的真实性，人家要

¹ 温玉成(1915.10—1989.10)，历任解放军四十军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四十军军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² 张霖之(1908—1967.1)，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中被毒打身亡。

³ 万里(1916.12—2015.7)，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城市建设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铁道部部长、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⁴ 朱光(1906.11—1969.3)：历任广州市副市长、市长，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对外文委副主任，安徽省副省长等职；文革期间在合肥被迫害致死。

⁵ 乌兰夫(1906.12—1988.12)，历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绥蒙分局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问贺老总在哪个监狱，谁能回答？这样把历史搞乱了。九大时，贺老总很高兴，穿上他的衣服，但九大没让他参加，他情绪很不好，后来就病了。《元帅之死》按这个写法，历史的真实性在哪里？很多人说我傲气很大，我参加革命是干革命，一不混官做，二不混饭吃，因此不需要投机，不需要溜须，不需要拍马，不需要搞鬼。总理对贺老总一直说好话，杨德中最清楚，他是总理的联络员。

被保护的同志当时很感谢总理，但现在是否赞成总理用这种方法保护他，我看不见得！当时感激，现在是否还是当时的那种心情，不见得！好多同志只说文革中关了多少多少年，没听说哪个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总理关你是保护你。

我到卫戍区，对监护人员状况改变了不少。如罗瑞卿的腿，他两个腿都断了，解手、特别是大便时在洋灰上碰，都要出血，疼得要命。曾绍东介绍时光讲情况，不讲措施；我让他找人做一个高马桶，使罗瑞卿在拄双拐的情况下可以坐到马桶上，不着地，这样就可以不流血了；后来拖延了四五次，曾说：谁负责任？我说：你去做，我负责任！做好后罗瑞卿同志解手时腿不着地，不疼了，喊毛主席万岁，其实毛主席知道什么，是我给他搞的。我知道这类事如果在办公会上讨论，就做不成了。我想过，有人会说“彭罗陆杨”啊，你什么感情？”我会回答：要有起码的人道主义吧！有人“左”得出奇，极“左”在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了。

二、要说公道话，不报复、不整人

我是1968年5月13号到北京的，杨余傅²事件以后，担任第一副司令。党内这样的事很多。原来司令员傅崇碧，书记黄作珍³，现在改组了，我和杨俊生来。到新的单位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超脱，不要整老班子的同志，不要添油加醋，尽量对原来班子的同志说些公道话，这样有利于团结。我们党内每一次运动都是搞过的时候多，过分，其实查清后不见得有多大问题。第二种做法我也见

¹ 彭罗陆杨。1965年底至1966年5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先后受到错误批判，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² 杨余傅。1968年3月22日，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突然宣布解除职务、关押六年之久，称为“杨余傅事件”。

³ 黄作珍(1914—1991.1)：历任华北军区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第六高级步校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军军政委，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二政委、政委，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过很多，为了让组织上更信任你，就狠整老班子的同志，对被调出去的、对靠边的狠整，是私心杂念，讨好上级领导，把问题搞得过分，无限上纲；以后问题查清，无限上纲的东西谁负责？把原来的班子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做法很多，后果都不好。所以我到卫戍区，采取前一种办法。

我刚来，温玉成在西单召集卫戍区四个师的团以上干部开会，批判杨余傅，主要是批傅崇碧，我说刚来还不熟悉情况，没参加。杨俊生同志比我晚到十天，我说西单招待所团以上干部会我们俩不参加，因为不了解情况，杨俊生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一起下部队，四十多天的会一次也没参加。

我到卫戍区时文化革命已经三个年头。我想，改组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意味着组织上对原班子不信任，对新班子信任。新班子对原班子有两种做法，你搞过头的东西不一定让组织上更信任你，对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有什么好处？查清问题后，你搞的过头的东西谁负责？当然是你负责。

西单招待所的会议简报等材料送给我们，我和杨俊生同志一份都没看，也不画圈，也不批字。会议结束，让我们去西单招待所见见团以上干部，我们去了。

杨俊生同志到后，卫戍区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师以上干部、卫戍区机关干部参加。杨俊生同志要我代表两人讲话。我从40军带来的秘书李维赛同志对我说，讲话还是要讲部队的优点、机关的优点，我说对呀，我们这几天一面看一面议论过，机关很好，部队也很好；我让李维赛起草讲话提纲，肯定了部队的优点、机关的好作风。

傅崇碧原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卫戍区司令，谢富治是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黄作珍书记，刘绍文¹政委。说傅崇碧带枪冲钓鱼台、冲中央文革，江青加的罪名。九届二中全会后的华北会议上，毛主席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说陈伯达在军队没有职务，为什么常到北京军区、内蒙、山西各地巡视？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会议批判李雪峰²、郑维山。江青到会，讲傅崇碧冲钓鱼台，皮包里有四支手枪，用皮包打她的脊梁骨。实际上是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有癫痫病，跟着傅崇碧进去，看到江青发脾气，犯病了，一下子倒下去，皮包摔

¹ 刘绍文(1912—1981.6)：历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副部长，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北京卫戍区副政委、政委，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² 李雪峰(1907.1—2003.3)，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出去，离江青近一点，她就说打她的脊梁骨，皮包里还有手枪；马上姚文元说：我可以证明，皮包里是手枪，后面车上还有机关枪。荒唐之极！司机都在，哪里有什么机关枪？手枪是保险柜里找到的，不是皮包里面。以后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华北组会议，她一来冷气不能开了，大家热得受不了。她突然手一伸说：吴忠同志，你还欠我的账呢！我莫名其妙，没回答。回来后问吴德同志，吴德也不清楚；我说，是不是江青说傅崇碧带枪冲中央文革，姚文元作证说后面车里还有机关枪，现在傅崇碧下去了，你吴忠应该写个材料、搞个证据向我报告，江青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吴德说也有可能。此后我没做出反应。九一三事件后，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华北组在陕西厅，江青又来参加了。会议期间江青又伸手说：吴忠同志，你还欠我帐呢！我也没头没脑地说：搞了四五个人，调查了好久，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她也没再追问。

我受审查期间，傅崇碧来看我，我说，我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说，我不欠傅崇碧同志的帐。四十多天的团以上干部会我没参加；送来的材料我没看，没画圈，也没批字；我讲话没说过部队被傅崇碧搞坏了；江青两次伸手说欠她的帐，我也理解她的意思是要搞个假证据，我没讨好江青整你傅崇碧，不欠你的帐。我和傅崇碧讲过几次不欠他的账，至于他欠不欠我的账是另一个问题。

我的性格，别人整过我，我翻过来得势了，绝对不整别人；我认为，给人家搞莫须有的罪名，为讨好上面而狠整别人的同志是小人，如果我得势了反过来整你，来报仇，我也是小人，一样的货色！我一生中没做过这样的人，反而过去整我的人挨整时，我替他们说话，阴法唐¹就是一个。

阴法唐当团政委时我当旅长，民主大会给我提意见，尖酸刻薄。文化大革命时整阴法唐，他是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说他是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我就不服气：阴法唐又没有夺你司令政委的权，又没有夺你西藏军区党委的权，支左是党委，副司令、副政委、司令、政委去支左嘛，怎么他成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呢？斗他的时候很紧张，我让他小孩转告，叫他来我这里一趟，派车把阴法唐接到家里，告诉他检讨要实事求是，不是你的事不要安，要沉住气，不要紧张。后来被搞到盘锦农场劳动，养猪，手都拳不拢了，他老婆去看他，我让四十军接待，给

¹ 阴法唐，生于1922年7月。历任解放军师副政委，西藏江孜军分区政委、中共西藏江孜地委书记，对印反击作战前进指挥部政委，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第二炮兵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大校，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

派车送到盘锦农场看望阴法唐。后来我又打电话给六十四军同志（那里归六十四军管），说阴法唐打仗很好，工作很好，身体搞坏了以后怎么工作？六十四军就让他疗养。他小孩当兵，妹妹当兵，我都办了，我不怕犯嫌疑。阴法唐解放时，我给陈锡联同志讲，他就是中印边界反击战¹时 419 部队²的政委，打仗很好，陈锡联安排阴法唐担任辽宁省军区政委，后来总政安排他到福州军区当副主任，以后又担任济南军区副政委，从济南又到了西藏。我没有因为他给我提意见尖酸刻薄，在他倒霉时就落井下石。

我们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坏就坏在这个问题上。你整他，他翻过来又整你，没完没了，地方也是这样。

总之，到一个新单位，特别是改组班子的单位工作，取第一种做法是妥当的，取第二种做法是有私心杂念的，起码是缺乏经验。党内这种情况，采取第二种做法的人比较多，采取第一种做法的人比较少。但我不搞鬼，不能保证别人不搞我的鬼，所以到北京工作后我高度警惕。文化革命，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我没有陷在林彪、江青、四人帮里面去，说明高度警惕是对的，是成功的。❏

作者简介：

吴忠（1921. 10. 21—1990. 2. 26），1955 年授予少将军衔。1970 年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1976 年 4 月“天安门事件”，吴忠拒绝“劝阻”群众到天安门广场送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当中央命令清场时，吴忠擅自把政治局规定的清场时间推迟两个半小时，避免了流血惨案的发生。1976 年 10 月，吴忠和北京卫戍区领导紧密配合控制要害部门，抓捕“四人帮”余党迟群、谢静宜、金祖敏。

1987 年离休，1990 年 2 月，因车祸不幸逝世，终年 69 岁。❏

¹ 中印边界反击战：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种下中印争执祸根；印度独立后继承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不断侵占中国领土，支持、怂恿藏独势力，无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蓄意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为保卫边疆安全，回击印度的疯狂挑衅，中国于 1962 年 10 月 20 日开始发起自卫反击作战，至 11 月 21 日基本结束，中国军队主动停火、后撤，释放被俘印军官兵。

² 419 部队：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 18 军 52 师代号为“藏字 419 部队”（作战前期曾为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阴法唐是政委；该部队在克节朗之战中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获其旅长，又参加了全歼印军 62 旅和炮 4 旅的西山口-邦迪拉之战，击毙 62 旅旅长，战绩卓著。

【百年中国】

画说我的一生 (20)

——继续革命无止境

(1968-1976)

刘海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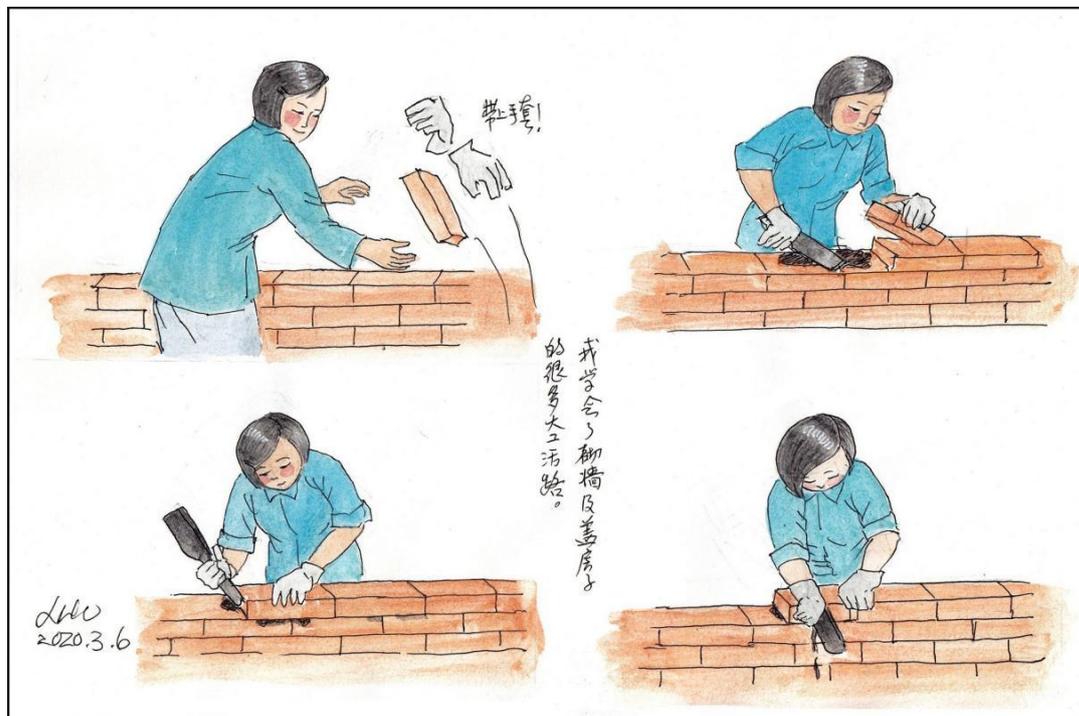


相比起搞运动和教书这些让我日夜焦虑不安的事情，我宁肯干活，尽管累，至少能让我在精神上彻底放松。身处农村的学校，我们劳动的时间多得是。五十来个老师，加上几百个学生，对于农民来说是不付任何代价的劳动力，各大队都抢着要。春耕播种，抢三夏，战三秋，冬天修水库挖水渠，都少不了我们。此外公社或各大队还经常随意地抽调全校师生去完成紧急任务，比如挠稻秧（把稻秧下面的泥土挖松，并把稗子拔掉），摘棉花，捉玉米虫……干活最多的一个学期，只上了四十七天课。学校由“贫下中农宣传队”领导一切，最方便的事就是拉师生去劳动。

六月底麦子成熟的季节也正是雷雨频繁的日子，为了从雷公爷口中抢粮食，我们要不分日夜地割麦打场。割麦割得腰酸腿疼，最后是跪在地上爬着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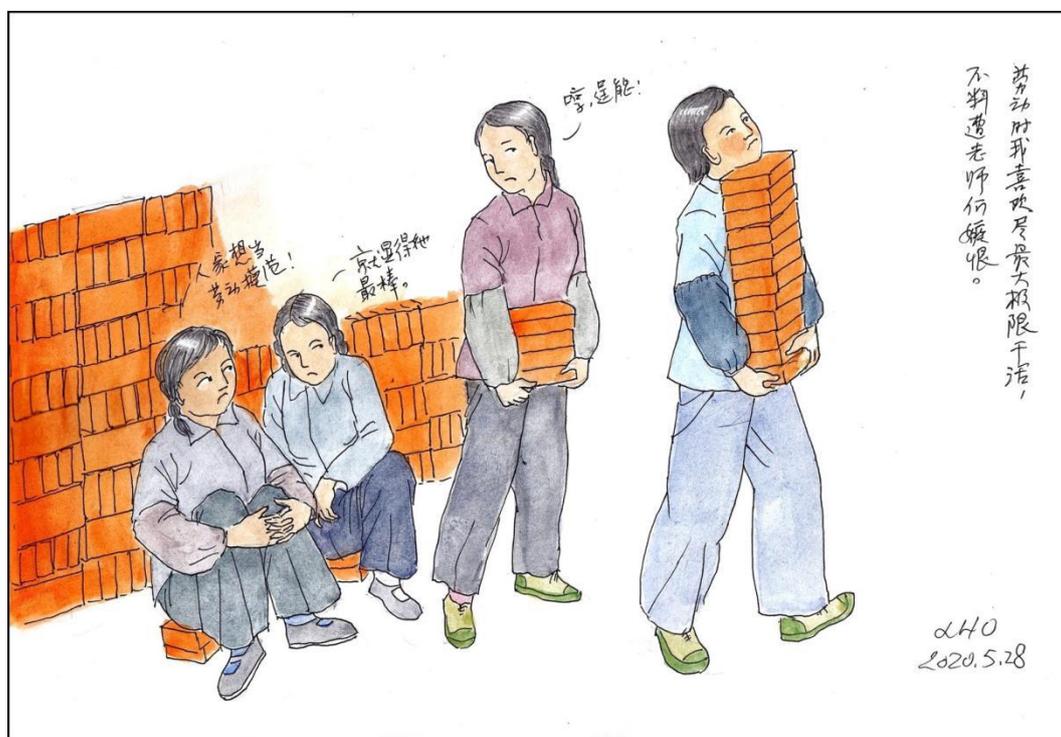


在农村的这些年，我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活，从播种到粮食入库，全套农活都做过。最紧张的是打场，通常是白天割麦夜间打场。这边的人飞快地把麦子送进脱粒机，脱粒机轰响着大口大口吞进麦捆，喷出麦粒，那边的人则迅速收集麦粒，扬场装口袋，一分钟不能停歇。我们盼望机器卡壳，可赢得一两分钟的喘息，这一会儿工夫站着就能睡着。收工时每个人被灰尘麦秸覆盖，只看见眼球在转。



除了农活，学校还自己盖房子，和灰砌砖、“挂袍（抹灰墙）瓦瓦（盖瓦片，第一个瓦读四声）”，小工大工我都能干，新盖的教室有好长一段墙壁就是我砌的砖。

我喜欢干活，出力流汗而已，不必和学生费心。我干活向来生龙活虎，不遗余力。我一直信奉年轻人要在艰苦的条件下磨砺自己，从小就树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信念——为将来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做好准备。干活时倒顾不了信念问题，只是体会着劳动带来的淋漓痛快。我喜欢和男老师一起干活，干男人干的活，干得一点也不比他们差。最能干活的来老师对我表示：“我真佩服你，没准将来我们可以一同干点事业。”听到这话我有点不安，除了党的事业，还有什么事业可干？



我没料到干活也有“政治”（指人与人的关系），即使我甩开膀子沉醉在对劳动的享受中，还是开罪了别人。

一次劳动是搬砖头，一般女老师一次搬四块，年轻一些的积极一些的搬得多些，五块六块。我干活时总愿意让自己的能力达到极限，并非为表现自己，而是挑战自我的一种乐趣，是一种游戏。我一块块地加码，从搬六块一直加到十二块，砖头把下巴顶得高高的，走起路来脚底拌蒜。慢慢地适应了，搬得大汗淋漓，心里特别畅快。我忽然发现一些女老师冷冷地斜眼看着我。然后听见了有人在甩闲

话“人家想当劳动模范啊”。

我听出了端倪——群众想搬四块砖，你搬十二块，就显出你的进步，群众的落后了，但是我不想跟着他们看齐，我就喜欢这么干活，即使遭人不满，我仍然搬着我的十二块砖，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总是被批评为“脱离群众”，这样的群众脱离也罢。



比劳动更高兴的事情是被公社借调办展览，画影壁或写报告，虽然是政治性宣传，只要离开学校，就会让我感到愉快。我得到这些机会归功于图画马老师。

到学校不久搞大批判，我画了一张“拿起笔作刀枪”的宣传画，图画马老师看到了，非常高兴地和我聊天，像是遇到了知音。其实在画画上我什么也不懂，画得也幼稚。马老师是六十年代初从艺术学院毕业的，本来他的志向是中央美院，但是由于出身不好，勉强上了艺术学院，学的是油画专业。他的绘画技术绝对一流，他给我看他的素描毕业作品，很大一张石膏头像，花了一百多个小时完成，极为精细。他讲素描既要顾及总体上黑白灰的调子，还要在每个局部上画好黑白灰，又不能超越整体的调子，让我觉得画画也是很辩证的。尽管在校专业成绩优秀，毕业后他还是因为出身不好分到这个小小的农村学校。以他的水平教这些温饱尚未满足的孩子们纯粹是高射炮打蚊子。马老师不关心政治，常有怀才不遇的消极叹息。知道我喜欢画画，他常常给我谈一些绘画的理论。



1968年全国上下大兴立毛主席塑像之风，没能力的就垒一个大影壁画毛主席像，请不到人画像的就写毛主席语录。马老师立时成了各单位抢手的宝。三夏期间，公社机关调老马去在大影壁上写毛主席语录，他点名要我当助手。影壁四五米高，三米来宽，写的是“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那段。大影壁刚刚搭好，先在水泥面刷上白漆打底，再刷上几遍红漆（因为水泥没有干透，不到一年漆皮就脱落，语录变得斑驳陆离）。老马往上面写字的轮廓，我用白漆描出来。边写老马边感叹：“学了这么多年油画，就用来干这个。”

一天我们正站在脚手架上写字，来了一个人和老马打招呼。我往下看了一眼，是一个个子高高，面孔白皙的年轻人。他们聊了一会儿，老马爬上来说那是体育学院的生化理论课老师，他们一起搞过摧毁联动展览，这个老师不大会画画却承

担了给体院画毛主席像的任务，结果把毛主席画成了花脸狸猫，实在画不下去了，跑来搬救兵。

几年以后这个人成了我的丈夫。



1968年底冬闲时节，公社要搞一个“抓革命，促生产成果展览”，马老师被调到公社机关画画，他又点名要了我当助手。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李连生很有雄心壮志改变永丰的落后面貌。这个展览用文字和图片表现一两年来公社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取得的成果，以及公社的规划发展前景等等，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宣扬书记的“政绩”。

同去搞展览的还有小学调上来的爱画画的小章。我和小章先起草构图，征求老马意见，然后勾描着色。老马只管画大幅的，用广告色画得跟大型油画似的。

在公社的那些天真是愉快，没有阶级斗争的风声鹤唳，不管展览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在画画。老马给我们讲构图，讲灰色调的丰富表现力，评论我们画的长短。我和小章还抽空画些素描习作，让老马点批。小章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又聪明好学，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公社机关院子里有自己的伙房，伙食乏善可陈，但大师傅却有一个绝活——芝麻酱烙饼。半斤一张，如小脸盆口那么大，麻酱厚实，层多油大，外脆里嫩。每星期做一次。每吃烙饼，全机关喜气洋洋。

此时全国上下对毛的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田地，各单位都搭起大影壁画

毛主席像或写毛主席语录。一时间老马名声大振，成了香饽饽，被到处借调。老马也乐得脱离学校，长时间在外面工作。我就成了公社画画写字的主力。



上图是当年办展览时的工作台。画于1968年。

第二年春天在东玉河支左的解放军要办一个阶级斗争战绩展览，展示他们在农村“三支两军”的成果。由我和小章承办。展览的内容是把各个生产大队的阶级斗争动向，阶级敌人破坏的案件画成图片，有老地主给牲口料下毒，有向儿童散布封建主义毒素，有私存变天账（房契等）。还有革命群众如何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有了解放军，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浓浓的，让我们都相信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酷性。能和解放军在一起，我们特别高兴，那时候我们对解放军无上崇拜，在我的眼睛或者许多人的眼睛里，毛泽东思想是理论，解放军就是物化的理论，解放军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体的。

这批支左的解放军是仪仗营的，小伙子个个一米八以上，浓眉大眼，红脸膛，粗脖梗，匀称壮实的身体，走路站立都经过严格的训练，站如松走如风。看到他们我的脑子里总是出现一个画面——施足了肥，拔足了节的红高粱。和他们办事十分痛快，我和小章只管画画，展览会所需要的东西，只要说到他们就一一办到。

我和小章白天晚上在一起工作，相处很好。小章年轻，充满朝气，爱说爱笑，待人诚恳。我们在一起可说的话题很多，谈不完。但是我对他根本没往“那边”想，他有女朋友，而且他是干部子弟，和我终究不是一类人。

那一阵我的感情的指向并非具体的“这一个”小章，而是作为一个男性的小章。我的感情需要寄托，我的青春荷尔蒙需要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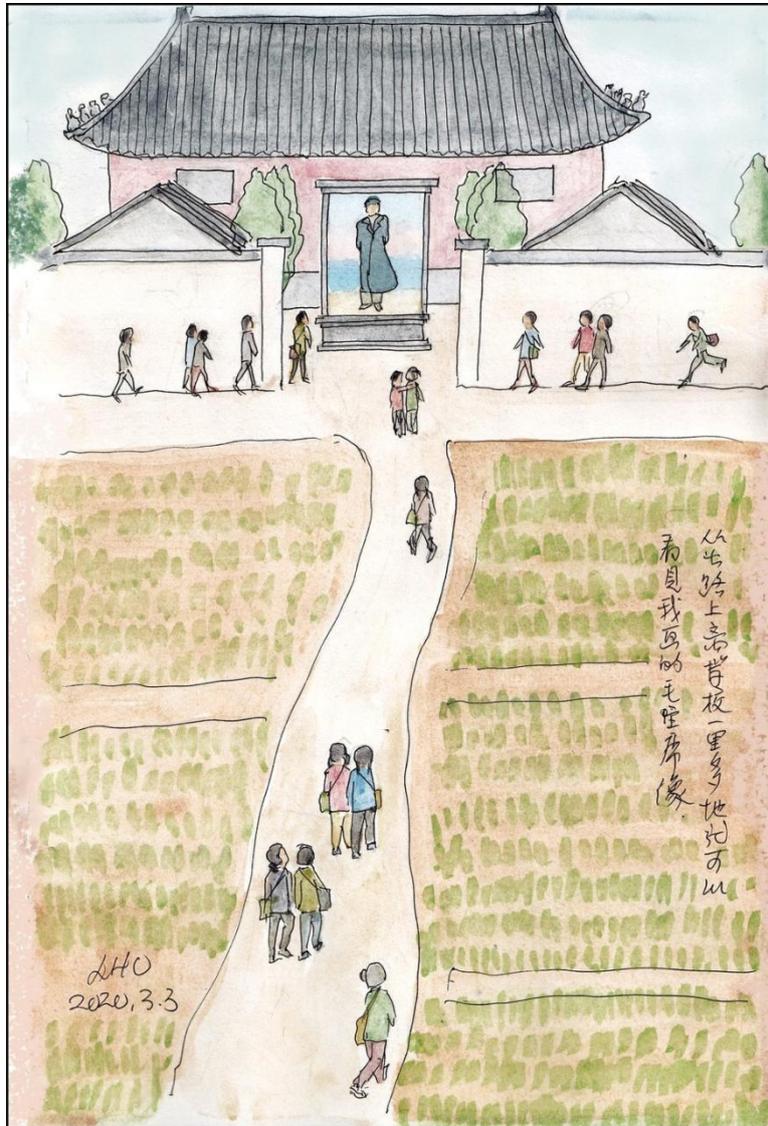


永丰中学也跟风建立起了两个大影壁，一个在校门口，另一个在大操场厕所旁边。大操场的影壁有七八米宽，三米多高，刷成红色的底子，上书白色大字，毛主席语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全部由我一个人完成。

门口的影壁要画一幅毛主席在北戴河的全身像，老马已经借调到海淀区文化馆，画像非我莫属。领导对我的绘画技术估计过高了，我自己根本没信心，除了十四岁用油色涂抹过一张雏菊的画，我再也没碰过油画。那影壁不算底座高四米，宽三米，我怎敢下手？可别像那个体院老师一样，最后收不了场。我去找老马商量，他教我画油画人像的步骤，帮我分析“毛主席在北戴河”宣传画的色彩，一再鼓励我“你能行”，并保证如果画不下去，他会来收场。

我也确实想一展身手，向我没踏足的领域进攻，就勇敢地爬上了脚手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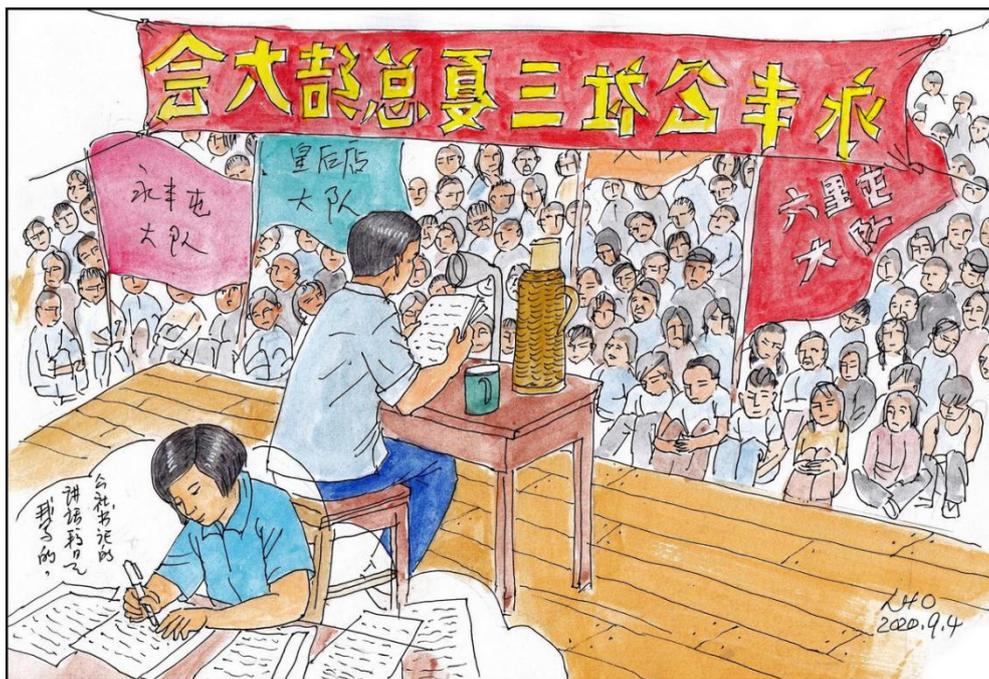
画像用的是打格放大法，按照老马提供的色彩搭配，进展很顺利，不到两周基本完成。正是三夏时期，老师们和过路的农民干完活都要站在画架下评论一番，人人夸赞。老马特地回来观看说：“想不到，想不到，一个女老师能画得这么好！”



我自己也非常满意。许多单位没有绘画知识的人画的毛主席像不仅形象不准确，色彩的黑白灰关系也没掌握，脸上画得脏兮兮的，像个旧社会的乞丐。我画的色彩干净协调，形象准确，为校园增光不少，在公路上离学校一里多地，就可以看见“光辉四射”的毛主席像。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在影壁下照相，我自己也总想照一张相留念，但是拖拖拉拉一直到我离开永丰也没照成。文革后全国又一阵风拆除了所有的毛影壁，拉倒了所有的毛雕像。随着毛主席像的倒塌，一个时代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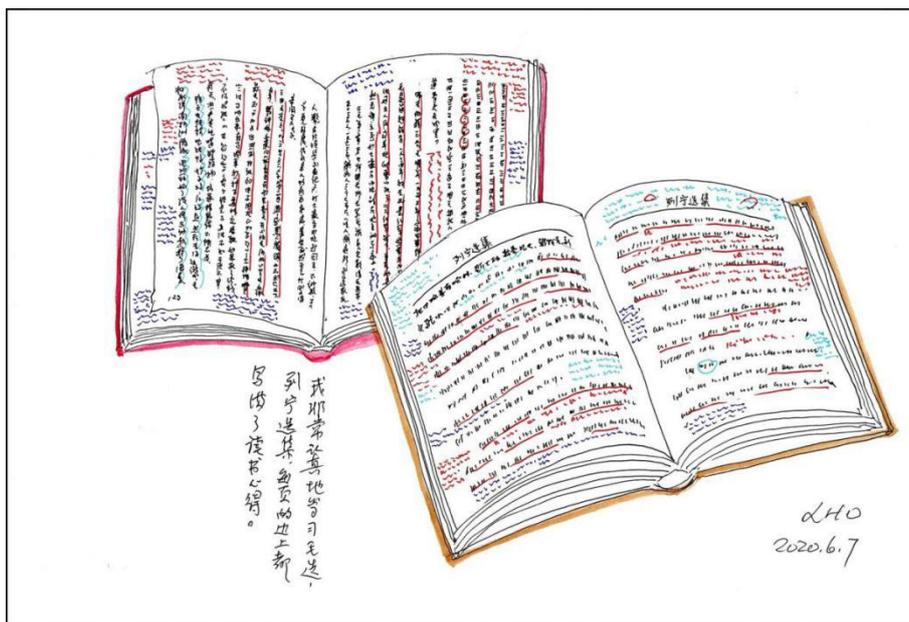


除了画画，我的另一特长也派上了用途，就是写文章。我在永丰所写过的东西无非就是批判稿、大字报。不知怎么就看上了我的文笔，全公社水利工程大会战时让我到公社宣传组工作，在工地上收集好人好事、工程进度，写成广播稿鼓舞士气。我干脆创办了一个“战地小报”，自写自刻，每天一期，内容同时还在广播中播出。别看这小报就是一张八开的油印纸张，特别受各大队领导和社员的重视，都以上小报为荣，农民们认为写成文字印在纸上的才算数。



一个夏收时节公社把我调到公社三夏指挥部，白天跟公社干部到各个大队参加劳动收集材料，晚上为公社书记写总结。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工作，我写得非常认真——形势任务、收成数据、好人好事、经验教训、努力方向……洋洋洒洒几万字。三夏结束，公社在六里屯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书记李连生作总结报告。没想到他好像一遍都没看，念得磕磕巴巴。我从中发现了自己写文章的大问题：句子太长，不通俗，不上口，还有点欧化，无怪乎李连生念得那么吃力。

从此写文章我自己至少要朗读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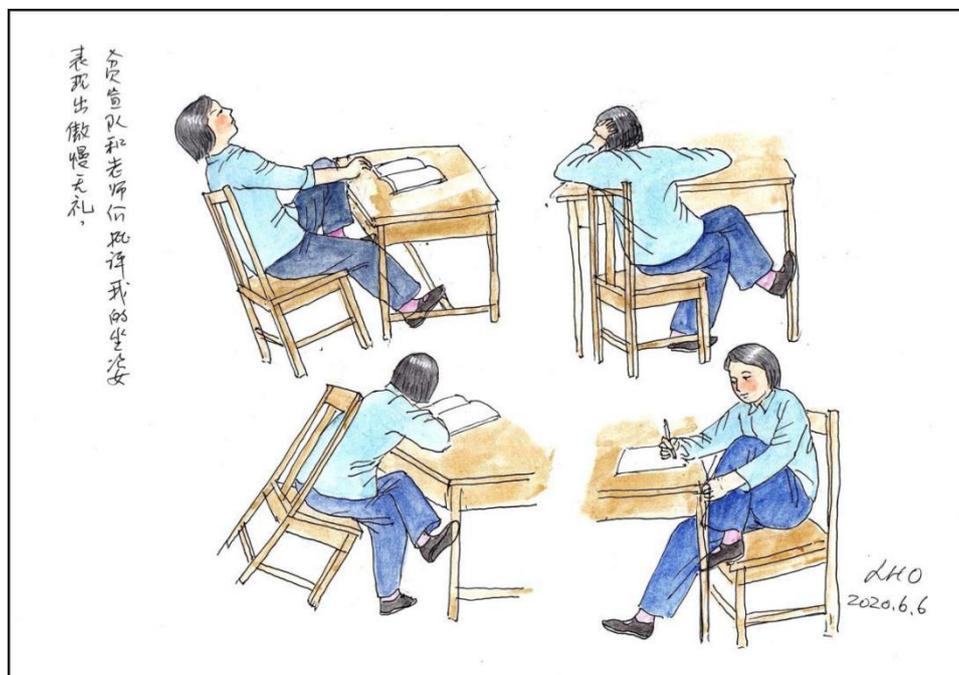
我喜欢学习理论，政治学习时间就是念报纸，如果没有什么可念的，就让大家自学。每人拿本《毛选》貌合神离地看着，一个钟头也翻不了一页。我倒宁可自学，甚至每天晚上独自一人还在办公室学习。我阅读毛主席著作非常认真，并非出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阶级感情，而是从中发现了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天地，凡是我不懂的我都有极大兴趣去探究，四卷本《毛选》我都读完后，又读完了《列宁选集》两卷本，所读之处每页的白边上都做了密密麻麻的眉批，记下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那时的学毛著强调林彪提倡的“活学活用”学一条语录有一个行动，比如学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就不怕苦不怕累地干活，学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就和意见不一致的同志搞好关系，学了“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就克服了工作上的畏难情绪……能做到上述的学用一致，就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学习方式，我注重的是观察

世界的思维方式，所以我特别喜欢读《矛盾论》《实践论》。



我的好学和政治上的进步永远搭不上边，进步不进步，关键是群众怎么看你，能否接受你。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落个“脱离群众”的恶名。我知道“搞好群众关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和他们凑在一堆，家长里短，蜚短流长。特别是晚上，女老师们集中到一个宿舍，扯一晚上闲篇或看一晚上电视。我试过一两次，受不了，话题我丝毫没兴趣，更难受的是，闲扯淡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心痛那些宝贵时间！



总说群众的眼睛“雪亮”，而群众的眼光总是让你料想不及。比如同宿舍的老师调走后，我暂时一个人住。一个冬天我扁桃体发炎，发烧，嗓子堵塞说不出

一句话来，屋子里没有生火，我捂在两层被窝里休息。刚刚分配到校“掺沙子”（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老师被视作板结的僵土，把贫下中农安插到教师队伍中打破板结土地，叫掺沙子）的亮甲店的农民边老师敲门，她被分到这间宿舍，先来“号号”。我起床披衣下地开门，可能动作稍慢了点，开了门哑着嗓子跟她打了个招呼，挣扎着告诉她我嗓子发炎了，说不出话。然后立即钻回了被窝。这一系列行为在她看来就是态度傲慢，让她已经很不高兴了。她转了一圈就走了，没说搬不搬。她走后我也因不能再忍受病痛，请假回家看病。白血球两万八千，医生一下子开了一个星期的假。没想到那边惹翻了边老师，她把行李搬来后发现大锁看门，只好又换了一间宿舍，就此认定了我是瞧不起贫下中农。我无论怎么解释，怎么试图和她搞好关系都没有用，对我不理不睬。几年后为我的工资调整征求群众意见时，边老师仍旧一再言词激烈地提出这件事。

群众的“雪亮”眼睛甚至从你的“身体语言”都可以看出思想意识问题。比如群众批评我骄傲自满，理由是在办公室坐的姿势与众不同，喜欢将椅子的两条前腿翘起来，往后仰坐。还喜欢一条腿蹬在椅子上。不知研究肢体语言的人对此怎么说，我这种做法纯粹是从小在家里无人教养形成的不文雅习惯，海燕倒是老为此骂我，她越骂，我就越要这样坐，和她对着干，和骄傲无干。

这些根本想不到的事防不胜防。为了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我简直到了谨小慎微言不由衷的地步。



在我思想改造的路程上，嘴馋始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绊脚石。我嘴馋，爱吃，

吃是生活中的一种享受，从小就被海燕骂为“饕餮之徒”。文革了才知道任何与个人的感官享受有关的都是剥削阶级的，都是被批判或者被禁止的（八个样板戏里那些清教徒式的共产党人，就是革命者的榜样）。别人能过清苦的生活，为什么你就不能？其实我并没有追求美味珍馐，我的美食欲仅仅比别人高一点点——爱吃点肉。食堂最常见的菜是冬天熬白菜，或者是炒白菜帮子，菜帮子切丝，形状弯弯的，大师傅戏称之为“炒虾米腰”。夏天就是炒时菜。偶尔做一次熘肉片，两毛钱一份，或卖酱猪头肉，两毛左右一块，我必买。

学校里农村老师多，生活困难得多，每到发放经济补助时，这些老师各自痛陈家境之窘迫，互相比穷，就为了得到二三十元的补助。他们几乎不吃菜，就着带来的咸菜下饭，或者买半个菜，撒一把盐就饭。和大家在一起吃饭，我尽量入乡随俗，我学会了吃我以前最讨厌的大蒜，甚至发现咬一口蒜瓣，就一口菜，真是满口溢香。我还学会了腌咸菜，入冬时买一大堆芥菜头，腌一缸酱疙瘩。或买十几斤雪里蕻埋在盐里。这两样菜是冬季北京居民的当家菜。说起腌雪里蕻，我跟阿巧学会了一种腌制方法：洗净，在开水里烫一下即取出，趁热切丁，撒上盐，拌上大量蒜末，装入瓶中密封。半个月后，菜便腌制好了，香脆还有点酸，有点冲鼻，生拌肉炒都好吃。老师们星期一返校都带一大瓶子咸菜佐饭。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互相品尝各家咸菜。我的那一瓶咸菜最招人喜爱，一顿饭就被大家抢完。

再贪图口腹之欲，我每个月的伙食费也就五元左右。有时候嘴里实在无味，悄悄地跑到村里的供销社，买一毛钱粉肠，趁没人的时候空口吃掉。



尽管我注意一点一滴地改造世界观，有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就简直叫人无所适从了。

有一次供销社来了香蕉，卖不出去，几天后皮都变成黑色，里面也烂得棕色透明。售货员小王劝我两毛钱包了圆。带回宿舍，我请宿舍里其他三个女老师一起吃，一人三四个，一下子就吃完了。我把香蕉皮收集在一个簸箕里，倒了出去。不知道哪个窗户里有眼，汇报到领导处。在一次开批评会上，贫下中农宣传队的胡德江大爷说：“据群众反映，刘海鸥吃香蕉一簸箕一簸箕地吃。”领导和群众的意见是不能反驳的，我只好保持沉默。我奇怪，分吃我香蕉的那几个“群众”，和几年前吃大寨苹果一样，这时候为什么不说一句公道话。这就是群众，我们天天念叨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群众犀利的目光是一把刀子，左砍右砍，我刚进校时还残存的一点锋芒，全部削平。



除了搞思想革命化，几乎谈不上什么钻研业务。我本来是教语文的，学校里人事经常更动，有的课目缺老师，如果让有专业的老教师改教其他课程，他们会找领导吵架哭闹，“撂挑子”不来上班。像我这样不会打架不会闹事的，只有服从分配一条路。我教的课不断变动，语文、代数、几何、珠算（现学现卖）、音乐、美术、英语、政治。只要是没人教的课，就让我这个萝卜去顶那个坑。好在我生性就爱尝试没做过的事情，每样课程我都喜欢教一教。

我最喜欢教的是英语，这是我自上学起就喜欢的课程。无奈农村的孩子对英语毫无兴趣，无论怎么告诉他们，英语是打击帝修反的武器，他们最终的现实出路还是回到大田里。用锄把子打击老美还差着十万八千里，那几句英语就更不知怎么打过去了。英语课本编得毫无逻辑性，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东方红”的歌词。这些中式英语弄得学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学得一塌糊涂。

这种状况延续到1973年，邓小平复出，教育开始走上正轨，学校终于呈现出一点学校应有的气象。老师们终于等到了用武之时，欢天喜地，重新披挂上阵。

1973年大学开始考试招生（仅此一年，当年就被张铁生“踢了馆子”），我们学校也开设了高中，那些爱学习的农民孩子看到了一线前途，学得很努力。为了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我编了一个外语短剧，在全校演出。短剧讲的是亚非拉美欧各国的人民在中国的天安门碰到一起，各自讲述自己国家的反帝反修斗争，然后表示团结一致，共同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决心。结尾时全体高唱英文的《国际歌》。短剧虽然是空洞的形式主义，但是对农村学生来说很新颖，很受欢迎。不过他们怎么样也学不会唱英文歌，我只好将英文尽量简化，去掉尾音和清浊辅音，并全部变成中文读音，就很滑稽地唱成这样：“阿瑞修瑞那奥他为深，阿瑞修瑞吃奥里而（Arise, ye prisoners of starvation, Arise, ye wretched of the earth）……”五十多年后，师生聚会，同学们还在怀念那个英语短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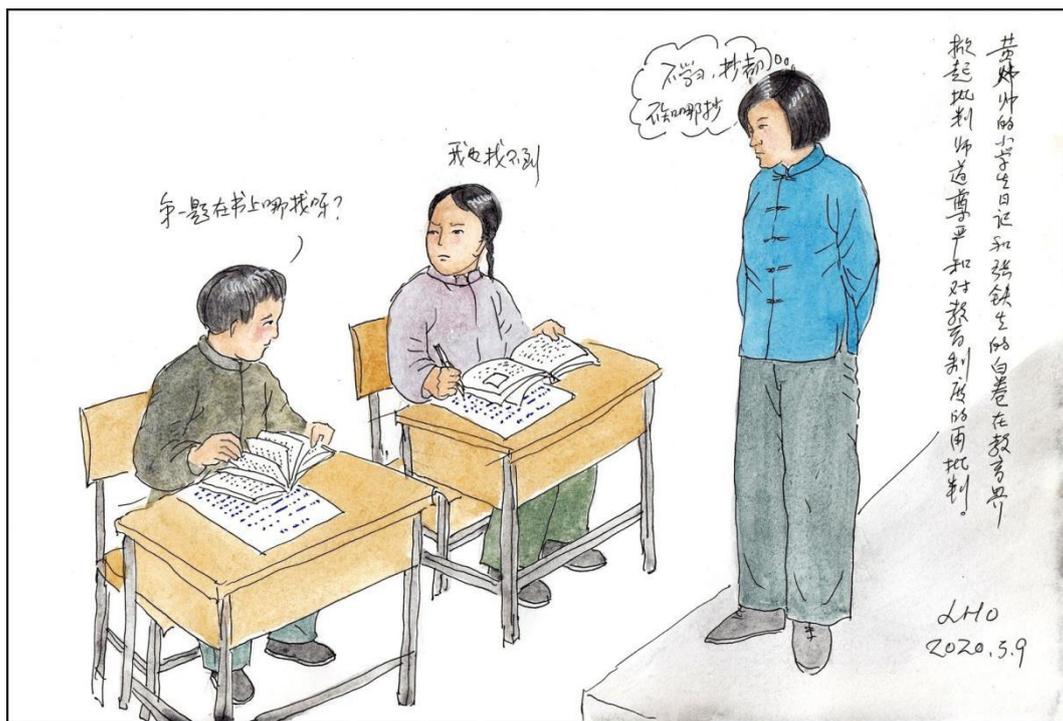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时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汇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对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宗旨的概括，并在中共九大中写入《党章》。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革命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大革命。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一个革命接一个革命，学校也无例外。

1973年教育界的形势刚有好转，就被一个“黄帅事件”一个“张铁生事件”再次搅得天翻地覆。所谓“黄帅事件”是中关村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在日记中抱怨老师对待学生态度如何恶劣云云。而“张铁生事件”是在辽宁插队的知青张铁生1973年参加大学考试，不会答题，就在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说他因为不忍放弃集体生产而无暇复习功课，导致考试的失败。这二位的日记和信件得到中央文革的高度赞扬。两个人被誉为“反对师道尊严”和“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全国学生有样学样，又造起了老师和教学的反。“马振扶事件”就是反潮流蔓上一颗歪瓜——一个女孩因为不服气英语老师的批评而自杀——更是把“反潮流”运动推向高潮。

有一次我给初中班上英语课，我带他们念书，跟随我念的寥寥无几。我生气了，说期末考试就考背诵这一课。一个学习很差的学生王巨桐当场写了一首打油诗交给我：“考英语，到期末，试单词，背英课。两个东西一路货，死记硬背容不得，老师的屁股坐歪了。别的课都不会念，而第八课必须会背，这是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请老师深深深深深思！！！”下课又贴了一篇大字报，说我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应该彻底改造世界观，狠批封资修思想。

校党支部非常重视此事，立刻把事件定性为“不仅仅是考试方法问题，而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问题”，把王巨桐树为全校“反潮流的小英雄”，并就此事在全校开展了大字报大批判活动（此为共产党搞运动的一贯手法）。我不得不写了检讨的大字报，批判自己的“师道尊严”，“分数挂帅”，“管卡压”的教育思想，向王巨桐道歉。



如今反观“王巨桐事件”，我想起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的“痞子运动”，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的“流氓无产者”。老毛赞扬这些人是“革命性”最强的，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对象。确实如此，一些痞子无赖流氓日子混不下去，趁革命来临之机，跳出来浑水摸鱼一把，竟也摇身一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领导阶级，实际上革命成功后危害最大的就是这种人。王巨桐小孩子虽然还不能编进那些人的队伍，其行为却如同中国革命的小小缩影。

从那以后，没有老师敢于用考试来约束学生，教学秩序又重新打乱，各科考试一律改为“开卷考”，考试时学生们拿着书本，想抄都不知道抄什么地方。英语课干脆取消了考试，以评教评学代替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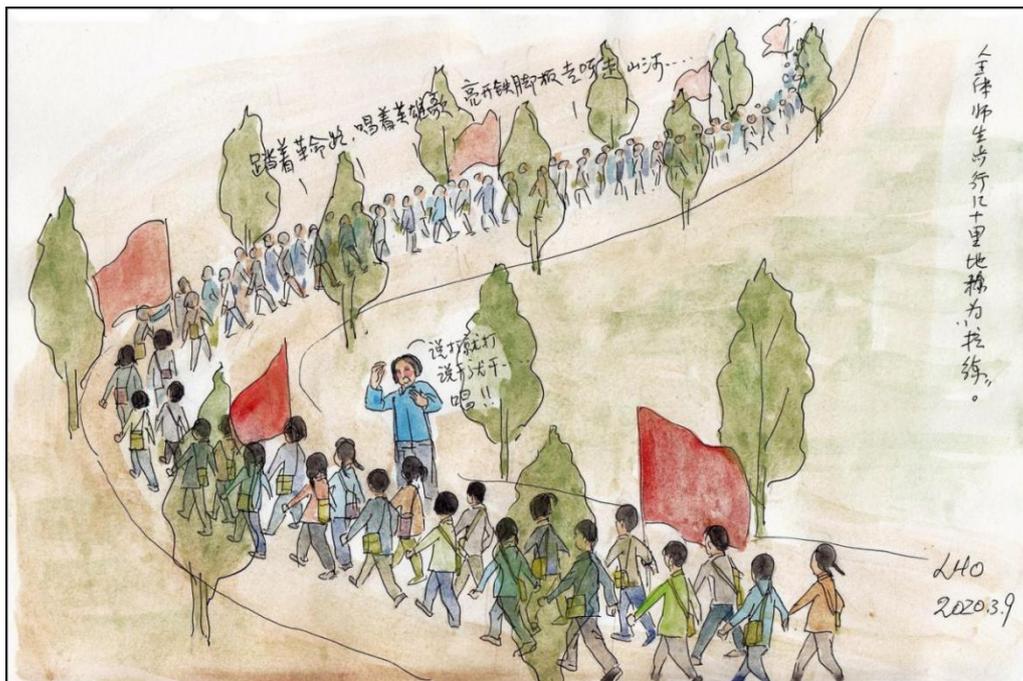
毋庸置疑，教学质量一路下滑，课堂上又乱开了锅，没有人再想听课。当时有一个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老师们要做的就是大批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杂草送入社会。

不过“王巨桐事件”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大的压力，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各色运动的程式——先“抓典型”，再带动一般。党支部就是想把“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结合，搞得活色生香，并没有特别针对我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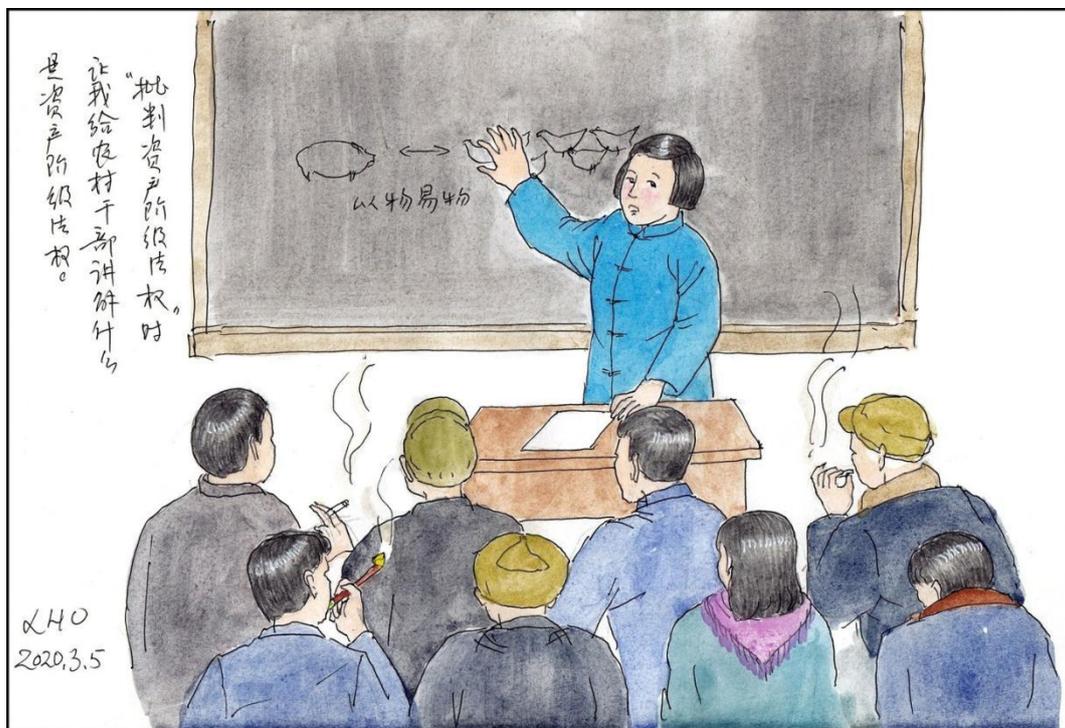


继续革命的另一重大发展就是 1974 年初由毛泽东批准，中央文革发起的全国规模的“批林批孔”批《水浒》的政治运动。学校里整天不是批孔老二杀少正卯，就是批宋公明的投降主义，还有“评法批儒”，学习历史上的“法家”思想。林林总总，越批越荒唐。学校办了批林批孔展览，让我画宣传画。

据文革后的揭发，一系列的批判运动是上层内斗的反映，而当时不明所以的群众只能被动地跟着摇旗呐喊。



除了大批判，还有个新鲜事物风行全国——“拉练”。这是跟解放军学的模拟实战的行军训练，全校学生步行几十里地，到某个军营参观学习。不用上课，孩子们像参加春游秋游一样高兴。说实在的，只要不上课，老师也省心。



1975年又冒出来一个“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提法。这是毛泽东晚年发表的常人难以理解的指示之一。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要反，谁都说不明白。公社要求学校教员给农村干部讲解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更不知道反资产阶级法权目的何在，多少年后才知道这还是上面政治内斗的一个筹码。我啃了几天从未读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致弄通。在一个冬夜，在某个村的小学教室里，黑压压地坐了一屋子农村干部。我用最通俗的语言，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开始，一直讲到剩余价值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两个小时讲完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我不知道自己讲明白了没有，也不知道说清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据我校领导说我讲得很不错。

因为我对理论有兴趣，学校又让我改教政治课，政治课讲“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实践论》《矛盾论》的通俗化的读本。在毛主席著作中，我最爱读的，读了无数遍的就是这两篇，教起课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

我后来考上研究生，就得益于教政治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努力工作和学习的结果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党支部找我谈话，提出了让我入党的事情，吓了我一跳。我从来没有动过入党的念头，更没写过入党申请书，因为我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了，共产党对我来说如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加上文革后我家的遭遇和丈夫老宋的“严重政治问题”（下一章会详述），党和我的距离就更加是千万里之遥了。党支部强调党的政策是重在个人表现。我自然是很高兴，但是内心也十分地不安，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那种纯粹的共产党员的模式，我内心的自由主义追求什么时候也没有熄灭过，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摆脱的。同时，我对当时的党中央充满疑问。政治上的大动荡，把明镜高悬般的党中央变成一个空壳子，其中内容不断更换，不断地有新的“党”领导涌现，不久又被打倒，普通百姓已经被弄糊涂了：不知该热爱谁拥护谁。在我内心最深处更有不可言说的“阴暗”想法——文革这么一折腾，共产党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所有党的“优秀领导、优秀干部、优秀儿女”树立一批，倒下一批，我们一次次地由激动感动到惊悚齿冷，对共产党已经打了千折百扣，只剩了一个“基本信任”，但是热情不再。

既然党组织主动发出邀请，我不能拒绝，但是我连入党申请书都没写过。以前见人家写入团或入党申请书，字字句句豪情激荡，仿佛都是饱蘸热泪和热血而写成的。但是像这样的字句“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誓死跟党走革命”

（当时党团申请书的八股格式）让我觉得肉麻，我真是说不出口，下不了笔。回家求丈夫老宋：“你帮我写吧，我不会写。”老宋点灯熬油连夜替我写了一份认识深刻的入党申请（他自己因为有“政治污点”，跟党无缘），说来真是笑话。我的入党发展会是在1974年底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声望最低迷的时期，我从来不愿意和别人提及此事，觉得这是我的耻辱。但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贫下中农宣传队的胡德江看人的标准很简捷：“刘海鸥劳动能吃苦，工作下功夫，爱学习，是实在人。”这些话我爱听，按照农民的党员标准——不看你说什么，就看你做什么——我够格。☞

【评论】

试析蒯大富们制造的清华“两案”

陈楚三

对于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有反思、有回忆、有揭露、有忏悔，特别是樊思清的忏悔，真诚而感人，他在分析了造成文革武斗的大环境之后，痛心指出：自己开枪打死同学，“文革武斗环境因素固然重要，然而环境只是外部条件，内因还是我自己漠视生命的人性”，坦承自己的“人性底线在‘武斗现场的直观仇恨’的欺骗、激发下失守”。樊思清说，“充分揭露真相，认真厘清事实，廓清事件原本，忏悔方现真谛。”¹他正是这样做的。

十分遗憾的是，清华文革中最血腥、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历史，即蒯大富们制造的清华“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的历史，至今无人揭露真相，也无人进行“现真谛”的忏悔！

清华文革中，蒯大富们制造了三大冤案，即“蒋（蒋南翔）刘（刘冰）反党集团”“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其中，“蒋刘反党集团”囊括了运动初期就被打倒的校级主要领导，实际上已是“死老虎”，蒯大富自己承认：“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蒯大富们打“蒋刘反党集团”，只是

¹ 樊思清忏悔，引自孙怒涛主编《真话与忏悔》。

陪衬，是为打“蒋刘反党集团”的“第二套班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以及“十二人反党集团”（本文简称为清华“两案”）作铺垫，后者才是“活老虎”，蒯大富们处心积虑下死手要搞成“铁案”。

陆元吉校友关于“十二人反党集团”曾经发帖称：“四个女生被关近三个月，受尽折磨。近五十年了，却始终不知此事的来龙去脉，无人出来说过真相。好像这事不存在，又好像加害她们的是一群外星人。这类既非小事，更非细节的真相难道不应当追问吗？”¹

实际上“十二人反党集团”案被关押的不仅是四个女生，而是五个女生，还有一名团委干部和力603班的一个男生被关押四个多月，以及“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被关押的五名干部，他（她）们在蒯大富的黑牢中遭受种种酷刑，一名女干部刘承娴被逼死，因罗征启逃离三堡，其胞弟罗征敷被抓毒打后窒息而亡。陆元吉发帖至今四年又过去了，只有四名受害人（罗征启、谢引麟、邢竞侯、饶慰慈）本人或子女的文章较详细地揭露了遭受残酷迫害情形，而且在近二百万言的清华文革回忆反思及校友讨论文集中，这四篇文章也未被收入；同时，更没有看到清华“两案”加害方的知情人，包括策划者、指挥者、执行者、直接加害者（凶手）和在场者出来“揭露真相”。依然“不知此事的来龙去脉，无人出来说过真相。好像这事不存在，又好像加害她们的是一群外星人。”

本文会告诉读者，“两案”的真相为什么揭不开，并根据所收集到的团派的有限资料，试图分析蒯大富们制造“两案”的目的、手段和方法，至于具体细节，自有受害者和受害者知情人的揭露文字，本文不赘述。

一、“两案”的真相为何一直揭不开？

清华“两案”的总负责人是团总部核心委员陈继芳，她可能不是直接加害者，但肯定是策划者之一和主要指挥者。当诸多原两派校友都在参与到清华文革大事的回忆中时，陈继芳却警告原团派骨干：“写回忆录应当写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事！”²换言之，凡对团派不利的事，都不准写。

什么是对团派“不利”的事？对414的谩骂、污蔑、造谣、栽赃，策划搞武斗，抓人打人，反军乱军反总理，这些事都对团派不利，但对团派最不利的，是

¹ 见孙怒涛主编《真话与忏悔》第379页。

² 团派朋友披露，蒯大富夫人罗晓波亲耳所闻。

极其丑恶凶残、灭绝人性的“两案”黑幕。

沈如槐校友指出，从团派制造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两大冤案来看，团派抓人打人有四大特征：老蒯决策、头头主持；组织健全、目的明确；私设刑堂、严刑逼供；手段凶残、惨无人道。

团派抓人打人的共同特点是手段凶残。仅举数例：1967年10月20日，团派保卫组将414总部核心委员宿长忠毒打至重伤，脑震荡，髌骨、肋骨骨折；¹1967年12月5日，414总部委员郭仁宽被团派保卫组毒打至肾出血；²同一天，414派的学生唐海山、教师李兆汉被团派保卫组“贴饼子”（几人抬起一人多高使劲往地上摔）；12月6日，团广播台工人师傅卢振义因持414观点也被“贴饼子”并被赶出团广播台；³12月20日，414总部核心委员陈楚三被团保卫组绑架、毒打，钢丝钳夹手指、烟头烫脸、火柴烧脖颈；1968年5月12日，团派打手用钉了钉子的木板毒打被抓的414总部委员周坚，当场打断周坚一根肋骨⁴；5月14日，团派《前哨台》打手更是将414派学生孙华栋活活打死，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⁵。至于“两案”中人员所受酷刑，更是骇人听闻。

严刑逼供、手段凶残，是在团派主要头头操纵下少数极端分子所为，但这种罪恶行径是广大团派群众并不了解而且坚决反对的、见不得人的，因此是对团派最“不利”的，也是陈继芳等一些头头最忌讳的；所以，陈继芳才下了“禁令”。

陈继芳自己的回忆录，就完全回避对她本人及团派不利的事实。

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被团保卫组绑架致死，是陈继芳带人把遗体送到北医三院的；孙华栋被毒打身亡后，也是陈继芳，带领四人把孙华栋遗体送到阜外医院，留下假名字和假电话后溜之大吉，可陈继芳的回忆录却“选择性遗忘”，对罗征敷和孙华栋之死一字不提，因为对她本人不利、对团派不利。

5. 30 团派攻打东区浴室，正是自称“反对武斗”“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武斗”的陈继芳，推来一桶油，使浴室被燃烧瓶点燃的小火“火上浇油”变成大火，据说陈继芳还找来两袋干辣椒投入大火中，可谓火烧东区浴室的“功臣”，但因

¹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281页。

²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301页。

³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302页。

⁴ 见周坚：《犹有傲霜枝》第171页。

⁵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347页。

为对她本人不利，在其回忆录中，她却左一个“不知为什么”，右一个“不明白”，更不提她本人的“壮举”，把自己写成似乎是旁观者。

陈继芳提到团派段洪水和许恭生“阵亡”，并说“414抓走了团派干部陶森，还抓走了团派的总部委员陈育延，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了被抓、被打、甚至被害的准备”，好像她“每隔一星期”能去看望男朋友、还能在北京“陪妈妈玩了几天”的陈继芳，处境比414被严密封锁、“死者不准外运、伤者不准医治、生者格杀勿论”的科学馆还危险、濒临绝境了！陈继芳真能装啊！怎么不提陈育延被抓前几天，414的孙华栋被活活打死？怎么不提陈育延被抓十天就放回？怎么一字不提她主管的团派专案组“抓、打”的吕应中、罗征启等十多名干部和学生？怎么一字不提作为414总部核心委员的陈楚三“被抓、被打”，一字不提已经“被害”的罗征敷、谢晋澄、卞雨林、刘承娴、朱育生、杨志军、杨述立、钱平华？是陈继芳“健忘”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指挥和实施抓、打、杀害这些干部和学生的正是蒯大富和她陈继芳及其主管的团专案组！

陈继芳的回忆录提到“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时，说“团派专案组……不时传来惊人的消息”“因为他们都是414派的干部，所以团派一些人认为，这是整垮414的最好契机”，似乎也和她无关，她只是局外人。陈继芳又“健忘”了吗？忘了她自己就是团派“罗文李饶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吗？正是她，指挥团派专案组制造出那些“惊人的消息”，也是她，根据这些“消息”，在1968年4月18日团派的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¹，第一次公开把罗征启等六名干部打成“反革命集团”。她又是“选择性遗忘”，企图把这个对她不利的事实向读者隐瞒。至于“十二人反党集团”，陈继芳在回忆录中完全回避。

陈继芳提到7.27，竟然再次“选择性遗忘”，绝口不提工宣队被团派杀害五人，轻重伤七百三十一人的血淋淋事实！虽然她当天不在现场，却硬要言之凿凿地为蒯大富开脱说，蒯大富要求“避免和工人冲突”“无论如何不能伤着工人”，却被“扣上了是他下令开枪的罪名”。陈继芳极力为蒯大富涂脂抹粉，蒯的自述却狠狠打了陈继芳的脸！蒯大富自己说，当时的决定是“守住楼，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²

就连对待迟群的态度，陈继芳也只“写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事”，回忆录说“从

¹ 见《井冈山》报135、136期合刊（1968.4.19）。

² 引自米鹤都《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

我见他的第一面起，我就十分厌恶他”“我和陈育延不知暗地里骂过他多少次”；但是她在给蒯大富的信中却坦言：“越看迟群（所作所为）越像是我们的人”¹这是她的真心话，但讲出来对团派“不利”，所以回忆录中当然不能写。

陈继芳如此，蒯大富呢？

蒯大富口头上也赞成写回忆录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和陈继芳一样，力图回避对团派和他本人“不利”的事，实在回避不了时就尽量推卸责任。

例如清华的武斗，蒯大富说武斗的导火索是414抓了“团派保护的干部”陶森，却同样“选择性遗忘”，只字不提在414抓陶森前，他下令抓了414保护的干部吕应中，抓了支持414的干部罗征启、文学宓、饶慰慈、刘承娴、贾春旺，还抓了414总部核心委员陈楚三。

清华武斗为什么停不下来？蒯大富谎称在武斗死了人后就对武斗“后悔”“巴不得停止”了，却避而不提他停止武斗的条件“蒯四条”²；明明是蒯大富们认为“对414停止武斗”的问题“根本不存在”³，明明是蒯大富们认为“彻底摧毁”414才是“解决清华问题包括武斗问题唯一正确的途径”⁴，蒯大富却栽赃说是因为“四一四的头头坚决不同意”停止武斗。

再如对团派打死人的问题。蒯大富说“强调过，不准打人”，又说发生罗征敷被抓致死事件后支持孙耘等三人去公安局自首；可是，罗征敷事件发生于4月4日，在此之后，4月29日发生谢晋澄被团派汽车撞压而死事件，5月14日发生孙华栋被活活打死的恶性事件，6月12日又发生刘承娴被迫害致死事件，蒯大富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但没见蒯大富责令凶手去自首，而且在蒯大富的口述回忆中，也“选择性遗忘”，只对谢晋澄之死表示“难过”（因为他曾在蒯被打成反革命时支持蒯），竟然对孙华栋、刘承娴两起事件只字不提！

又如对他一手制造的清华“两案”，蒯大富不得不笼统地承认“整过很多人”，可又说整他们是因为“他们私下议论的时候，……说了些当时被认为很反动的话”；虽然蒯大富不得不承认“抓人一般都是我下命令抓的”“说他们是反革命

¹ 引自李子壮：《十年风浪一笔烂账》，见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第602页。

² “蒯四条”，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170页：1968年7月15日，谢富治等接见蒯大富，要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解除对科学馆的封锁，蒯大富提出停止武斗四条件：（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章）等四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

³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355页。

⁴ 引自团总部扩大会议《清华运动两个月总结（草案）》，见《井冈山》报149期（1968.6.28）。

集团，这是我给定的”，但却强调“那时是所谓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讲什么人道主义”“打人、武斗、暴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在1983年法庭审判时还为自己辩护说：“在1968年我错整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我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不是有意陷害”“在单位隔离审查某些干部和群众，乱扣帽子，包括有刑讯逼供的情节，也远远不构成犯罪”。¹他始终把残酷毒刑逼供的结果作为加罪于这些干部学生的“强有力的证据”，不承认是“诬陷”；试问：“乱扣”反毛、反林、反革命的“帽子”，横加“反革命”罪名，如果这不是“诬陷”，什么才是“诬陷”？

公平地说，蒯大富对文革中整人还多少有忏悔、有愧疚；而陈继芳，作为直接处理罗征敷和孙华栋尸体的当事人，作为清华文革“两案”的总负责人和直接主持者，回忆录通篇竟然没有丝毫悔恨、内疚之意，确如谢引麟所言，良心的拷问会伴随陈继芳的一生！

清华“两案”的总负责人陈继芳下禁令，团总部一号头头蒯大富则对“两案”的逼供信“成果”予以肯定，这是“两案”真相揭不开的根本原因！

二、蒯大富们制造“两案”的目的

蒯大富声称，“两案”涉及的人员有一系列“恶攻（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言论，团派抓“两案”，就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罗征启认为，“团派之所以抓我，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必胜》这篇大字报的主要修改人”；其次是杀鸡给猴看，阻止党员和干部支持414，“除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以外，还有就是干部问题，因为多数党员和干部支持414，团派十分恼火，一直想搞点事件出来，用以吓唬和压制多数党员和干部。于是就把六名敢于公开亮明自己观点，支持414的中层干部打成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²。罗征启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

其实，蒯大富们制造“两案”的主要目的，一是消灭414，建立单独的红卫兵政权，实现蒯大富一统清华的美梦；二是企图通过消灭414，进而“揪出黑后台”，为其反周总理提供“炮弹”。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实现蒯大富们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什么“誓为九大立新功”，什么“全国的造反派都在看着我们”，

¹ 见米鹤都采写、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

² 见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第120页。

还有那“北航黑会”，无一不透露出蒯大富们赤裸裸的政治野心，那就是以全国造反派领袖的身份挤进九大，挤进中共中央。毛主席早把蒯大富们看透了，批评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直指蒯大富们的政治野心。

蒯大富靠反工作组起家，为打倒刘少奇立了头功，成为名震全国的北京学生文革“五大领袖”之一、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但是由于414的存在，清华被认为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因而权力机构改革委员会未能成立；414成了蒯大富一统清华的最大障碍。

先是把414说成“逆流”“右倾”“老保”，没有压垮414；后来说吕应中、罗征启等支持414的干部是“蒋刘反党集团的心腹死党、第二套班子”，是“伸进414的黑手”，还说414“死保走资派”“死保蒋刘反党集团第二套班子”、被“黑手”“操纵”，这些帽子仍然没有压垮414；王关戚事件和杨余傅事件相继发生后，团派宣传集中火力，大肆编造王关戚和杨余傅与414关系密切、是414后台的谣言，进而说王关戚只是“小爬虫”，杨余傅也只是“中等爬虫”，还有“尚未揪出的变色龙”“大变色龙”“更大的后台”¹，要“把谭震林、王关戚林、杨余傅以及414的总后台——陶二世揪出来”²，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蒯大富当然知道，谣言不能长久，谣言也压不垮414。文革时期，打垮一个群众组织的办法有两手，文的一手，是抓住这个组织“恶攻”“炮打”的言行猛批，只要毛、林或中央文革表态即可。武的一手，即武力剿灭。蒯大富两手并用。他以笔名“肖达”发表文章，把“操纵414的黑手”升级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说这个集团“疯狂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414核心的黑参谋部”“414政治方向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这个反革命集团根据其黑主子的旨意制定的”³，蒯大富认为，大造“由一个反革命集团控制着414”的舆论，上可以争取中央文革对镇压414的支持，下可以欺骗不明真相的两派群众。但是，欺骗是不能长久的，蒯大富在团总部会上坦承：“再不搞武斗，革命干部从此就要离开我们，战士们也灰心丧气纷纷不干了，我们的队伍就要分裂、垮台”⁴，为了“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表态”，他继1.4武斗之后，进一步

¹ 见杨继绳：《罗征启访谈录》。

² 见《井冈山》报130期。

³ 见《井冈山》报135、136期合刊（1968.4.19）。

⁴ 同上。

挑起了延续百日的清华大规模武斗。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都是清华干部，而414是以学生为主体，主要负责人是学生，蒯大富还要从学生中、从414头头中抓反革命，以为这样一来414就“死定了”。团派自己整了大量陈伯达的材料，414周泉纓反陈伯达众所周知，于是蒯大富们先造谣说414成立了“陈伯达专案组”¹，后来更进一步，“陈伯达专案组”变成12人“中央首长专案组”（即“12人反党集团”），“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也升级为“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²，沈如槐成了“沈—罗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³，并且“类似的反革命集团在反动流派414内部也不只此一个”⁴；蒯大富是恨不得把整个414打入十八层地狱啊！

直到工宣队进校后，蒯大富们仍然念念不忘消灭414，念念不忘揪“黑后台”，还在叫嚣“誓与沈罗反革命集团及其黑后台血战到底！”⁵

三、蒯大富们污蔑414和攻击周总理的卑劣手法

蒯大富的宣传机器，对414惯用造谣、栽赃、污蔑、颠倒黑白的伎俩，特别是“战歌事件”团派惨败后，更是不择手段。

“战歌事件”，414战歌的歌词是一段林彪语录，吴法宪否认林彪讲过这样的话⁶，谢富治、戚本禹说是造林副主席的谣言，蒯大富们则说是法西斯语言、反动歌曲；当414以确凿证据证明是林彪语录后，蒯大富们以一副无赖嘴脸坚持说414“造谣造到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头上，硬要把中央首长一再辟谣的‘完蛋歌’强加给林副统帅”⁷，并悍然绑架陈楚三，说炮打谢富治戚本禹就是反革命；1967年12月27日，谢富治、戚本禹被迫承认414战歌歌词是林彪语录，其后戚本禹倒台了，不久杨余傅也倒台了，蒯大富们就改口说414是“用战歌问题帮助杨余傅集团陷害吴法宪同志”⁸，后来更倒打一耙，说这是“杨余傅反党集团

¹ 见杨继绳：《罗征启访谈录》。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同上。

⁵ 见《井冈山》报154期（1968. 7. 31）

⁶ 吴法宪对师东兵说过：“林彪大概在1967年5月接见我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引自师东兵《政坛秘闻录》），如果属实，说明吴法宪出于迎合或者有意误导而对蒯大富说了假话。

⁷ 见《井冈山》报增刊（1967. 12. 21）。

⁸ 见杨继绳：《罗征启访谈录》。

为了达到他们陷害谢富治、吴法宪同志，进而陷害林副主席的一个大阴谋”¹。

王庆云是团派沈阳联络站的骨干，武汉“7.20”事件后在东北收集部队番号、部署、历史、首长姓名等汇编成“沈军简况”严重泄密，1967年10月被拘留审查，1969年6月才恢复自由。可是，团《井冈山》报却硬要说王庆云是“414观点”“打入兵团作战部，并为414通风报信”²；不仅如此，还造谣说414也派人“绘制了××军区的军事地图”“将××省各地驻军番号、机场等详细制成地图”³。

林刚是团派杭州联络站成员，以“跟踪毛主席视察”的罪名被中央专案组拘留审查，这在清华两派尽人皆知（按：“跟踪毛主席视察”的罪名系误传。实际罪名是“攻击毛主席”“窃取、扩散”国家核心机密和反军，被在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十个月之久，1980年5月平反）。可是，团《井冈山》报却大言不惭造谣说，“414总部委员陈楚三的秘书邢××”“跟踪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窃取情报”“王允方直接参与此事”，并且暗示王庆云也与此有关⁴。

当然，蒯大富们没有解释，团派作为中央文革的宠儿，王庆云、林刚都被有关部门拘留审查，既然不受中央文革待见的414也有人收集“驻军番号、机场”，也有人“跟踪主席”，罪行相同，为什么414人员却平安无事？

蒯大富们为了“证明”王关戚、杨余傅是414的“黑后台”，郑重其事地编造了大量谎言。例如，造谣说414冲外交部，而且事先“电话请示王力，王力同意去冲”；造谣说戚本禹在垮台前夕还“特别叮嘱沈如槐”，让谭浩强“参加‘三结合’权力机构”等等；更离奇的是，造谣说什么沈如槐出席了杨成武在1967年10月召开的策划倒谢的“黑会”，什么傅崇碧在1968年3月4日“接见”沈如槐，3月15日再次“秘密召见沈如槐”，什么张雪梅在“革命到底学习班”被傅崇碧“接见”，甚至“请吃饺子”！⁵

蒯大富们大造谣言污蔑414，是为揪“黑后台”服务，是为他们反周总理服务。

团派《捉鬼队》1967年1月6日骗斗王光美，周总理第二天就予以严厉批

¹ 见《井冈山》报130期。

² 见《井冈山》报107期（1968.1.4）。

³ 见《井冈山》报130、131期合刊（1968.4.5）和135、136期合刊（1968.4.19）。

⁴ 见《井冈山》报130、131期合刊（1968.4.5）和135、136期合刊（1968.4.19）。

⁵ 见《井冈山》报130、131期合刊（1968.4.5）和135、136期合刊（1968.4.19）。

评，说这个行动“不正常”“不光明磊落”“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是背后耍鬼”“是彭罗陆杨的坏作风”。《捉鬼队》得知后公开攻击周总理“说出了王光美不敢说的话，发泄了刘少奇不敢发泄的恨”，蒯大富全力支持《捉鬼队》对抗周总理，坚持“1.6行动”好得很！¹虽然在全校师生的压力下《捉鬼队》后来做了检查，但团派一些人反总理之心不死，一再说“总理肯定了1.6行动是革命行动”，采用栽赃手法攻击周总理，并暗示总理“死保王光美”²；为“纪念”骗斗王光美一周年，团总部发出通告表彰《捉鬼队》是“英雄集体”，《捉鬼队》还发表专文：《1.6革命行动永放光辉》，影射周总理“收罗尽了人间最恶毒的字眼攻击我捉鬼队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1.6革命行动”，向总理反攻倒算³。

1967年5月30日团“革委会”流产，更使蒯大富们对周总理怀恨在心。蒯大富的口述回忆轻描淡写说总理不参加成立大会只是团“革委会”流产的“其他因素”，实际上这恰恰是团“革委会”流产最主要的原因。

5月2日周总理明确对蒯大富说“等你们成立革委会时，我去参加。我们准备很快派军代表到你们学校去搞三结合试点。这件事我已经和萧华同志讲过了。”

5月6日，总理又在蒯大富的信上亲笔写道“清华还是试行军代表制，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来实现三结合好。”

蒯大富明目张胆违背周总理的指示，在谢富治的支持下，搞了一个既没有军代表参加，又没有实现两派大联合的“革委会”名单。

5月29日，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书面邀请总理参加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写便条如下：

敬爱的总理，你好！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将于5月30日成立！

您在5月1日和5月23日曾两次答应我们一定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我已经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万分高兴，急切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即将第三次参加我

¹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113页。

² 见《井冈山》报135、136期合刊（1968.4.19）和139期（1968.5.10）。

³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317页和《井冈山》报109期（1968.1.12）。

们学校的大会，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井冈山人掌权后的大会！

总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抽出一点时间参加我们的大会。总理参加我们的大会将对我校文化大革命和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理如果不去，我们没有办法向群众交待，明天的大会将无法开下去！

急切盼总理回音！

我们很想与您交谈几分钟，我们在门外等着！

等！！一定要见！！！！

蒯大富，5. 29

“无论如何”“一定要见！”，总理若不来，“大会将无法开下去！”口气如此强硬，蒯大富哪里是在恳求，几乎是在强求总理啊！

总理当时就写了便条回复：

蒯大富同志：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召开，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现在听说你们革命派还没有联合起来就宣布开会，我们就不好参加了。谢副总理正为另事约见红代会谈话，请就近解决。

周恩来，5. 29¹

周总理的回条表达了三层意思：1. “革命派还没有联合”，指的当然是团派和414派，414也是革命派，绝不是什么“逆流”；2. 既然革命派还没有联合，所以这样成立的革委会并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3. 因此，“我们”不能参加。显然，这里的“我们”既指总理本人，也包括谢富治；谢富治就是再偏袒蒯大富，他也不能参加被周总理定性为“革命派没有联合”，不“合乎毛泽东思想指导原则”的团革委会成立大会！所以团“革委会”不能不流产，可是蒯大富们不敢把周总理的回条公之于众，而是造谣说“戚本禹的黑爪牙周景芳扣押了我校上报周总理的成立革委会的报告，上下配合，扼杀了我校的革委会”，

¹ 周总理回条，见清华大学档案，卷宗号：2，案卷号：0169；转引自唐少杰：《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载《记忆》2012年10月31日第89期；蒯大富的便条也在此案卷中

¹ “414 在其黑后台的支持下，搞垮全国第一个革筹小组”²，“在王关戚反党小集团及其黑后台的操纵下……，他们血腥的黑手扼杀了谢副总理亲自批准的清华大学革筹小组”³，还发表专文《从五月三十日谈起》，重复所谓周景芳扣押给总理报告的谎言，公然说“由于王关戚的破坏……，我校革委会未能如期在五月三十日成立”，“五月三十日成立革委会被王关戚之流扼杀”⁴，对周总理的愤恨之情，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蒯大富们在挑起 4. 23 武斗之前，就明目张胆把矛头指向总理；其中最露骨的是团《井冈山》报 1 3 0、1 3 1 期合刊（1968. 4. 5）的社论、评论员等三篇文章，口口声声“大变色龙”“尚未揪出的变色龙”“更大的后台”，特别提到 414 “上送材料 3. 11 黑信时，就是不给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封锁消息”，文中所谓的“3. 11 黑信”是 414 关于解放刘冰的报告，是由沈如槐亲手交给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包括陈、江）的，蒯大富们竟有意造谣说“就是不给”陈、江，其目的无非要表明送给周总理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封锁消息”，公然把周总理排除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反总理之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团《井冈山》报 132、133 期合刊（1968. 4. 12）则在以一报两台（《井冈山》报、团广播台、前哨台）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长篇文章中，猖狂叫嚣“把陶二世揪出来！”“是把谭震林、王关戚林、杨余傅以及 414 的总后台——陶二世揪出来的时候了！”

挑起 4. 23 武斗之后，蒯大富们反总理更加疯狂。团《井冈山》报 137 期（1968. 4. 26）第一版头条位置，在评 4. 23 武斗事件的观察家文章中，八次提出揪“杨余傅的黑后台”，叫嚣挑起武斗“是对杨余傅反党集团及其黑后台的一个强大示威”；团《井冈山》报 138 期（1968. 5. 2），刊登了 4 月 28 日通过的团总部扩大会议纪要，其中提到“杨余傅的黑后台”十四次；团《井冈山》报 149 期（1968. 6. 28），登载了团总部扩大会议 6 月 23 日通过的《清华运动两个月总结（草案）》，其中提到“杨余傅的黑后台”竟然达到 25 次！并且狂叫“杨余傅的黑后台一定要被揪出来接受人民审判”！

7. 27 工宣队进清华，蒯大富给中央发电报说是“杨余傅黑手”派出工人“包

¹ 见杨继绳：《罗征启访谈录》。

² 见《井冈山》报 135、136 期合刊（1968. 4. 19）。

³ 见《井冈山》报 151 期（1968. 7. 5）。

⁴ 见《井冈山》报 143、144 期合刊（1968. 5. 31）。

围洗劫清华园”¹，甚至在7.28召见时毛泽东亲口说“黑手就是我”之后，蒯大富仍然支持并布置继续抓宣传队的“黑手”，仍然要求团《井冈山》报发社论时留“伏笔”：“宣传队里有扒手，将来揪出来再看”²。

当年的蒯大富们，不仅对414恨之入骨，而且反总理、揪414的“黑后台”、揪“杨余傅黑手”也已经走火入魔了！

四、蒯大富制造“两案”的路线图

1. 确定目标：搞垮《东方红战团》

蒯大富一伙很清楚，414内部的《三七战团》和《东方红战团》两股势力中，强硬派《东方红战团》斗争更坚决，而且在414领导核心中占主导，搞垮《东方红战团》是搞垮414的关键。

1968年1月25日晚，蒯大富和414《12.25战团》《向东支队》座谈时，公开表示：“414是由代表保蒋、否定文化大革命势力的《东方红》控制的”；并透露：“春节后我们将大力揭发他们是如何操纵414的，连我们都感到惊人”³，蒯大富的这段话说明，团总部已经预谋，要通过抓一批414的人，逼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供来压垮414；蒯大富的这段话还说明，团总部的目标，是全力打击414内与蒯大富斗争最坚决的《东方红战团》。我们注意到，这时团派已经绑架李康一个月左右。

1968年7月15日，蒯大富回应谢富治关于停止清华武斗的要求时提出“蒯四条”，其中第二条就是：“宣布沈、陈、张、刘等四头头为反革命”；沈（沈如槐）、陈（陈楚三）、张（张雪梅）、刘（刘万璋）四人均为414总部核心委员，且都是《东方红战团》成员，从而再次表明了蒯大富全力搞垮《东方红战团》的目标。

2. 绑架吕应中、李康、罗征启，揪414的“黑手”

毕竟414是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也是学生为主体，蒯大富只能说“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还算是“革命小将”，要抓就要抓414后面的“黑手”，而只有干部、“走资派”才有充当“黑手”的资格；蒯大富们宣布，“我

¹ 见米鹤都采写，《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

² 引自陈育延回忆：《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进清华园我亲历了武斗的结束和两派相反的态度》，载《史实与求索》第12期。

³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324页。

们的对手，根本不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什么 414，而是躲在 414 背后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和一批坏干部，而是操纵着 414 的一只黑手”¹。

于是，支持 414 的、特别是观点鲜明又有一定影响的干部，就成了蒯大富们抓“黑手”的对象。

起初，是把以吕应中为“黑少帅”，包括罗征启、谭浩强等人在内的所谓“蒋刘反党集团”的“第二套班子”作为“伸进 414 的黑手”“414 里的坏干部”，并于 1967 年 12 月 4 日绑架吕应中；绑架吕应中后的第三天，就宣称“吕应中、罗征启、谭××的基本队伍，就是臭名昭著的 414 东方红战团”²，把“黑手”和《东方红战团》挂上了钩。

对于吕应中，蒯大富起初想拉拢，曾表示“希望吕应中走上革命的道路……‘三划一站’作得好，还可以担任领导工作”³，在绑架吕的前一天还和鲍长康一起到吕家中，软硬兼施要吕“亮相”到团派未果，才实施绑架⁴；蒯大富的如意算盘，应该是企图从吕应中入手挖出一个干部中与《东方红战团》关系密切的“集团”，但一方面“证据”不足，另一方面吕的人际小圈子（能否加以“集团”之名）和活动范围（与《东方红战团》的关系）也难以达到蒯的要求。

通过关押刑讯李康，实现了绑架吕应中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的。

团《井冈山》报说，李康“于 67 年 1 2 月底被我兵团隔离审查，在我兵团的有力斗争下，现已被迫低头认罪”⁵，所谓“认罪”，就意味着“证据”。

李康的人际小圈子，可以说成是“集团”，而这个“集团”中的罗征启，与 414《东方红战团》的一些成员有密切联系；于是，1968 年 1 月 30 日又绑架罗征启，意图深挖他们与 414 总部、特别是《东方红战团》的关系，以找到蒯大富关于“他们是如何操纵 414”的更有力的所谓“证据”。

3. 绑架邢竞侯、贾春旺，造谣 414 有个“陈伯达专案组”

无论怎样宣传罗征启他们是“伸进 414 的黑手”，都不足以搞垮 414；蒯大富一伙认为，要真正搞垮 414，就必须把 414 的“司令”及其“死党”——即沈如槐和《东方红战团》打成反革命。

¹ 见《井冈山》报增刊（1967. 12. 21）。

² 见《井冈山》报 102 期（1967. 12. 7）。

³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 294 页。

⁴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 301 页。

⁵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 340 页 131 期合刊（1968. 4. 5）133 期合刊（1968. 4. 12）《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

《东方红战团》的周泉纓写过太多篇大字报反陈伯达，而沈如槐始终不认为周泉纓是反革命，虽然周泉纓不是414的核心人物，但沈、周的行为却显示出《东方红战团》反陈伯达的倾向；“反陈伯达”成为蒯大富们搞垮《东方红战团》的抓手。

1968年3月16日，团保卫组绑架邢竞侯；3月27日绑架贾春旺。从4月5日起，团《井冈山》报就不断造谣说，414设立了“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就是张雪梅、贾春旺”¹。贾春旺是团委干部，曾与沈如槐等人于7.20事件后赴武汉调研，而张雪梅则是414总部的核心委员，并于7.20事件后在武汉设立了414联络站。

蒯大富一伙宣称，414的“陈伯达专案组”是“沈如槐们指使414几个战斗组组成”²，这是在为绑架更多的414人员制造借口。在蒯大富一伙的策划中，沈如槐“指使”的“几个战斗组”一定要属于《东方红战团》。沈如槐所在的《千钧棒》、陈楚三所在的《战地黄花》和张雪梅所在的《八八探照灯》，这三个战斗组都是《东方红战团》的骨干战斗组，肯定被蒯大富们内定为所谓“陈伯达专案组”的成员。已被绑架的邢竞侯是《战地黄花》的，被封为“组长”的张雪梅是《八八探照灯》的，所谓“副组长”贾春旺则与《千钧棒》关系密切；蒯大富还要继续抓人。

4. 继续绑架支持414的干部，制造“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

让蒯大富始料不及的是，罗征启3月27日从团专案组成功逃脱，随后4月3日绑架其弟罗征敷又暴力致其死亡，使团派陷于被动；这反而更强化了他们把罗征启等人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决心。

在罗征启已经被骗自承“反林副主席”的基础上，蒯大富一伙又绑架了文学宓、刘承娴、饶慰慈，严刑逼供指供、横加反毛反林罪名，终于制造出“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蒯大富以“肖达”为笔名撰文，宣布“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是老保414核心的黑参谋部，罗征启是这个参谋部的黑参谋长”，罗征启被陈继芳冠以“414东方红核心组联系人”“414写作班负责人”“东方红形势讨论组核心组成员”³；团《井冈山》报则宣称，“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是414的领

¹ 见《井冈山》报130、131期合刊（1968.4.5）和135、136期合刊（1968.4.19）。

² 见《井冈山》报135、136期合刊（1968.4.19）。

³ 同上。

导核心和决策参谋部，操纵了414的整个大方向”，并借李康之口说“六人小组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主要通过《东方红》核心组付诸实践”“和《东方红》核心组互相配合，进行分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翻案复辟的活动”，并且“罗征启早就是《东方红》核心组成员”¹。于是，罗征启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什么“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形势讨论组”“414写作班子”的重量级人物。

5. 继续绑架414人员，制造“十二人反党集团”

蒯大富们虽然捏造出什么子虚乌有的“陈伯达专案组”给414栽赃，但他们自己就反陈伯达，坦承“搜集了好多陈伯达的材料”²，大约觉得以此罪名搞不垮《东方红战团》，又处心积虑，继续绑架414人员，除了《东方红战团》，其他被认为可能“有料”的（如广播台人员）也不放过，企图获取414“恶攻”的“铁证”。

被团派封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的张雪梅回忆，在1968年4月份，团派曾经企图绑架她，幸而有人给她通风报信躲过了。4月底5月初，团保卫组曾到13号楼力03班宿舍抓捕宋执中李燕翔，当时宋李不在未能抓到，在场的胡逢淦与团保卫组争执被打伤住院，宋李胡三人都是沈如槐所在《千钧棒》战斗组成员，7.20事件后，宋曾随沈如槐到武汉调研，李则参加了414武汉联络站；5月9日，团派企图绑架414广播台鲍朝明（女）未遂。

从5月7日到9日，三天内团派先后绑架了人事处档案科朱×等六人，414“干办”成员、自零学生姚×，物八学生赵××，以及谢引麟、黄安妮、张琴心，“团派大搞白色恐怖，这些天来便衣绑架414成风”³。

以后又绑架了董友仙、楼叙真等414女同学。其中，董属于《东方红战团》的《一月革命》战斗组，楼与《东方红战团》的《小鹰》战斗组关系密切。

同时，蒯大富们把捏造的414“陈伯达专案组”升级，造谣说“414成立了12人‘中央首长专案组’反革命小集团，大整无产阶级司令部各成员的黑材料”，“其组长就是张雪梅”，贾春旺则被封为“副组长”⁴。

这就是蒯大富们挖空心思制造出来的所谓“十二人反党集团”。

¹ 引自所谓“李康认罪书”，见《井冈山》报141、142期合刊（1968.5.24）。

² 引自米鹤都《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

³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第346页。

⁴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第340页131期合刊（1968.4.5）133期合刊（1968.4.12）《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

蒯大富们处心积虑要给414栽赃，而且如俗语所说“造谣不打草稿”，就不想想，414如果真要找几个人整“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人的“黑材料”，怎么会傻到命名“陈伯达专案组”或者“中央首长专案组”？

6.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合二为一

蒯大富们对所谓“十二人反党集团”被绑架的贾春旺和邢竞侯等几个学生毒刑拷打，除了一些对陈伯达的猜疑、对江青“文攻武卫”讲话的评论之外，并没有得到414任何反毛、“恶攻”的钢鞭材料，于是硬说“罗文李饶六人小组反革命决议实质上是一次一次成为沈如槐东方红战团的行动纲领，得到了他们完满贯彻”“罗文李饶等六人小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等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个反革命集团已经完全成为414的政治轴心，主导了414的政治方向”¹，把414总部核心组中的三名《东方红战团》成员诬陷为捏造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成员，《东方红战团》成了被这个“反革命集团”控制的行动组织；接着，干脆把“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合二为一，变成“沈如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²，原来陈继芳把罗征启定为“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现在沈如槐成了“沈—罗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³。

既然毒刑逼供也得不到414反毛、“恶攻”的证据，团专案组干脆自己编造出414开过“黑会”讨论“九大的人事安排”的谎言，并刑讯逼迫被关押人员承认；然后蒯大富一伙便耸人听闻地宣布，“这个反革命黑帮集团的最高纲领，就是企图在九大配合资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⁴，“他们的最高纲领是准备在九大上搞掉林副主席，搞掉伯达同志，搞掉江青同志，进而推翻毛主席的领导”⁵。

显然，说这些学生和最高不超过局级的中层干部开“黑会”去讨论“九大的人事安排”“推翻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匪夷所思的谎言，虽然没有什么清华人会真的相信，但却凸显蒯大富们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险用心。

¹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日志第340页131期合刊（1968.4.5）133期合刊（1968.4.12）《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

² 见原蜀育、邱心伟编日志第340页131期合刊（1968.4.5）133期合刊（1968.4.12）《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

³ 见《井冈山》报152期（1968.7.19）。

⁴ 见《井冈山》报150期（1968.6.28）。

⁵ 见《井冈山》报151期（1968.7.5）。

五、“两案”抓人的由头及过程

团保卫组抓414的人，其实不需要什么借口，蒯大富说：“抓人一般都是我下命令抓的”，蒯大富的命令就是抓人的依据。对于“两案”，蒯大富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这是我给定的”¹，理由就是“恶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1. 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

也被团派称作罗文李饶“六人小组”，这六人是：罗征启、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徐一新。罗征启回忆，1967年4月，他们在工字厅组织了一个“学习组”，成员就是这六人，文学宓为召集人²。

原团派总部委员孙耘说：“我们掌握一些材料，揭发罗征启反对中央文革，讲过‘极左的根子在林彪’这样的尖端言论，根据‘公安六条’足以将他定为反革命。于是，总部决定派保卫组和代表队一起抓捕罗征启。1968年1月30日大年三十，罗征启回家过年时被抓获”³。

实际情况也许和孙耘的说法有出入。所谓“尖端言论”，很可能是在抓了罗征启后才被专案组“骗”到手的。

1967年底，团《保卫组》首先关押了“六人小组”中的李康；一个月后才绑架了罗征启。前引蒯大富1968年1月25日的谈话表明，团派起初的目标是“挖掘”罗征启等人和414总部的关系、特别是和《东方红战团》的关系，以坐实“414头头的确是保蒋的一套班子”，坐实“414是由代表保蒋、否定文化大革命势力的《东方红》控制的”。

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就在蒯大富上述谈话的同一天，团《井冈山》报第112、113期合刊登载文章《清华“桃园”里的罗征启》，批判罗征启1964年在土建系搞“假四清”，只说他是“黑手”“蒋刘反党集团的心腹死党”；同一天，以“414《12.25战团》”名义写的大字报《打倒派性，把钻进我们队伍的坏干部李康揪出来示众》⁴，也只说李康是“挑动派战的大黑手”“钻入我们414的坏干部”。罗征启回忆，被团派绑架后的初次“审问”“问得最多的，是414

¹ 引自米鹤都《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

² 见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第34页。

³ 引自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见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143页。

⁴ 载于1968年2月15日团《井冈山》报第116期。

总部内部的情况。他们没想到我一次总部的活动都没参加过”¹，后来冯家驷拿着说是李康的交代材料，“他们念了几段内容，我觉得根本就对不上号”，“我不了解总部的情况，李康比我更不了解”²。

直到1968年4月5日，团《井冈山》报130期的文章《打倒地下复仇军的黑干将罗征启》，才给罗征启上纲到“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样上纲的背景，一是团专案组骗取到罗征启自承“反林副主席”的口供，二是罗征启3月27日成功逃离三堡，团专案组4月3日抓其弟罗征敷致死，涉事的孙耘等三人被公安机关扣留。

为什么说团专案组是“骗取”罗自承反林的口供？在罗征启被关押期间，打手冯家驷曾给他看一张有他签名的字条：“印甫盛说过，林彪是极左思潮总根子”，罗回忆说：“签名似乎是我写的”，但“我不记得我签过这个字条”，“我怀疑是我在罚站到精神恍惚、神志不清时他们拿给我签的字”，来不及判断真伪，立即揽过来“这不是印甫盛说的，是我说的”³。按正常思维，当时的环境下，即使真有此事，以罗征启的谨慎、机警和正直，也绝不可能留下这样指名道姓“恶攻”而且“出卖朋友”、还签上自己名字的书面证据；连“作为负责人之一全程参与”审问的孙耘都表示，涉及印甫盛的“这句话我毫无印象”。罗征启回忆，每次审讯的记录，都要求他“签名按指印”；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字条上罗的签名是伪造的。

至于抓捕罗征敷致死，孙耘说，“我们进班房的三人都是校体育代表队的成员，当传出可能判刑的消息后，以代表队成员为主导的专案组自然更为着急，就力图把‘现行反革命案’做实做死，以减轻我们的罪责。我总觉得，这是他们扩大为‘罗文李饶专案’并大搞逼供信的一个心理因素。”⁴当然，“扩大为‘罗文李饶专案’”肯定不是专案组自己就能定的，而是蒯大富、陈继芳拍的板。

1968年4月14日，团专案组绑架了文学宓、刘承娴；饶慰慈因外出当天未抓到，后来为避免亲人受牵连，饶慰慈主动去团总部“报到”。

六人中，罗征启被绑架后虽遭刑讯逼供，但58天后逃出，徐一新在科学馆内未遭绑架，其余四人在蒯大富的魔窟中饱受毒刑折磨，刘承娴被迫害致死，饶

¹ 见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第47页。

² 见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第80页。

³ 见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第120页。

⁴ 引自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见孙怒涛《良知的拷问》第146页。

慰慈落下终身残疾，文学宓被打得尿血，还被冯家驷掰断三颗牙。

2. 所谓“十二人反党集团”

团《井冈山》报并没有明确提出“十二人反党集团”，而是提“12人‘中央首长专案组’反革命小集团”，但团派“打倒清华414十二人反党集团”的大标语却不仅在北京到处刷，还刷到了上海。

与罗文李饶“六人小组”的六人有名有姓不同，蒯大富们编造的“12人‘中央首长专案组’”究竟是哪十二人？原团总部核心委员王良生告诉陈楚三，“对所谓12人反党集团我当时从未听说，也没有人向我透露过任何信息。连12人反党集团专案是谁负责，当时我都不知道”“当时从来没人和我说，我当时也不知道有这专案组。一直到军工宣队进校一个多月以后，我才听军宣队一个同志说的”；原团总部核心委员陈育延则表示：“团派所有专案组材料都是鹰派组织掌握的，对鸽派保密，他们不信任鸽派，认为是团老四，所以我不可能知道，直到（指工宣队进校后）交换俘虏，我是主谈代表，专案组才把人员报上来，具体材料内容也不告诉我”。

但是，从陈育延回忆录提供的人员名单，却可以确认，在团派绑架的414派人员中，哪些人被划入蒯大富们杜撰的“12人反党集团”。陈育延自己的日记，记载了团专案组报给她的被关押28人名单，其中罗文李饶“六人小组”被押的刘承娴、文学宓、饶慰慈、李康均被注明是“现行反革命”，刘承娴还被注明“已自杀身死”，贾春旺也被注明“现行反革命”，在押414的学生八人，其中六人即董友仙（女）、谢引麟（女）、黄安妮（女）、邢竞侯、张琴心（女）、楼叙真（女），被注明“现行反革命”¹，但名单中错误标注董友仙为男性；以此看来，这六个学生应当和贾春旺一起，同被归于“12人反党集团”。

这十二人，除了蒯大富们所封的“组长”张雪梅、“副组长”贾春旺，以及已被绑架的前述六个学生之外，其余四人是谁？恐怕只有蒯大富、陈继芳等少数团总部核心头头以及专案组少数人知道。

1968年3月16日，邢竞侯在圆明园被绑架。

414内有种说法，是邢竞侯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与同伴议论时被团派《捉鬼队》的人听到，说414有人反江青，因而被抓；邢竞侯本人则认为是在宿舍闲谈，班

¹ 引自陈育延回忆录第十六章：《清华两派最后的谈判》。

上的团派同学“告密”而被抓。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才知道，所谓“火车上妄议”的说法纯属猜测，班上的团派同学“告密”也只是猜测中的可能因素之一，绑架邢竞侯的直接动因是一封举报信。

2017年10月，原团派总部委员孙耘到加拿大，与当时正在多伦多的原团派总部委员张云辉一起，约也在多伦多的陈楚三餐叙，孙耘是当年绑架邢竞侯的参与者，他就此事托陈楚三向邢转达他的道歉；陈问起绑架理由，孙说有举报信，陈分析此举报信应当是认识并与邢有交往的人所写，很可能是同班同学，但孙不置可否。到2018年，孙耘才告诉汲鹏，举报信是高级党校的两人（夫妻二人）署名。当陈楚三告知邢此消息后，邢认真回忆，的确在1967年秋冬之际，他曾去高级党校，到原在上庄（即北京西郊国营农场）一起搞四清的一位女同志家中，和她夫妻二人聊了一会儿，时间不长就离开了，聊的内容也无非是小道消息和一些看法。

团派抓邢竞侯后的审讯，首先认定他议论林彪江青就是反林、反江，是反革命，然后查究邢的行踪（何时去过何地，同行何人，有何活动等），其中反复追问陈楚三是否在场、有何言行等等，而邢竞侯7.20事件后的武汉之行，引起了蒯大富一伙的高度兴趣，决定借此大做文章。

7.20事件震惊全国，事件后清华414在武汉的活动引人注目。“清华大学414派在（八月）上旬由张雪梅带领在武汉建联络站，发表《给曾刘首长的一封公开信》，写大字报《武汉军区必须大乱》、《再论武汉军区必须大乱》；曾刘接见414代表。414代表会见李迎希，认为他是反对陈再道的夺陈军权的左派。”¹也许，这就使蒯大富们对张雪梅高看一眼，封她为他们捏造的“陈伯达专案组组长”。

蒯大富一伙知道《东方红战团》有反陈伯达倾向，也知道周泉纓炮打陈伯达后是被邢竞侯所在的《战地黄花》战斗组保护起来，正处心积虑要给《东方红战团》栽赃。张雪梅是《东方红战团》的《八八探照灯》负责人，邢竞侯是《战地黄花》成员，当时的沈如槐则带领《东方红战团》的《千钧棒》、《小鹰》等一批人也在武汉调研，《东方红战团》的人扎堆儿在武汉！

¹ 引自徐海亮编著：《东湖风云录》第376页。

1968年3月27日，团派绑架了随沈如槐赴武汉调研的贾春旺；并立即造谣说414有个“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就是张雪梅、贾春旺”。

在对贾和邢残酷殴打、刑讯逼供的过程中，团专案组又把捏造的414“陈伯达专案组”升级，变成414的十二人“中央首长专案组”。

1968年5月8日、9日谢引麟、黄安妮、张琴心被团保卫组绑架。

楼叙真回忆，工宣队进校后的第二天，7月28日，她在北航看大字报时被团保卫组绑架。

董友仙被绑架时间不明。

所谓“12人”，除了已经被团派绑架的七人，以及虽未被绑架但被团派封为“组长”的张雪梅，还有4人是谁？有人回忆说，当年团派曾广播12人名单，但无人证实此说；有猜测说，应该都是当时一同去武汉的人，但已被抓的谢引麟和董友仙并未去武汉；更合理的推测，团派锁定的“12人”可能是：1. 《东方红战团》核心战斗组的成员，2. 和《东方红战团》关系密切的人。

如果推测无误，则已被绑架的7人以及“组长”涉及了《东方红战团》五个核心战斗组：贾春旺和《千钧棒》关系密切，邢竞侯属于《战地黄花》，“组长”张雪梅属于《八八探照灯》，楼叙真和《小鹰》关系密切，董友仙属于《一月革命》；张琴心、黄安妮虽不在《东方红战团》，但与沈如槐张雪梅同时在武汉活动，谢引麟虽未去武汉，但和张琴心、黄安妮关系密切，她们也被认定参与了《东方红战团》的“黑会”。

蒯大富、陈继芳以为，制造出这样一个“十二人反党集团”，《东方红战团》就死定了，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等414头头就死定了，整个414就死定了。

3. 江青过问了清华“两案”？

清华“两案”本来就是蒯大富一伙为搞垮414而蓄意捏造出来的，但两派都有人要把“两案”和江青挂上钩。

团《井冈山》报第149期（1968年6月28日）以1、2、3三个整版和4版的半个版面刊登团总部《清华运动两个月总结》的长文，其中特别提道：“在414的领导核心中揪出了沈一罗反革命集团时，江青同志又明确指示北京卫戍区，成立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专案组”。

我们对此求证时，只有老蒯回答“确认”，而原团总部核心委员王良生说：“我可以明确的回答，江青从来没有指示成立罗文李饶专案组，她也从来没问过此事。老蒯曾经拿着罗文李饶交代材料中摘抄的部分内容向谢富治汇报过，谢瞅了一眼，说：这些东西我不敢看，你们也别扩散。你们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打人，把人打坏了，你们将来就交不了账。你们应该把他们移交到北京公安局。”孙耘的回答是“与江青无关”；询问过的陈育延等其他团总部要员也表示不知道江青有此“指示”。显然，这是蒯大富一伙惯用的造谣手法。我们前面已经揭露，团《井冈山》报造谣傅崇碧接见沈如槐、张雪梅，没想到这一次，造谣竟然造到江青头上！

事实是，蒯大富把逼供信得到的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材料上报后，北京卫戍区吸取了战歌事件的教训，并没有轻易相信蒯大富上报的东西，而是由李钟奇副司令员带了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据《联合风暴》第169期报道，李钟奇强调指出：“一方说是坏人，一方说是好人，我们要进行深入调查。”“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能产生于调查的先头。”

五十年过去了，原414派竟然也有人说，所谓“12人反党集团”是江青授意让蒯大富搞的。据说是当年414认为武汉7.20事件真相并没有报纸宣传得那么严重、而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导致武斗升级，传到江青那儿，导致江青记恨，因此让蒯大富查处。

如果说团派关于江青指示成立“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专案组的说法只是宣传的需要、并无事实根据，原414派却有人举出江青让蒯大富查“12人反党集团”的所谓“证据”：毛泽东7.28召见“五大领袖”时，江青说“有人反我！”毛泽东回应“人家在屋里说说，又没写大字报”。想以此说明，江青说“有人反我”的“有人”就是清华414。

很可惜，这个“证据”是张冠李戴，江青说“有人反我”的“有人”指的不是清华414，而是北大井冈山。韩爱晶对这次五个半小时的召见有详细记录，摘录有关的段落如下：

江青：“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江青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

死……”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毛泽东这里说的“宰牛杀猴断羊腰”，是当时北京大学聂元梓一派提出的口号，“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都是北大井冈山的头头。联系前后文就很清楚，“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这句话指的是北大井冈山反江青的事，而不涉及清华。

所以，清华“两案”完全是蒯大富为剿灭414而精心制造的冤案，和江青没有半毛钱关系。

六、“两案”的组织机构以及逼供手法

团派打手们的凶残暴虐，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难以相信的。

团保卫组是团派搞打砸抢抄抓的专门机构，前述宿长忠、郭仁宽、唐海山、李兆汉、卢振义、陈楚三等人被抓被打，肋骨断、肾出血，都是团保卫组的“功绩”；至于清华“两案”涉及的414干部、学生，则是由团保卫组出面绑架后，移交给团专案组刑讯逼供。团保卫组、专案组之外，也有团派少数极端分子丧尽天良，如《前哨台》把孙华栋活活打死。

团总部的“两案”是从抓罗征启开始的，头头挂帅，组织严密。起初称为“130支队”，应为表示立案日期（罗征启被抓日期），孙耘是负责人；随着被绑架的学生、干部增多，后扩大为“罗文李饶专案组”。

客观地说，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小道消息满天飞，不论是团派还是414派，私下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除了毛以外的成员几乎司空见惯，但根本不能构成“恶毒攻击”，而团专案组却是捏造出大量“恶毒攻击”言论，通过各种逼供信手段迫使受害人承认。 1

1983年11月底，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整办”）调查组发出调报字【83】3号文，指出：根据北京市委的调查，清华团派“不少人干了大量坏事”，排在第一的就是“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大搞刑讯逼供”（反

周总理也被列入所干坏事)；文件中关于清华文革期间两派群众组织的资料，列出了两派“问题较多的”机构，团派的第一个就是“罗文李饶专案组”，附件中还简要记述了团派少数打手的毒刑逼供手段。

关于“罗文李饶专案组”，资料指出，蒯大富一伙先后抓捕、关押了罗、文、李、饶以及刘承娴、贾春旺、邢竞侯等人，“为了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组成了100余人的专案组，并按人头分成六个小专案组和专门打人的凶手班子，即专案组内的‘保卫组’。采用极凶残的手段毒打、用老虎钳拔牙、烟头烧脸、灌氨水等残酷手段，严刑逼供，造成2人死亡，数人重伤致残的严重后果。该专案组的直接主持者为团总部核心成员陈继芳，组长王子瑜，副组长王良生、王士元；‘罗征启专案组’组长王子瑜（兼），‘文学宓专案组’组长李天麟，‘李康专案组’组长朱以文，‘饶慰慈专案组’组长阎德成，刘承娴专案组’组长夏毅，‘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个学生专案组’组长王士元（兼）”。

这六个小专案组，前五个自然是针对所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而“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个学生专案组”则是专攻所谓“十二人反党集团”；当然，要是蒯大富陈继芳如愿抓到了他们捏造的十二人“中央首长专案组”中的其他人，这第六个小专案组名称也会随之改变。

团专案组如何进行毒刑逼供？请看资料附件中对一些人“主要问题”的记述：

李天麟，“审讯罗、文，用残酷刑罚毒打逼供，罚站九天九夜”；

朱以文，主持组织对李康刑讯逼供”“毒打文学宓”；

夏毅，“毒打刘”（指刘承娴）、“致使刘跳楼受伤，后又强迫刘提前出院，对刘的迫害致死有直接责任”；

阎德成，“主持组织对饶刑讯逼供，将饶臀部打烂，形成残疾”；

李木松，“专门打人，以打人取乐。1968年4月14日对被关押的干部轮流毒打一遍”；

陈奋光，“专门打人，用酷刑毒打逼供。在1968年4月14日对被关押的干部轮流毒打一遍”；

冯家驷，“主要打人凶手。他采用各种刑具拔牙、灌氨水迫害干部”；

唐元时，“主要打人凶手。刘承娴跳楼前，对刘进行残酷折磨，打耳光、连续摔打、烟头烧脸、脚踢腹部、用棍子捅……对其他被关押的干部、群众也打过”；

肖元星，对贾春旺“用皮带、皮管、木棒打屁股和腿。当贾全身是伤时，还逼贾做下蹲动作和仰卧起坐”，“还打过罗征启、黄安妮等”；

沈石楠，“多次毒打李康，还参与对文学宓和饶慰慈的刑讯”；

周启柔（女），“专案组中搞逼供信的骨干。主审文学宓和贾春旺等，在审文过程中，用铝管、竹棍、扫帚把打文的脸部，打肿左脸又用匕首去划破右脸”；

宋恩宽，“用方木打李康、贾春旺的腰，头撞墙，烟火烧脸”；

孙万华，“专用方木打人，多次毒打文学宓，打肝区，踢小腹，用椅子压脚趾，致使文学宓尿血昏过去”；

常焕生，“多次毒打文学宓，打肝区，踢小腹，用椅子压脚指，致使文学宓尿血昏过去”；

韩锡九，“两次罚贾春旺举着橛子站七天七夜。用皮靴踢、踩，使贾有严重内伤”；

章和邦，虽然不是专案组成员，但也参与刑讯逼供，“参加对罗征启、文学宓等同志的刑讯逼供。68年5月31日，章伙同打人凶手唐元时残酷毒打刘承娴同志，采用扫堂脚、踢肚子等法西斯手段毒打折磨，致使刘于当天下午跳楼重伤，而后死亡”。

除了团专案组，资料附件还列出其他团派头头和骨干的问题，例如：

刘才堂，“指使司机李正明开车压死对方武斗人员谢晋澄”；

陈继芳（女），“策划、组织、指挥‘罗、文、李、饶’冤案，迫害干部”“参与武斗策划，‘5.30’武斗由她负责运来汽油火烧东区浴室”；

任传仲，“‘7.27’武力对抗工宣队，亲自刺伤两名工宣队员”；

谢德明，“在攻占三号楼时把对立派学生姜文波抓来毒打，致使姜跳楼身亡”；

吴慰庭，“无故活活打死无线电系学生孙华栋”。

有人说，这些人的“问题”是文革中“清查五一六”时的“黑材料”，是“官方逼供信”的产物，水分多，靠不住；但是以上的这些记述，哪些不是事实？质疑者却回答不出。

就我们所知，上列诸人的资料，可能有两件与事实稍有出入：一是李天麟，“审讯罗、文，用残酷刑罚毒打逼供”完全符合事实，但“罚站九天九夜”或许不准确，只从罗征启回忆中得知，“文学宓说他站了五天五夜”，他本人被罚

站三天三夜 80 小时；另一个是陈继芳，资料中说“她负责运来汽油火烧东区浴室”“油”确实，“汽油”可能有误；还有一件与事实有大的出入，就是任传仲，资料说他“亲自刺伤两名工宣队员”，实际上他“一人就用长矛刺中七名工宣队员的腰或腿或臂部。”¹

倒是应当指出，团专案组残酷刑讯毒打逼供的资料，基本上是关于干部的，只有一句涉及学生黄安妮，这是很大的不足。谢引麟在魔窟里“经常连续站几十小时”“连续站了五天五夜”，还“双手举凳子”“连续跪了几十个小时”，以及邢竞侯、张琴心、黄安妮、董友仙、楼叙真等人所受酷刑折磨，资料中都没有，十分遗憾。

从这个资料附件可以知道：团专案组的“直接主持者”陈继芳，以及主要执行者王子渝、王士元，是知晓“两案”的“来龙去脉”并了解这段最血腥、最黑暗、最恐怖历史真相的知情人；

参与对罗征启毒刑逼供的有：冯家驷、李天麟、孙耘、肖元星、章和邦等人；

参与对文学宓毒刑逼供的有：冯家驷、李天麟、孙万华、常焕生、唐元时、李木松、陈奋光、朱以文、沈石楠、周启柔（女）、章和邦等人；

参与对李康毒刑逼供的有：朱以文、沈石楠、冯家驷、宋恩宽、唐元时、李木松、陈奋光等人；

参与对饶慰慈毒刑逼供的有：冯家驷、阎德成、唐元时、李木松、陈奋光、沈石楠等人；

参与对刘承娴毒刑逼供的有：夏毅、唐元时、章和邦、冯家驷、李木松、陈奋光等人；

参与对贾春旺毒刑逼供的有：冯家驷、肖元星、韩锡九、宋恩宽、唐元时、李木松、陈奋光、周启柔（女）等人。

我们点出这些人的名字，并不是要追究责任，而是因为这些人（除孙耘外）至今没有为他们当年丧失良知、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向受害者表示过真诚的忏悔和道歉。

资料附件点了团专案组中“记录在案”的 19 人，实际上参与刑讯逼供的专案组人员远不止这 19 人，谢引麟的控诉中就提到这 19 人之外的两名女生也对

¹ 引自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载《南方周末》2001. 3. 22。

她刑讯逼供。谢引麟指出：“前前后后毒打过我的人，不只是几个人，而是一帮人。那些站在旁边，以看我挨打作为消遣取乐的人也是一帮人。现在，我并不能确切地说出这两帮人到底有多少？是10多个还是20多个？但是那一张张狰狞的面孔，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有“好心人”指出，前述这些人之中，有不少在“清查五一六”“揭批查”“清理三种人”等多次运动中反复挨整，心灵创伤很重，不愿提及往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挨过整，就可以抵消他们丧失人性、毒刑摧残老师同学的罪行吗？相反，他们挨整心灵受创，应该由此对因自己的罪恶行为给受害者不但造成心灵重创，而且造成身体伤残的后果有更加深刻的感受，从而痛切反省，并向受害者真诚道歉忏悔；说什么因挨整心灵受创而不愿提及往事，其实只是拒绝忏悔道歉、坚持错误、掩盖真相的借口而已。

团专案组采用毒刑逼供获取被害人的所谓恶攻“证据”，他们最常用的逼供手法是诱供和指供。他们用毒刑拷打逼取供词，每得到一句他们觉得有用的供词就用录音机录下来或让受害者写下来，最后断章取义、加工修补成一个可供定罪的“供词”，刑逼受害者照抄或照念录音。

如果得不到他们所要的供词，他们就自己编造，用毒刑拷打逼迫受害者承认这些编造的东西；或者编出一套供词，用毒刑逼迫受害者照抄签字；或者干脆拿出誊抄好的一套供词，用毒刑逼迫受害者签字、按手印。然后用甲的“供词”去攻乙，用乙的“供词”去攻丙，再用丙的“供词”去攻甲。

团广播台反复播放、团《井冈山》报141、142期合刊（1968.5.24）登载的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四人的所谓《认罪书》，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所谓“十二人反党集团”贾春旺以及邢竞侯等同学的“罪行材料”，也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七、良心的拷问将伴随“两案”加害者的一生

“十二人反党集团”受害人之一谢引麟定居美国波士顿，当她得知陈继芳也在波士顿后，曾托人带话给陈继芳希望见面弄清真相，陈继芳竟然回复说“不认识谢同学，也就不必见面了”，为此谢引麟请带话人转告陈继芳：“不认识谢同学？如果1968年5月8日之前，你说你不认识我，那之后，你怎么会不认识呢？”

不认识，你为什么抓我们？”“事实上，你是不愿意见面，你无法去面对我们的问题，你回答不了。”“我的问题是：你们老团的决策人是如何捏造出十二人反党集团的？这个问题，作为总负责人的你是能回答的。你可能说具体的事情你不知道。在老团监狱的三个月里，我们所受到的肉体上及精神上的法西斯般的折磨，我们自己会向全世界揭露，不要你说细节。你们的毫无人性的暴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地、进一步向世界揭露。”¹

清华“两案”的加害方有关人员至今不肯揭露真相，企图让这段历史被尘封、被遗忘。然而，“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清华的文革史上最血腥、最丑恶的这一页如果缺失，就不是真实的清华文革史！

人们都在谈论清华文革两派的“和解”“宽容”，实际上对于原两派的绝大多数，“和解”早已是事实，即使对一些问题的认知有分歧，也能“宽容”，唯有“两案”的加害者，隐瞒真相、装聋作哑，怎么可能得到受害者的谅解？怎么可能得到包括原团派在内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的谅解？

如果说樊思清开枪，也许是扣动扳机时的“一念之差”，那么团派少数人在几十天至几个月长时间内对“两案”受害人的种种惨无人道暴行，只能用这少数人“没有良知”“丧失人性”来解释。

谢引麟告诫陈继芳：“人难免犯错误。敢于忏悔，上帝是能原谅的。否则你良心的拷问会伴随你的一生。”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两案”的其他加害者：敢于忏悔，上帝是能原谅你们的；否则，良心的拷问会伴随你们的一生！

【述往】

父亲经历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

王端阳

“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早已尘埃落定，但一些历史的细节尚不清楚。我父亲王林在文革中有三份交谈及此事，提供了此案最初的情况。三份交代分别写于1967年、1968年和1969年，内容基本相同，为阅读方便，我选择1968年的

¹ 引自谢引麟与团派带信人的微信聊天记录 250。

为范本，所缺之处在注释里加以补充。

1968年的交代：关于李楚离的情况

李楚离，原叫李通良，后来在狱中叫李即吾。

我认识他是一九三〇年春，介绍人是我中学的同学过家和（又名过一民，李大钊时代的共产党员），当时我只是个赤色群众。过家和给我介绍李楚离，是叫我听革命故事，提高政治觉悟。过家和说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暴动。当时我和李的关系只是朋友关系。在他住的公寓里见过他几面之后，因为他搬家没有告诉我新搬住处的地址，我也因为在这一年五月初，由李续纲（文化大革命前在北京市人委工作）介绍参加了共青团，工作忙了，就跟李楚离断绝了朋友间的来往。后来又听说李楚离被捕入狱了，怎么被捕的，在哪个监狱扣押着也不知道。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叛徒李素若（抗日期间因托匪关系被我八路军处决）叛变自首，从北海西草岚子胡同伪“军人反省院”出来，见到过家和说：“李通良（李楚离原名）也在军人反省院里扣押着，他已经成神经病了，谁跟他说王明召开四中全会引起党内斗争、党内分裂的问题，他就说：‘我们党不会分裂，你是造谣！你是叛徒！’疯狂地骂人。我看李通良完了，疯了，神经病了，不可救药了！……”过家和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和过家和都认为李楚离在狱中的那种表现，是一个党员因长期关在狱中，不了解外边的情况，而对党的起码的忠贞。所以很同情。于是过家和出钱，我跑腿，给李楚离往狱中送过一次或两次吃的东西。

后来，过家和向我说：“北海西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的狱长（具体名称忘了），还是我本家的一个叔祖父。”因此他倡议说：“咱们想法把李通良弄出来吗？”我说：“那太好啦！你有人、有势，全看你啦！”他说：“好，我奔走试一试。”

过家和是国民党老西北军冯玉祥的财政干将过之瀚的侄子（过之瀚的儿子过家芳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李大钊时代的党员，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时给国民党冯治安部当师长，在火线上起义，文化大革命前在安徽军区当副司令员），过家和本人也是西北军某干将的门婿，这时他在北平宋哲元二十九军当什么差事（详情不知），但是他这时还没有恢复党的关系，据说后来不久就恢复了党籍。

（在淮海战役中，他所联系的过家芳部在火线上起义成功后，他被国民党刺杀而死。）

一九三六年夏，过家和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李楚离奔走一些日子以后，见到我说：“李通良出狱的事不好办，因为国民党有规定，刑期不满提前出狱，必须办理自首手续。”过家和觉得自己不能劝同志叛变自首，因此他就不再奔走此事了。

我这时与黄敬几乎天天见面，就把上述的情况随时告诉了黄敬（黄敬此时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起初他对此事没有表示过任何态度。后来大约在六月底或七月初，黄敬忽然很严肃地向我说道：“有件工作，需要你去做一做。你不是跟你的姓过的同学要救一个押在狱里的同志吗？”我说：“是啊。”他说：“党中央很关心这些在狱里押着的老同志们，考虑到华北的局势，随时都可能有变化，有突然被日寇占领的可能，像沈阳‘九一八事变’一样，一晚上成了日本的。如果华北沦陷在日本手里了，这些同志们可就出不来啦。同时外边又非常缺少干部，急需这些老同志们出来工作。因此组织上决定叫他办手续赶快出来工作。”我一听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免一惊愣。黄敬见我一惊愣，更加严肃地加重语气申明道：“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而不是他个人的动摇变节！你要利用你那姓过的同学的特殊关系，找个方便，把组织上这个决定告诉李楚离，叫他赶快办手续出来工作！”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先找过家和（在他叔父家中）要他向他叔祖父要求在狱中规定的一般犯人家属探亲时间以外，允许我单独接见一次李楚离，过答应了。下一次我找到他时，他说：“说好了，你到那个军人反省院的收发室找某某（姓名忘了），一说你叫什么，他就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了。”我记下那个姓名，后来就到伪军人反省院去了。到门口收发室一提找某某，正好就是他本人值班。他叫我到那个接见犯人的大铁栅栏前等候。不久，李楚离趟着铁镣出来了，后边还有个警察跟来监视。

我们隔着铁栅栏说话，警察坐在一旁不远处，因此不能自由谈话。我只得用隐语（以“老子”代表党中央，以“母亲”代表地方组织）把黄敬叫我转达的党中央和地方党的意见原词转达给李楚离。他起初好像没有听明白，表现吃惊之状。后来听明白了，立刻热泪盈眶，痛苦地摇摇头说道：“我已经坚持奋斗六七个头啦，剩下的刑期有限啦，我不能最后倒落个叛徒出去！”我继续用隐语，用党

的名义说服他。他含着泪花，警惕地看着我审问：“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代表组织来的？”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是代表党组织来和他谈话的，只好仍然重复黄敬告诉我的话劝他。他不等我说完，恼怒地一转身，毅然决然地趟着大铁镣当啷当啷地转回牢房去了。

我木然良久，回去汇报给黄敬。黄敬听了低下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说。以后他再没有叫我做这项工作。不多几日，党组织上就派我到西安东北军张学良部当学兵做地下工作去了，再也不曾管问此事。李楚离在抗日战争以前出狱的，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见过他，也没有通过信、通过电话、电报之类的，因为没有事。

上述情况，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审干时，在本组内谈过。建国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几年前，写我自己的档案材料时也写过。这些材料都存在市委档案库里。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说明：

第一份交代写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相对较短，原件交给了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此件是后来从大字报上抄回的，所以后面特别加了个注：此件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抄于南大“八一八”。接受教训，我父亲再写交代时，都用一种单面复写纸复写一份，把原件交上去，还不留痕迹（造反派不让复写），复写件就保留下来。南大“八一八”，是与南大“卫东”对立的组织，天津人称之为“南老八”，他们在文革中最大的历史“功勋”，就是揪出了“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并得到中央文革的表扬。

第三份交代写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日，比第二份交代精简了一些，最后说明有补充：上述情况，一九五六年（？）写我自己的档案材料时曾捎带交代过。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七年春我首先向南大“八一八”谈过写过。一九六七年度，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专案组曾多次来查对这件事，我都如实地交代过和写过书面材料。

交代中有个最需要说明的就是李素若。按照当时的历史结论李素若是叛徒，

并于1938年被中共直南特委以托派的名义处决。实际上，李素若于1925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6月，北伐军占领濮阳以后，他筹建了国民党濮阳县党部，任书记长，帮助北伐军筹饷。1929年濮阳温邢固事件后，他积极营救被捕的中共濮阳县委领导人，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1928年至1930年刘锡九利用与刘珍年同胞兄弟的关系，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先后介绍了李素若、李楚离、刘满溪等20多位中共党员到国民党烟台军阀刘珍年部队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1年至1933年，他辗转到了西安，任陕西省参议。七七事变后，他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0月，中共直南特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四支队成立后，李素若担任联络员，为四支队募捐了部分经费，还将家里卖地的钱拿了出来，可是在随后发生的“肃托”中被处决。直至1983年9月，中共濮阳县委才作出《关于李素若同志被错杀的平反决定》。

按照现在的史料记载，营救六十一个共产党员出狱，是过家和通过其叔过之翰进行的。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我父亲已去西安。另外过家和牺牲的日期，我父亲说是在淮海战役之后，与史料不符，应该是他记错了。

关于过氏兄弟再补充几点：

过家和(1908—1945年)，安徽蒙城人，1927年，经彭雪枫介绍加入共产党。1928年6月，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十七军刘珍年部搞兵运，任该部组织科长。1935年，通过其叔过之翰的关系，任宋哲元部军政处中校处员。1936年，参与营救中共党员薄一波等61名“政治犯”出狱。1937年春去延安。1939年任何基沔部中校军需。1945年9月中旬，由蒙城去上海，途经双涧东谭老荒，不幸被国民党暗杀。1983年追认为革命烈士。

过家芳(1906—1998年)，1927年也是由彭雪枫介绍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做地下工作。在喜峰口战斗中，身为营长的过家芳率大刀队冲在前面，亲手砍死一名日本炮兵大佐。七七事变后，接任已牺牲的佟麟阁兼任的军部军事训练团团团长。后任张自忠麾下的五三七团团团长，张自忠牺牲后，是他将张的遗体从日寇手里夺回。抗战胜利后，升任少将师长。1948年淮海战役中，在张克侠、何基沔领导下于贾汪率部起义。后曾任第三十四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区参谋长等职。■

【口述与访谈】

《上班记》选载（一）

何兆武 口述，文靖 执笔

北图编目员

1950年夏天，从革命大学¹政治研究院毕业后，我到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工作，在西文编目组做了两年编目员，与王重民、张申府有过一些交往，下面是我印象中的这两位先生。

1. 馆长王重民

抗日战争以前，王重民先生就在北京图书馆²工作，曾被派到伦敦、巴黎检点所藏中国的古籍。回国后正值抗战爆发，他就负责把一批珍贵的图书运到上海的英美租界。后来又把这批书运到了美国，交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同时他本人就留在那儿，负责管理中国善本书。当时胡适任中国驻美大使，可是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学问，经常找王重民帮他借书。王重民也非常尽力，由此得到胡适的赏识。1946年胡适回国，之后做了北大校长，认为应该专门成立一个图书馆学系，就请王重民回来做系主任，解放后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三反”运动是解放后最开始的运动之一。之前还有个“忠诚老实运动”，让大家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而且每个人都要坦白。比如，女同志交代最多的就是隐瞒了年龄，大概总希望年轻一点。这都无所谓了，不过有人交代了贪污。贪污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千里做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凡有了一点特权，总想着给自己捞些好处。“忠诚老实运动”交代出很多的贪污，而且数量很多，所以就有了后来的“三反”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两百多，一般的没有贪污，也无费可浪。可是党支部有几位领导平日作风跋扈，让大家比较反感，于是纷纷响应号召，起来反对他们的官僚作风。

当时我们还带有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或者说是旧民主主义的思想，认

¹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1950年与他校合并，成立人民大学，详见《上学记·革大学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² 1909年成立的“京师图书馆”，1928年改为“北平图书馆”，1949年更名为“北京图书馆”。本书从何老口语习惯，未予纠正，读者见谅。

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党是不能反的。几个领导都是党员，反对他们就意味着反党，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对民主的新理解。可是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认识，以为这些人违反了党的民主精神，把他们清除以后，党会领导得更好。所以我们干得也很起劲，不说百分之百，至少是绝大部分人都参与了反对官僚主义，搞得非常热闹，结果成了反党。

上级来处理，一批人受了处分，有的开除，有的记大过，我是其中之一。王重民虽然是馆长，但并不是党员，在这件事上没有跟党站在一边，给他的处分是撤职。所以在这以后，他又回到了北大。

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和王先生的爱人刘修业在同一个组，非常熟。1956年我调到历史所，发现她也调到了那里，在资料室工作。那时我家住房有困难，老少四口挤在一间小房里，知道刘修业家有空房。那是解放前王重民在城里买的一套四合院，就在西什库教堂对面的惜薪司胡同——“惜薪司”是明代皇城内十三司之一¹，“西什库”就是明代皇城内西边的十个仓库，魏忠贤曾经就是甲字库的太监。解放后，王先生一家随北大搬到城外，住在畅春园，城里的房子空了出来，我就找她租了三间西屋。刘修业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周末才回北大住，所以我们天天见面，她还把胡适写给他们夫妇的诗拿给我看。80年代（指20世纪20年代，从口语习惯，下同），美国李又宁教授编胡适的资料，曾托我向王夫人借阅，可惜经过浩劫，已不存在了。

文革时候，房子全部收为公有，他们家的这套四合院也在其中。

按理说，王重民的房子不是剥削来的。他们夫妻两人在美国工作了将近十年，存了些钱，回来后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了这套房，而且是用来自己住，属于个人消费品。好比你买衣服是为了自己穿，这跟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一样。马克思所说的“公有”是生产资料的公有，不是说你的衣服也得拿出来、你的眼镜也得拿出来。

纠偏时期²，周恩来曾经有一次讲话，说：“共产主义是指共同生产，至于个人的消费品永远归个人所有。”³可是文革的时候，所有房子全部充公，而且

¹ 惜薪司与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为明代宫内四司。顺治年间，仿明代宦官机构设“十三衙门”，康熙元年被裁撤，大太监伏诛，复设内务府。所谓“明代十三司”，或为民间讹传。

² “纠偏”即“失之偏颇，予以纠正”。建政之初，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常有政策走偏，引起民怨，于是出台新政策加以纠正。但通常不会彻底否定从前，以维护政策的连续性。

³ 未及核查，致歉读者。

是无偿的。所以后来是房管局把房子出租给我，就是说，所有权已经归房管局了。文革后，刘修业曾托我问房子的事，可是房管局一直没人答复，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1975年，王重民在颐和园后山上吊自杀。

当时他都七十多岁了，其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据说，批林批孔的时候“批儒评法”，把中国历史说成是儒法斗争的历史，要把历代的法家都挖出来。比如，明朝末年有个李卓吾（李贽）是反儒的，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于是就把他捧出来。据说当时发现了一部李卓吾的手稿，请王重民鉴定，王先生发现是假托的。领导当然不满意，让他再去仔细审查，结果他找出更多的证据，认为还是假的。于是领导很不高兴，一次开大会的时候说：“有的老右派还不老实，派他个任务，还在那里捣乱！……”这给王重民的压力很大，以为要整他，就上吊自杀了。

据统计，王重民是北大文革期间最后一个自杀的。有人说，那时候已经是文革后期了，如果他不自杀，大概也不会有多大关系。不过我以为，人和物件不一样，物理学可以做实验。比如测验一克金刚钻到底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一吨、十吨，一点一点往上加，但绝不能拿人做实验。运动的时候压力一来，有的人承受得了，有的人承受不了，比如有人可以扛一百斤，有人可以扛二百斤。但不断地加压，等于拿人性做实验，总有人担负不起，最极端的情况就是自杀，白白死掉了。

王重民最后留下一本《徐光启》，只是个草稿，没有写完。文革以后，刘修业请我帮助整理校订和补充，80年代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还得了图书奖。可惜呢……

2. 晚年张申府

解放后，张申府先生也在北京图书馆，每天翻翻国外的书目，推荐购书。那时我刚刚三十岁，而他已经五六十岁的样子。在我看来，他是老前辈。在他眼里，我不过就是个小青年。

张申府属于“五四”那一辈，年轻时就非常活跃，是中国共产党北方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如果顺利的话，他也应当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了。但在1925年，因为意见不合，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其实，他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即便别人是错的，也应该在党内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他还

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作风，“合则留，不合则去”，甩手不干了。

后来张申府在清华教书，一方面做教师，另一方面又从事许多社会活动，不忘情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二·九”和搞“新启蒙运动”，在这一点上也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知识分子的不同。随着西方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大多是专业化的，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所以张申府并不是一个纯学者，甚至在“一二·九”运动中充当起精神领袖的角色，并为此被清华解聘。

“五四”那辈人有两个文化上的背景，第一是他们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按说这对接受马列主义有很多不利的因素，第二就是他们西方文化的背景。张申府是最早把西方哲学介绍给中国的人物之一，他最欣赏罗素，所以满脑子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二战时候，张申府在重庆搞民主运动，主张中国将来的方向应该是孔夫子、罗素、马克思“三结合”，当时就受到左派的批判。我想这大概是他一贯的思想，孔夫子、罗素、马克思在他那里可以并行不悖，大概这也是他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最根本原因。我在历史所工作的时候，党委书记尹达常把一个词挂在嘴边，叫作“八九维克”，就是说，你做的不是十分的布尔什维克，而是打了八、九折。按照这种逻辑，张申府大概只能做到“三分之一维克”。

张申府也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民盟总部搬到上海，北京就由“二张”（张申府、张东荪）负责，后来张东荪为北京和平解放，在国共之间做了很多工作。有一次，我问张申府关于“二张”的事情，他说，他和张东荪之间也钩心斗角。我不大理解，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争权夺利”，我想这也很有可能。

不过总的来说，张申府不是玩政治的人，有他天真的一面。比如1948年底，三大战役都开始了，国民党大势已去，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可是张申府依然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和平》，刊登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影响很大。延安电台马上出来批他，骂他是“中统特务”“美帝走狗”，民盟也把他开除了。如果当初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用他解放后自己的话说，“现在我也是部长了”。再比如，他在恋爱方面的绯闻很多。“三反”的时候我听他做检讨，说自己一生有“三贪”，贪财、贪名、贪色。这些事情他从不隐讳。

张申府最早把罗素和数理逻辑介绍到中国，而且一辈子都欣赏。罗素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又是和平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张和平，被抓起来关了一阵。二战以后，他继续宣扬和平主张，大搞世界和平运动，反对美国称霸，1950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罗素在授奖仪式上发表一篇演说，认为人的本性一是物质的贪吝，一是权力欲，所以对权力要有制衡，这是他一贯的观点。那时我从国外的杂志上看到这篇文，碰到张申府先生，发现他还没有看到，本来我要给他送去，结果他倒自己先跑来找我。可见，解放后他还对罗素还是十分关注的。

解放以后，当然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用老话讲，应该“闭门思过”、“韬光养晦”。可又总免不了发几句牢骚，或者说些冠冕堂皇、应付场面的话。比如1951或52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他说：“现在我们是‘三好’，第一领导好，第二政策好，第三人民好。”我想了想，其实这句话是说不通的。过去我们在蒋介石领导下，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相比较而言，现在的的确是领导好、政策好。可是，古今中外哪有“人民不好”的说法呢？我不知道他说解放后的“人民好”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次开会，我正好坐在他旁边，就请教说：“张先生，您觉得哪几本哲学书值得读，给介绍介绍。”于是他就介绍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其实这本书写得并不怎么样，或者说是有问题。因为里面批的都是自然科学的东西，涉及问题太广，而列宁本人对自然科学未必非常懂，论证显得薄弱，所以现在也不大有人提这本书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也不大相信他就认为写得好。他那么欣赏罗素，为什么不推荐罗素的书？我想也许是一种“言不由衷”。

1962年我在历史所工作，得了个任务，考察近代西方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情形，于是又想起了张申府。那时候，张申府已经戴了右派的帽子，所以我须先请示领导，批准后，才能去北京图书馆见他。我的主要任务是向他了解“五四”期间北大哲学系的情况，他谈了一些，当然也扯了点别的，强调说：“个人因素对历史的作用非常重要，比如中国要是没有毛泽东，就会……”当然这都是题外的话，而且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彼此之间都要有避讳，不能多谈。不过我想，以他的背景，大概不会完全认同当时的一些政策。

3. 牢记一生的教训

30年代我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時候，几乎每周都去北京图书馆借书，印象非常美好。本来我以为，在那里工作的都是学者，或者至少也是喜欢读书的人，所以想去那里工作。可是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样。大部分人都没什么文化，和旧社会小职员差不多，没有任何其他的兴趣与理想，唯一关注的就是拿点儿钱混饭吃，或者一门心思地钻营，拉帮结派往上爬，这些都让我失望。

“三反”运动的时候，北京图书馆过分响应号召，反官僚主义搞得十分热闹，最后被定性为“反党活动”。上面来处理了六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想大概因为我做过研究生，学历高一些，又被选为学习小组的组长，所以定性以后也成了反面的代表。批我的时候，有些东西也挺可笑。比如有个人说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有野心，想当科长。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批资产阶级、批资产阶级思想，可又不太了解，以为凡是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然一心想着升官发财向上爬。当科长算不算野心姑且不论，不过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人。

而且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鼓励“大胆怀疑”，你怀疑我、我怀疑你，相互揭发，弄得人际关系非常紧张。记得1956年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斯大林在提高警惕的借口之下，在同志之间散布了不信任。”[略有出入。1937年，斯大林将国内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在党和苏维埃机关中出现了卑鄙的趋炎附势的人，……在加强警惕性的幌子下，这些钻营无耻的人在党的队伍中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党史研究的任务》，节译自1956年第三期《历史问题》（苏），《人民日报》1956年7月27日第七版转载。]从解放之初就是这样，任何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给你上纲。最开始让大家交代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非常真诚的，甚至近乎宗教的忏悔。可是后来，说了真话反而受到打击，久而久之，人性都被改造了。

总之，这次的冲击对我是个很好的教育，感悟良多，尤其对“民主”的理解，解放前、后有多么大的不同。时至今日我都觉得，参与那次政治活动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也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所以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再没热心响应过，无形中成了一种保护。不过，我还是离开了北京图书馆，经由老同学丁则民介绍，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教了四年书。

教书西北大学

我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了四年书，有值得回忆的地方，也有不愉快的记忆。

那几年正号召全面学习苏联，苏联教材像“圣经”一样，等于最高指示了。教师讲课不太可能自由发挥，这一点和解放前非常不同。我基本上是照谢缅诺夫的《中世纪史》教课，现学现卖，像个播音员。这倒也省心，绝对不会出问题。

不过按理说，“全面学习”是说不通的。比如王国维先生是国学大师，他的学问非常好，我们要向他学习。但是他梳长辫子，而且抽烟很厉害，连珠炮一样一天要抽好几包，这些我们没必要学。所谓“学习”就是要学优点，不可能存在“全面”一说。所以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旗帜下，也有莫名其妙的时候。比如，苏联学生上课是六节一贯制，下午两点才吃饭，这和中国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可是也照搬过来，早晨八点钟学到下午两点，中午饿着肚子还得学。再比如“五环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做什么，再十分钟做什么，规定得非常细，这种公式化的教学法太机械了。

并且那两年，包括我在内，很多教师都自学俄文，以应大量教材翻译之需。比如清华有位教师叫孙念增，我们中学就是同学，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就是他翻译的，那是标准教科书。不过我倒觉得，俄文教材并不难学。第一，我有英文的底子，学起来要容易得多。第二，英美作品各人有各人的风格，掌握起来要花点儿工夫，可是苏联教材的语言都是“官定”的，或者叫官方语言。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诸如此类的套话非常多，表述也非常固定，一个字都不错，读起来反而非常省事。所以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俄文的，叫《太阳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因为是苏联出版物，又是讲自然科学的，保险系数要大一点。

不过，学习俄文有时也会犯错误，这一点讲起来也挺有意思。比如当时学校里学《联共党史》，包括我在内，有些人就找来俄文本读。上面发现以后，下了一道命令，说：“学习《联共党史》不准看俄文本！”我想上级的用意也很明显，怕大家把工夫都用在学俄文上，反而忽略了《联共党史》的内容。

等到后来跟苏联闹翻了，苏联教材统统取消，改用教育部自编的教材。我们

那几年的俄文也白学了，几十年不用，现在连字母都认不全了。

在西安的日子基本上还算平静，只有1955年赶上了抓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刚解放时的“思想批判”确实大有不同，从思想问题升格为了政治问题，整个的气氛也紧张起来。比如学校里规定，不许出校门，我对这个的印象非常深。因为有一次我的鞋破了，我忘记了这个规定，拎着一只鞋准备到校外的小摊上去修，结果走到门口被警卫拦住了。按理说，这是限制人身自由，应该是违法或违宪的——不过那是资产阶级的法学观，无产阶级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革命的需要”。不能修鞋，那么只好服从了。

再有一次，就是苏联批斯大林的时候。这件事当时对我们是绝对的震撼，用老话讲：那是“动摇国本”的事情。所以有一阵子也是天天学习，气氛很紧张。记得有一次学习，一个年轻的同志问：“既然斯大林有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批判？”系里有一位叫朱本源的先生很有意思，听了也不说话，眯缝着眼睛把头一扬，用手轻轻在脖子上划了两划，意思是：当时要有人提，直接就被灭口了。

这位朱先生比我大几岁，现在得九十多岁了。以前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以后留美，回来也在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过。后来，他在西北大学教古代史，并且一直留在那里，现在和我还有联系。他这人有个缺点，喜欢公开地发表评论。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好，我就劝他谨慎些，别总那么胡说八道的，可他就是嘴上关不住。有一次我们去开会，路上我就跟他说：今天会上可能要提一件什么事情，“你最好不要发言，扯进去很麻烦”。到了开会，果然提到这件事，哎，他又发言了，说：“来的路上何先生跟我说，关于这件事我不要发言。可我还是要说……”结果不但他发表了意见，而且把我也给卷了进去。

朱先生终其一生都是这样的性格。果然，1958年也捞了个右派的帽子，我倒不觉得意外。

1952年底到1956年底，我在西安待了整整四年。虽然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但因为种种原因，我还是愿意调回北京。首先，50年代的西安生活很闭塞，图书太少，很多想看的书都找不到，对我是个很大的缺欠。其次是生活上的不适应。比如学校里的大喇叭广播，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内容，但只要一下课就开始放。翻来覆去总那几首歌，不想听也强迫你听，实在是一种噪音污染，让

我觉得烦恼极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常香玉的豫剧。她是“爱国艺人”，抗美援朝献了一架飞机，广播里就整天放她的《红娘》。所以直到现在，一听到豫剧我就反感。不是豫剧不好，而是先前被迫听得太多，败坏了胃口。

再有一点，西北地区相对落后，不少教师都是外地调来支援的。比如上海交大，差不多分出一半到西安。学校里似乎宗派意识很强，虽然未必是故意的，但语言、习惯上的差异，事实上造成了外地教师和本地教师间的隔膜。记得有个上海调来的年轻人，非常活泼，学了一嘴西安话，可是又说不像。因为我和她很熟了，就劝她说：“你那西安话说得的不怎么样，听了还以为是故意出人家的洋相，还不如不说。”就我个人的感觉，我们这些外地调来的教师似乎并没有能真正融入本地的圈子里，始终都是作为“外人”“客人”存在。这就像你到国外去一样，如果周围只有你一个中国人，哪怕别人并不是故意的，但你自己总会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这一点我始终不适应，于是就想到了回北京，毕竟那里才是我的家。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科学院各个研究所都招兵买马，于是我又调了回来。在历史所，一待就是三十年。❷

选自《上班记》，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

【口述与访谈】

我的一生

——从广东台山到内蒙古

叶林



编者说明：叶林同志于1980年5月发现声带有病变，内蒙医院怀疑是声带癌，可能要切除声带，但需到北京专科医院进一步确诊。赴京之前，为了保留下自己的声音，并给子女留下他一生的记录，1980年5月14日特为自己录制了两盘录音带。（后到北京同仁医院，诊断不需要切除声带）这两盘录音就成了他的革命回忆录了。

他的家乡，广东台山市党史办，已要去此录音的复

制件，并希望我能将录音笔录成文字性的资料寄给他们。

此录音是专门给三个子女讲的，有好多处是给孩子们讲话的口气，有的地方也有重复，在笔录时适当减掉了这些口气和内容，按其所讲事实，进行笔录，其中个别人名或地名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事实都是原原本本的。

乃斌 2005年5月

我的家庭

我是1919年农历十月初一出生在广东台山县君子坑村的。童年时，家庭光景不太好，祖父叶君英在美国当农业工人，后又给外国人当仆人，七十来岁不能干了，回到祖国，1943年去世。父亲叶崇炯在家乡学过中医，旧中国学中医也搞不到饭吃，维持不了生活，于1922年借钱做路费去美国，仍在农场做果园工人，1931年之后，无固定职业，1948年在美国奥克兰逝世。因为没有钱，所以一直没有回过祖国。

1929年我哥哥叶润怡，由父亲买了一个护照，托人把他带到美国。开始读书，后因父亲经济负担不了，就停学了，在一家华侨的货栈里开大卡车送货。那时我家生活全靠父亲寄钱回来。当时，一美元相当于广东币四元，但1933年以后，父亲就很少寄钱来了。我是五周岁就上小学，1925—1930年在本村光大第二小学初小毕业，1931—1932年在邻村光大小学高小毕业。当时读书就是背书，我很聪明，背得很好。高小毕业后，考了两个学校，一是台山县立中学，没考上；另一是台山乡村师范，考上了。这个学校没有英文，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我对算术不感兴趣，经常看课外书，当时我住在叶家和别人合开的岭南书店。

读书、写作、抗日救亡

那时国民党不准看进步书籍，但岭南书店偷偷地卖进步书籍，如卖左翼作家出的书、鲁迅写的书。一些进步青年和教师，他们不只是来这里买书，还在这里看书，并交流读书心得。在店的前面卖的是一般教科书和文化科学类的书，在店后面房子里就卖进步作家和抗日类的书，并常常有人在那里讨论国家大事，所以说台山县岭南书店的书和那里的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有位小学教员名伍福胜，

又名伍示月，后改名伍铭，解放后在人民出版社工作，61年因病去世。他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原来爱看小说，就是看故事，觉得有意思，但对社会不甚了解，他经常指点我：“看小说不能只看小说本身，要与社会联系起来。”由此我豁然开朗，明白了小说的作用，是揭露社会的，以后对小说更有兴趣了。因此对课程就不太关心，天天看书，有时整个晚上看，如张天翼、鲁迅、茅盾等作家的书都看过，还有林克多著的《苏联见闻录》和胡愈之著的《莫斯科印象记》，使我具体地了解了苏联的情况，对苏联很向往。开始对社会主义有了一个初步印象。

除去看书，慢慢也想写点东西，虽然自己文学水平不高，但学习写东西的兴趣是很高的，写过几篇讽刺小文章，刊登在台山师范校刊上。

在师范一段因父亲不多寄钱回来，我是借钱读书的。学校教员常讲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等，使我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一个坏印象，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非常不满，有抗日萌芽思想，同情支持“一二·九”运动。

1935年师范毕业后，就没有钱读书了，当时认识了一个小学教员李树连，后改名李凌是解放后音乐界知名人士，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他在一个乡村小学（好像叫东坑小学）教书。校长邝泽民也是进步知识分子，我在那里帮他们教书，给五年级上国文（现在的语文）就住在学校，和李凌睡在一张床上。李凌是位全才，音乐、美术、语文和算术样样都会。当时还教学生陶行知的诗，教抗日救亡歌曲，这个学校就是我们三个人，除教书外常在一起看进步书籍，有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进步刊物《光明》《文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们影响比较大。半年后因病回到台山，既无钱读书升学，又无工作，愈发对旧社会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愤恨，抗日反日的心更加强烈。

后来，台山中学成立高中，不用考试，报名就可以去，我去了。但英文我跟不上，数学我不感兴趣，仍是天天看书，特别爱看社会科学方面的，如：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吴立平编的《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还有《共产党宣言》，这些书都是违法的，是被禁止的。大部分是和伍铭同志借书看，并与李凌常有联系。通过一段看书和参加一些抗日活动，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在这民族危难时期，又是蒋介石白色恐怖时期，虽然我自然科学学得不好，但对社会科学

还是学了一些，这对我参加革命去延安都起了促进作用。另外搞抗日宣传，经常教唱歌和歌唱演出，使我喜欢唱歌爱好音乐。原来我不懂乐谱，在李凌那里教书时，也懂得了乐谱，这对我以后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学音乐有影响。

由于看进步书籍，喜欢写文章，记得台山中学校刊曾刊登过我写的一篇关于论世界经济恐慌的文章，是分析世界经济的。现在看来是有些进步性的，但成不了什么理论性的文章，只是一种看法而已。不过在那个时代，在那么一个县里，一个学生，在当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也算可以了，可惜这篇文章已经找不到了。

因为世界经济恐慌，对台山是有很大影响的，台山华侨很多，对他们的社会生活是有影响的。这表明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当时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要抗日救亡；另一方面是反对蒋介石的统治。

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当时我主张杀蒋介石的，恨他。还和一些人争论，那时不懂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只是气愤，在这时我算一个进步学生。当时我在台山中学上高中，因为英文数学跟不上，思想上对功课不感兴趣，也不想念下去，就住着看书，这个学校当时不收费，自己吃饭只买点书就行了，去广州读书也没钱，这半年就结束了。自己还是想读书。37年上半年筹备了一些钱到广州去文化补习学校，学英文和数学。和几个同乡同学住在一个房间里，记得有甄绍祥，后又名甄子明（解放后在解放军总后勤工作，是财务部副部长）当时他学会会计。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人攻占卢沟桥，抗战开始，我在广州又考入了一个私立复旦中学的高中。“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轰炸广州，学校搬到广东郊外番禺县谢村。开学时我也跟着去了，离广州百来里，坐船需几个小时。当时李泰初是这个高中的校长，他也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复旦大学的大学部也搬到番禺县谢村，我在这儿上了半年，仍是除了学文化做功课外，看进步书和报刊，搞些活动。以我为主，组织几个学生出壁报，写抗战新闻，宣传抗日。虽然大学部也在那里，但我们没看到他们大学部有什么抗日救亡的活动。半年后的冬季，我又回到台山。

这时台山已经成立“青抗会”，是李凌、伍铭一些人组织的，开始名为“台山县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后改名为“台山县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台山青抗会”。它是台山群众抗日救亡组织，是进步青年组织。我没去复旦高中以前就参加了李凌他们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这次回来就正式参加了这个组织。青抗

会是专门搞抗日救亡活动的，共有几十个人，无代价的，自己吃自己，没有报酬。在城里或下乡演唱救亡的歌曲，演抗日的戏剧。在哪个村子演出就哪个村子招待吃饭，演出什么“江山好”、“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李凌当导演，他也演剧，出墙报，教歌子；我也教歌子，也参加演出。我演得不好，小角色，跑龙套。这年冬季我就在台山搞抗日救亡活动，并与大家一起读进步书刊，乡村老百姓都愿意看我们的演出。

当时还有一位李嘉人（我高小的老师）是劲风日报的编辑，是位进步人士；还有朱伯谦也是进步知识分子；还有李元获是进步学生，他也去过鲁迅艺术学院；甄子明也在这个团体。搞了半年多，这半年多又看了好多书，了解到延安的情况，也有人去了延安。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我们都看过，共产党的情况在我读师范时就知道一些。经常听李凌伍铭和从上海回来的学生谈到上海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如木刻家黄心波，他们都是左翼作家，讲在上海如何搞地下活动，怎样散传单，怎样搞秘密活动。对红军长征，抗战后国共合作的事我们也知道。

回忆这段战斗生活，在青年时代我觉得是值得纪念的一段，挺值得纪念的。这样一个团体都是我们进步青年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对台山后来进步青年的培养起了很好的作用，对台山党的组织的成立，组织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有些人去了延安。当时对台山进步思想，唤起抗日救亡，唤起民众抗日都起了它历史的作用。李凌和伍铭 36 年去过上海，37 年“813”事变，日本攻占上海，他们回台山来，好多活动是他们组织的，我是跟着学习和做的。教歌写文章，当时我的笔名叫叶柳春，写些文章登在劲风日报上，当时还有读者写信问报社，叶柳春是谁？

一九三八年五月，母亲送我去延安

搞了一段我们就准备去延安。1938年5月，我、李凌、伍铭、甄陌（又名甄伯蔚）还有一个姓谭的和一个人也要去。李嘉人通过广州地下党组织的邝启常同志写了一个介绍信，到了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是云广英，但我没见过他，再由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开介绍信到陕北西安的办事处。但是去延安我没有钱，是我母亲支持我，她给我借了几十块钱做路费。当时我祖父还活着。母亲不给我借钱我是没处借的，所以我很怀念她（说到此时叶林同志抽泣片刻）她支持我，临

走时还送我到汽车站路口，印象非常深刻。她老人家支持我，对我参加革命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值得我怀念。

到了广州八路军办事处办了手续，我们坐火车到了武汉。蒋介石这家伙，名义上“保卫”武汉，把黄河决了口。花园口决了口，冲了平汉铁路，车不通了，如《大河奔流》那一段，我们走不了啦！我们在武汉等了些天，通车仍无消息，当时有邝飞军（邝启长的妹妹）、陈因素，还有一位青年，三个人继续等车，并打算步行过去。我们一行人回到台山，到当年六月份听说火车通了，才又去延安。

第二次去延安时，伍铭没有去，留下来和李嘉人一块在“青抗会”工作。第二次去，还有李鹰航。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那里开始叫我们去顺义的陕北公学，我们还是要去延安。于是就考我们，进行过两次，一次是考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中央宣传部长恺丰同志写的“统一战线工作教程”我们都看过，知道这个道理，当时反托派（托洛茨基）很厉害，叫我们答对托派的认识，我们都按书上的道理答了，政治方面就通过了。我们又有介绍信，还要考对音乐运动的看法。为什么要考鲁艺，这方面我们也懂，又写了文章。我们不懂普通话，就用笔写，最后通过了。经办事处同意，我、李凌、甄伯蔚、李鹰航还有那位姓雷的，到了延安，正好是1938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抗战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被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二期）学习，这是从家乡到延安鲁艺的一段。

这时，我十八周岁，不到十九周岁，今天看来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青年，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受帝国主义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受军阀蒋介石的统治，不满意他们，在道理上接受了进步思想。仅受压迫，没有进步思想，也不可能去延安。另外对自己的境遇不满，即念书没钱，借钱念书，也没意思，那怎么办呢？就搞抗日救亡，就去延安，到那里去抗日，在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出路。

叶林这个名字是去延安前，在朱伯濂家中，我起的名字，当时李嘉人也在，当时是叫叶霖带雨字头的，后来才改为叶林现在这个名字，叶柳春的名字也不用了，家乡的名字叶润韶的名字也不用了。

回忆这段生活，我觉得虽然在学校读书不怎么好，但看小说看进步书籍，对我思想是有影响的，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不然怎么能参加革命又怎么去延安呢？当然和思想和环境都有关。我已是成年人了，十八岁多了，其实我十六七岁

思想已经进步了，但还没有实际锻炼，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情革命，拥护革命，直到参加革命这段和我自己当时努力看书学习有关，和接触的朋友也有关。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浪潮中，自己有进步的思想，对旧社会不满，和要找出路的思想。哪里是出路？共产党是出路。对苏联是从书本上了解的，认为苏联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好。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青年人有书念，我们是拥护的，不然我们为什么愿意到延安去吃小米呢？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以上讲的是从家乡去到延安前情况，现在讲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后学习生活情况。到了鲁艺还考试了一次，题目是对新音乐运动的认识。我们广东来的几个人都进了音乐系，学习音乐作曲、练声、练耳、唱歌、指挥、音乐理论和文艺理论。文艺理论是周扬同志讲的，还有军事、游击战争，有军事教员，还学俄文，列宁主义基础。是许新同志讲课，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当时鲁迅艺术学院院长是吴玉章，副院长是沙可夫，后来是赵一敏和黄华。

学习了三个月在快结束的时候，冼星海同志也去了鲁艺。1938年11月8日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大会是在山沟里开的，因为那时党是不公开的，介绍人是一个广东同学张刃仙和另一个同学王承骏。支部里有成荫（导演）同志。我是到延安不久入党的，宣誓挺严格，那时候是大批发展党员的时候。这时有的同学到农村、到部队、到学校去做音乐工作，锻炼队伍。有些人到前方去了，我们广东来的几个人留下来未去前方。

我是新党员，被送去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门训练班第六期学习三个月。当时日本人轰炸延安，训练班搬到离延安四十里以外的村子里，学习党的基本知识理论，党的秘密工作等课程，好多中央同志讲课，陈云同志也作过报告。毕业时毛主席还亲自去作报告，他骑着马从延安走几十里到我们那里，作毕业讲话。

当时延安烧得很困难，星期日我们都上山打柴，作为烧柴，学了几个月就在那里转为正式党员。1939年三月又回到鲁艺，因为我们是派出到训练班的。那时我准备不想搞音乐，想去中央党校或马列学院搞社会科学，但领导没有批准，就服从组织，没有去，就到了鲁艺高级班学习，其实也没学什么。

蒋介石对延安实行封锁，延安很困难，毛主席号召开荒种地，搞大生产运动，

我们都参加了开荒种地。冼星海同志创作的“生产大合唱”第一次演出我参加了，我拉胡琴，在此以前，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第一次演出我也参加了，挺有意思。这些大型合唱我都参加过，冼星海和我不太熟，因为我去训练班走了几个月。

在 120 师的“战斗剧社”

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央组织很多学生、干部即抗日军政大学、华北联合大学（是由陕北公学、鲁艺、工人学校、卫生学校和青训班等组成的）几千名学生到敌人后方办学校和训练干部，这时我们就到前方去了。开始我们准备到晋东南根据地，去八路军总部。但走了一段路，日本围攻晋东南即扫荡，我们就反扫荡。我们到了黄河边延水关，停下来改了道，去了晋察冀根据地了。

行军几个月，背着行李，过军事生活，轮流站岗，轮流做饭，在行军途中成立了一个联大文工团，我在音乐组。又走了很长时间，大概九月份才到了河北平山一带和阜平一带，即晋察冀根据地，半途遇到伍铭同志，他在抗大，他也到了前方。当时晋察冀分局还开大会欢迎我们。在联大文工团不久，敌人又扫荡这里，我们文工团又向山西方向行军，跑出这个敌人的包围圈，到山西于县这边来。

1940年1月又到阜平县。这时把我调到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稼雨、高鲁二同志也调去了，王元方和成荫同志早就在那里。王元方是音乐组组长叫我当副组长，搞音乐工作。八路军有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三大主力部队，贺龙是120师师长，关向应同志是政治委员，甘泗淇同志是政治部主任。到120师不久又行军一个月多，每天80多里路，很艰苦，很冷，是大部队行军，很多部队过这边来。1940年春天就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我们到此不久，就反顽固，反阎锡山，120师支援新军打阎锡山，把阎锡山打跑了，建立一个根据地。八路军生活很艰苦，尤其120师所在地晋西北连小米也没有，我们吃不上小米，吃黑豆，吃了不太好受肚子痛，什么都没有，不发钱，没津贴，没手巾，没牙刷，当然更没有牙膏了，肥皂也没有，一年只发一身棉衣棉裤，好时每年发两身单衣，好多人用旧衣服改短衬衣，短衬裤，哪里像现在，有背心啦，汗衫啦，衬衣衬裤啦。每人发一床被子即全部家当，褥子也没有，还有些自己的用具，写东西的乐谱、歌片、纸、墨、笔等一个挂包几件衣服，一背起就走，全部就这些了。

生活虽然艰苦，但工作和精神是愉快的。经常写东西，走路、演出，有好多

同志解放以后仍然搞音乐，也有改行的，如成荫同志和严寄洲同志都是以后有名的导演。我当时就搞音乐、写曲子、教唱歌、搞指挥，还给小鬼队（都是很小的，有的人还参加过长征）讲乐理，如孟贵斌唱歌的，就是当时的小鬼。大家演出时搞些杂务：如打舞台、搞道具、拆幕布等什么都干，经常演出。战斗剧社是120师政治部的剧社，所以过军队生活，早上跑步、练歌、写歌、排剧。我们住在兴县的时候，没有睡过热炕，也没有火烤，年轻人身体壮，也就顶住了。生活虽艰苦，精神是愉快的。我们受的是红军后来的八路军的训练，对我们以后战斗生活有好处，对我们生活上、纪律上，党性锻炼方面都有好的影响。

我那时也写了不少歌曲，出了“战斗歌声”的小册子，可惜许多作品都丢了，有时我写曲子，也配词；有时我作曲别人配词，有两首我写的由杨书元同志帮我回忆起的，他记得很清楚，基本上没有错。现在我唱一唱，留做录音，我嗓子不好。唱《到八路军里去》和《青春之歌》。

八路军军号

叶霖词曲

G $\frac{2}{4}$ 进行速度

1. $\underline{5} | \underline{3} \underline{5} | 1 - | \overset{3}{\underline{2 \underline{3} \underline{3}}} | 2 \ 1 | \underline{5} - |$
 中 华 儿 女，晋 西 北 的 好 儿 郎，

3. $\underline{6} \underline{5} | \overset{1}{\underline{3 \underline{3}}} | \overset{5}{\underline{5 \underline{5}}} | \overset{5}{\underline{5 \underline{1}}} | 2 - | \overset{0}{\underline{3}} \underline{2} | \overset{1}{\underline{6}} \underline{5} |$
 为 什 么 不 展 开 上 战 场？你 没 见 敌 人

$\overset{1}{\underline{2}} \ 3 |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5} | \overset{1}{\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6} | 5 - | \overset{0}{\underline{5}} \underline{6} | \overset{1}{\underline{6}} \underline{5} |$
 来 了 奸 细 统 统 杀 同 胞 遭 了 殃！你 说 八 路

3 $\overset{1}{\underline{3}} | \underline{5} \underline{3} \ 2 | \overset{1}{\underline{2}} \ \underline{3} \underline{5} | \overset{1}{\underline{5}} \underline{3} \ \underline{2} \underline{3} | 1 - | \underline{5} \underline{5} |$
 军 到 处 打 胜 仗，各 地 人 民 苦 洋 洋，走 呵

$\underline{5} \ \overset{1}{\underline{5}} \underline{5} | \underline{5} \underline{6} | \underline{5} \underline{3} | 5 \cdot \underline{6} | 5 \cdot \underline{6} | 5 \ \underline{2} \underline{3} | 1 -$
 走 呵，八 路 军 号 到 八 路 军 号！

标注
 (八路军军号由叶霖作词曲
 ——此曲由叶霖于1940年，晋西北边区部队
 参军时，为此任务所作——
 作者注)

青春之歌

徐光词
叶霖曲

G调 4/4 (进行曲风)

$\underline{\underline{555}} \mid 3 \quad 3 \quad 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43}} \mid 5-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5}} \mid 4 \quad 4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
 可爱的 青春像春天的早晨, 向着光明快步飞
 $\underline{\underline{555}} \mid 3 \quad 3 \quad 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43}} \mid 5-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23}} \mid 4 \quad 4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3}} \quad 2 \mid$
 奔, 我们的生命充满 活力, 青春的热血滚滚
 $\underline{\underline{05}} \mid 1- \underline{\underline{1.2}}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5}} \mid 6 \quad 6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34}} \quad 5 \mid 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32}} \quad 1 \quad 5 \mid$
 腾, 你听! 风浪猛烈 斗争, 雄的海洋呼唤我们,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6}} \mid 5 \quad 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5}} \mid \underline{\underline{5.3}} \quad 2 \quad 3 - \mid 5 - \cdot \underline{\underline{712}} \mid$
 要驾着大船勇敢前进, 冲破险阻不怕牺牲! 看! 胜利的
 $6 \quad 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43}} \quad 1 \mid 2 -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3}} \mid \underline{\underline{55}} \quad 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43}} \quad 2 \mid$
 阳光照耀着我们, 新的 世界在召唤
 1-0 ||
 奏白

(根据徐光同志回忆整理。此曲
作于一九四一年春——作曲家注)

我还写了一首百团大战的歌曲,是八路军一百个团同时在华北向日本帝国主义反击,是大战役,还有一些歌曲在战争中都遗失了,可惜!

我学音乐时间不长,基础也差,作曲没学多少,和声也没学多少,只是在工作中学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当时哪里有什么音乐理论的书,和声学的书也没有,山沟里那里有?乐器也没有什么,只有胡琴和口琴,哪里像现在有钢琴,有许多乐理教材。和声是自修的,自己写的和声,也不像样,写出来就唱,实际上也是丢丑,那时的条件就是那样,在工作中学吧!

以上所说,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想学一点东西,但又没有资料,没有课本。想学英文,世界语,找了些资料,学起了世界语。找了个字典,一边走路一边背

生词，当时学世界语还算不错，可以看普通文章，现在也全忘了。总之，学习欲望很高，但学习条件很差，现在的学习条件比那时好多了，年轻人应了解到老一辈人当时学习的困难，理解他们。

贺龙，是我们的师长，他常来看我们演出，他很接近群众，没架子，我们常见他。这样一位对党对革命有贡献，对人民有贡献的人，可惜文革中被“四人帮”害死了，叫人痛心。还有师的政治委员关向应三十多岁，工作很艰苦，也接近群众，他有肺病，还坚持工作，国民党封锁，没什么好药，这样一个老革命家于“七大”会后病死在延安。

1942年剧社曾回到延安，演出过一次，剧本都是战斗性的。在中央礼堂（在场家岭）演出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都来看过，毛主席还给我们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有的同志还保存下来，信是这样写的：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此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三日（1942年）

1943年，我们从延安到晋西北，当时准备回到鲁艺继续学习，但鲁艺开始整风了，就跟剧社到了晋西北，不在部队了。调地方工作，到晋西北师范学校当音乐教员，时间不长。

延安的“抢救运动”

1943年秋，10月左右，在整风中对干部进行审查，我主动要求到党校学习，本来整风是对的，整顿三风。但后来把审查干部，搞成“抢救运动”。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主持此工作，搞成“特务如麻”。当时大后方、国统区大批青年学生怀着抗日的热情到了延安，大多被怀疑有这样问题或有那样问题，好多被“抢救”了，按康生的说法，你给国民党干事了，你有什么问题，就是“失足”了，既然“失足”我们就“抢救失足者”。怎么抢救呢？还不是在小组会上斗争，

在小组会里一个一个来，谈自己的问题，车轮战，几天，十天半个月不叫睡觉，逼得有人胡说，主要是康生搞的。当时毛主席还是掌握住了，他讲“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如不这样掌握，如杀就要犯历史上的错误。怀疑你就整你也不对，没有证据是莫须有的东西，是主观主义，搞了强迫性的。

开始我也“抢救”别人，但后来我也受了一次考验，最后“抢救运动”后期，快结束时，在我们小组，说我也有问题。我说我没有问题，我是年轻人，我是从国民党区、大后方自动参加革命的。说我思想上有个人主义尚可，政治上我没有问题，就这样也整了我一顿，后来上边也发现问题，停了下来，不然我也被整得够呛。当时我想不通，我想有毛主席，你冤枉我，我没有问题，不能胡说，我没有问题，我根本没有问题。

当时党校有四个部，我们地方干部属于一部，在胡家沟，在这里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和毛主席著作，还要开荒种地、生产、我也开荒，但我体力不行，就纺线，一天也能纺二三两。但在这里行动不自由，不自由相当一个时期，出去要两个人一齐，当时我们也造反，我们对“抢救运动”不满。后来来了个民主运动叫大家说，大家提了不少意见，我的气也消了，本来搞扩大化不对，好多同志被整的厉害，提了意见，也对我们进行批评。1943年秋—1945年8月15日我一直在这里渡过，这是一生以来第一次打你反革命，莫须有，经过这么一个考验，我被搞得比别人时间短，不太厉害，但也是不对的。

抗战胜利后，来到内蒙古

1945年党校一部到了神木县彩灵村，在那里种菜，种西红柿。高鲁同志也在，快收成时，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又回到学校去了。本来要调到东北，抗战胜利了，要扩大根据地，扩大人民的力量。毛主席说：“蒋介石坐在峨眉山上，要摘桃子，我们不干，要扩大根据地，扩大人民力量，扩大人民武装。”

绥远当时有一部分解放得快，后来有我、高鲁、王修到大青山这边，有个区党委，本来是要打进归绥市（即现在的呼和浩特），但傅作义占了归绥市，他原来在河套（即现在的巴盟）。我们没打进归绥，就去了凉城，到绥南地委宣传部。到此，抗日战争胜利，即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在绥南地委宣传部，我和一个部长下乡，搞清算斗争、反霸、编报，下乡时

间不少，出过绥南日报，在凉城发动群众斗争反动教堂、反动神甫。从到绥南地委宣传部，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原绥远省，即现在的内蒙古这一地区工作。

1946年有一次敌人占了集宁以后，我和汉林同志正在九堂村，敌人来了，我们还不知道，差一点被敌人堵住，堵在里边就出不来了，如果被抓住，我们也没命了，那个村子的地主最恨我们，经过一番惊险，晚上我们还是跑出来了。像这样的事，在解放战争时期，做地方工作是常遇到的。做地方工作，也挺有兴趣的，群众工作没做过，从学习中去做，向群众学习，对自己也是个锻炼。

集宁失守，傅作义占领集宁，敌人打到了张家口，我们就退到后边，又回去，带了一些村干部，办起了“绥蒙大队”。共包括七个队，凉城属第六队，我在六队，王鹤田是指导员，我是队长，搞训练干部的工作。其实集宁失守前，我一个人也训练干部，那时有两个做饭的，讲课，组织讨论都是我一个人。后敌人占了延安，1947年春，我们在和林、凉城、平鲁一带打游击，跟部队走路，机关没什么人，我当秘书，管几个通讯员，大部时间下乡，搞发动群众工作。

1947年调绥远省委组织部工作，高克林是省委书记。全国大反攻，刘邓大军过黄河，延安47年失守，这时也收复了。沈阳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蒋介石垮台了。我们到了丰镇，全国快要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解放以后的三十年，就不讲了，以上讲的解放以前一段简要历史。■



附：

悼叶林

贺乃斌

叶林，在你逝世一周年的清明时节，谨将我1986年1月4日在济南所写日记抄录送上，以表示对你的深切怀念之情，愿你在天之灵得到慰安。

乃斌 1986年清明节



晚上时钟敲了十一下，又过了45分的时候，啊！已经是1986年1月4日晚11:45了。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叶林没有留下任何别言，就悄悄地离去了，多么痛心的一年，那多么忧伤的一年。

想不到一年后的今天是在这遥远的泉城济南度过的。住在姐姐家，为了不使这里有什么不愉快的气氛影响这个欢乐的家庭，我没有表示什么忧伤与悲哀，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默默地哀悼着别离一年的亲人，我的好同志，好老师，好伴侣，请你静静地安息，放心地离去。我和孩子们永不忘记你的帮助和教诲。孩子们没有辜负爸爸多年的期望，他们都是学习上的尖兵，事业上的强者，都在学习你对工作、对事业忠诚奋斗的精神和正直的品德。

36年前，1948年10月，我在丰镇县蒙绥分局党校学习的时候，常常有一位

穿着朴素、性情开朗而又热情的人来到党校，他就是叶林同志。因为他当时是在蒙绥分局组织部工作，所以谁也没有理会他的到来有什么奇特。他坦率、活泼、谈笑风生而又平易近人，和许多干部都能打成一片，尤其是和众多的年轻人，大家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谈话、询问、打趣、逗笑，他在哪里，哪里就很活跃。

他不是每天来，如果他哪天不来，大家就都感到无趣。我和他也经常单独谈话，从家庭到学校到参加革命。因为他参加革命比我早十年。对好多革命道理，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很乐于向他请教，他每每都是耐心地给我解答。直到我明白为止。

记得当时我在党校二队（农民队）工作，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如何和那些朴实的农民融洽到一起，我因感到缺乏工农感情而苦恼。他细心地给我讲，知识分子与工农如何打成一片，首先要有共同的感情。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思想，要把工农当老师，做朋友，还要学习农民的语言，这样才能接近他们。以后我就照他讲的去做，放下架子，接近他们，关心他们，教他们唱歌儿，听他们讲农村的斗争形势，学习他们的语言。果然，他们和我融洽了。从此，我和叶林同志常常在一起谈话、聊天。从他身上我感到力量和鼓舞，当时并未想到什么别的，但从心里对他有一种敬佩而愿意和他在一起。

不久韩强同志（四队女指导员）交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啊，是他写来的。简短而明确的语句，他要求和我做进一步的交往。我内心感到欣慰，但又感到有些突然。于是，我向他表示自己有许多缺点还不太合适，其实他早就看出我的心。他打趣地说，要建立新的恋爱观，第一要志同道合，我们都是革命同志，第二要情投意合，我们不是很投缘吗？第三要双方自愿，我愿意，难道你不愿意吗？于是就这样，我口头上虽然一直没说过同意，实际上已经在朝夕相爱了。

当时正值绥远省“919”起义，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还在做垂死挣扎，刚进旧绥远城，由于战斗的工作不允许，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谈情说爱。而我又是一个带着封建味儿的姑娘，他却是一个感情奔放的人。尽管如此，经过不长的时间，在1950年2月7日，我们就结合为终身伴侣了。

35年来，他对我仍如当年我们刚认识时那样，政治上的关心，同志式的帮助，生活上的照顾，使我这从生下来就丧失了母爱的受冷的心，在年过20以后又重新温暖起来。他没有一点儿大男子主义，他非常尊重我，从不把我看作单纯

是他的妻子，而同时待之以同志朋友之情，使我们之间是民主，平等和友爱的。他和孩子们相处也是这样。因此，我们的家庭是民主平等、和睦融洽的，孩子们的同学和朋友对此都很羡慕。

他的一生正如他在录音中所说，是战斗的一生，但也是坎坷的一生。他从向往革命到参加革命，几十年奋斗没有享受到什么。到三中全会以后，大家生活都提高了，他却过早地离去了。我久久难忘他那正直无私的品德，他那对邪恶权势痛斥的一身正气，他那爽朗的性格，他那热情活泼风趣的言谈，他那联系大多数人的群众观点，他那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直到他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时，还能泰然处之，从未向病魔低过头，在病情危重时还在安慰别的病友。他的品德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人虽离去，精神永存。今天我的悼念，不用眼泪，不用悲伤，我要鼓起生活勇气，我要把思念变成力量，将用文字写下我最敬爱的亲人——叶林。将他最值得学习的革命精神、品德和情操告诉孩子，叫他们永远记住。📖

1986年1月4日晚

【口述与访谈】

我拼命喊：“不能打！”

——北京师大二附中吴淑欣口述

季焯 记录整理

季焯按：吴淑欣，北京师大二附中66届高三1班学生。下面是她在某群的微信及我对她采访的记录整理稿。

季焯：你是我调查8.25惨案以来，第一次听说惨案现场公开喊“不能打！”的。我听说后非常激动，在暴行如此肆虐的场合，二附中不仅存在着理性的声音，并且是极其勇敢的！想和你聊聊。

吴淑欣：8.25当天事，我只记得：好多同学说贾岩燕他们把樊西曼押到学校来了。然后我看到红卫兵把樊西曼架上了乒乓球台，就是最靠近教室楼、最北

边的台子上。我就跟了过去。“就是她儿子！”“就是曹滨海他妈！”“拿刀砍红卫兵！”这时才知道事情的大概：他们到曹滨海家抄家，曹滨海不让，就拿刀砍了，急红眼了！初中红卫兵跑回学校到红卫兵总部报告。后来就把曹滨海他妈，铁道部党校的，弄到学校。

很快台前就围了很多同学，起码有20、30人，多数是初中同学，听到台上同学说曹滨海在家拿刀砍红卫兵，台下同学群情激愤，连声喊：“打！”台上人使劲打，多数是初中的。我挤在外围进不去。然后看见有人递皮带给贾岩燕，当贾举起皮带时，周围更是连声高喊“打！”“打死她！”我也急了，就使劲喊“贾岩燕，不能打！贾岩燕，不能打！”我们是同班同学呀。我一直在嚷：“不能打！要打死人了！”但是没人听我的，我发现自己的声音被淹没在周围一片“打！”“打！”“打！”中。喊打声压过了我的“不能打”的声音。有人要抡我，又听有人说“她出身革军”。

季焯：你能详细说说吗，是谁、或者是男是女？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要抡你？说你出身革军的显然是比较了解你的，是你班同学吗？

吴淑欣：就是在我喊：“贾岩燕不能打”的时候，后腰腿部猛然挨了一下子，同时就听到有人说：“她爸是解放军！她出身革军！”大概这一句提醒才使我免遭鞭打。旁边是谁，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多数是初中生，也不熟悉，不认识，背后是谁更是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我只急切地想制止贾岩燕他们这种行为，但是势单力薄做不到，很着急。知道自己挨了一鞭子，也没心思看是谁打的，甚至于都没感觉疼不疼。光着急了。

樊西曼是一个40多的中年妇女，哪禁得住这么打！……红卫兵就是疯了！

贾岩燕们刚把樊架走后，一个中年人把我拉到一旁，亮出了他的身份——他是林办观察员，想向我了解咱们学校的情况。这人四十多岁，中等偏高个儿，上身没穿军装，刚才他一直在现场观看。我一听是林办的观察员要了解咱校的情况，就急着跟他说：“您能不能快点反映二附中的情况，扭转这种状况？！”但他说他“只是观察员，无权干涉地方的运动”。接着他询问了我的观点和周围同学的观点，了解了当时学校的情况：他对我说：“看到你刚才反对打人。你是哪届的？”我说：“我是66届的。我一个人没制止住……”他问：“你们同学多少人持反对意见？”我说：“高中多数人。除了贾岩燕等过激的外。”对，还有李妮妮，

特亢奋，特能说。这位观察员鼓励我向上反映学校的情况。我现在回想，他或其他的人应该把二附中的情况反映上去了，因为后来贾岩燕他们要召开的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被制止了，说是周总理给他们做了工作。

季焜：按林办观察员这个细节，是第一次听说。也让我们窥见了林当时态度之一斑，耐人寻味。据红卫兵 ZHXX 说，8.25 打死姜培良的当天，他去小食堂看见红卫兵在打人，他就出来了，这时看见一个成年人站在小食堂外。看见 ZHXX 从小食堂出来，“可能觉得我还能说上话，就对我说：‘同学，你进去跟他们说一下，适可而止，别出人命！’我就进去了，对他们说：‘行了，休息一下吧。’他们就歇了。这个人我不认识，我觉得不像咱们学校的老师。要是咱们学校的老师我总还见过。”这位成年人会不会就是那位林办观察员？

吴淑欣：我后来才知道，打死樊西曼后，红卫兵冲进劳改队，就是小食堂，把姜培良、靳正宇打死了！当天稍晚，我和宋广学从校外进来，看车上拉着姜培良，一问，说打死了，正要往哪儿送！

我特别气愤！当时没有人制止！靳正宇教过我们初中高中，……他被打死的那天，下午传出，靳正宇收到他妈妈从上海寄来的包裹。

季焜：杜平老师也说过：“靳正宇被打死，他妈妈不知道。”想问一下，你加入红卫兵了吗？

吴淑欣：我没入红卫兵。我彷徨：对联，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党支部……每个人都卷进去了。我一开始特别愿意参加文革，第一个跟老师唱对台戏，班主任安万章让我们好好听课，大家也不听，下面写大字报的，窃窃私语的，安万章急了，说：“不想上课的出去！”我腾地出去了，后面跟着好几个人。我们以为就是写写大字报提提意见呢。我的文章特长，食堂后面墙贴了一多半。但是很快就乱了。我对红卫兵不理解。我父亲当时是军队中下层干部，更不是高干，我也不认同他们。

季焜：看来你一开始就是反对对联的。

吴淑欣：我一直就反对这种极左。对联一出来，当天晚上我就去团中央反映情况了。我觉得上面应该阻止。哎呀，人特多，特乱！上访必须签名登记，排队，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末班车都没了，我只好和两个初中同学回去了。后来听说，团中央大喇叭喊我，“师大二附中吴淑欣！师大二附中吴淑欣！”喊了好长

时间，是外校同学告诉我的。我们晚饭都没吃，等了三四个小时，没人搭理，特乱。

当时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16条？）出来，没人听，倒像点了火似的，武斗更厉害了。对联出来后，红卫兵主导学校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后来越来越没人听，武斗高潮，净是初中的同学，打死樊西曼，初中打人厉害。

记得红卫兵还打了一个。我挨个教室查，看到初二教室里，后面，一个女孩儿，趴在那里，红卫兵打她，说她“臭流氓”。我赶紧让她走了。我给了她一件衣服，她穿了条裙子，浑身是伤，趴在地上。那衣服她也没还我……

文革动乱，一下把自己搞乱了。社会沉渣泛起，普通人、要入党、党员，毁了一批人……姜培良到死都不明白，自己本身有多少问题。他是个追求上进，有抱负，有建树的书记，怎么会理解呢！社会脱离了正轨，一下乱了道了。

今天整理这些东西非常不容易，劳累是次要的，对人情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从那时走来再回首，仍感觉难以接受，尤其那些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罪的同学，更是如此。但是，至今我已七十多岁了，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些犯了打人罪的是青少年，是孩子，是还没有进入社会的中学生，是谁引导他们去恨，去打人，去……那个对联是谁抛出来的？去人家家里抄家是谁引导的？我认为作为我们学生，没人能想出来这些，也没有人敢这么做，这背后一定有只手，有只大手在指点，在唆使我们这些爱憎分明的青少年，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经营自己的私产，挖共产党的根基。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泥沙俱下，社会沉渣泛起，才造成运动的混乱，乃至武斗。我们这些青少年只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了枪使。

人非神圣，孰能无过，更何况是少年，我想我们回忆那段不堪的历史是对后世的一个警戒，历史不能再重演，一切犯过错误的人应更懂得这些。但是对犯过错误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时犯过错误的就不要追究了，咱们党和国家好像也是这么做的。☑

【资料】

关于孙蓬一的资料与书信（二）

胡宗式 章铎 编辑整理

胡宗式给孙蓬一亲属的信

77.10.10 给柴树园的信

大姐：你好！

来信收到了。下面把“与许维纲谈话纪要”的事向你谈一下：

67年6月5日，陈伯达的讲话，给我们扣了三顶大帽子，这样把校内搞乱，社会上的变化也很厉害，动态组也一分为二了。到了中旬，我让刘志菊到机械学院去找许维纲，向他了解一下他对当前社会斗争的看法。此人是机械学院东方红的成员，是当时红代会东郊联络站的站长，并曾是湘江风雷北京支队的成员，认识的人很多，活动面广，他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的观点和我们是对立的。由于在67年1月军内两派斗争（一筹，二筹）问题上，和我们同支持二筹，所以认识了。从个人关系上说，在一起还能心平气和地谈。刘志菊回来后，我和她将这次谈话的内容整理了一下，写成“与许维纲谈话纪要”上报中央（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我们自己留有四份：校文革两份（聂孙一份，姜同光一份），公社及存档各一份。我们手中的四份，早已不知去向。

文件的开头，是介绍许维纲本人的身份，然后是对话的内容。

刘问：“你对当前社会斗争怎样看？”

许答：“当前北京的这场复杂斗争，反映了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在这一场斗争中，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的一边。”

刘问：“师大的后台是林杰吗？”

许答：“不是，是比林杰大得多的林，……你们是反林保周。……”

文件的结尾是：“我们认为许的观点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社会上—批势力的观点。” 北大动态报。

文件是复写的，用复写的薄的美浓纸十六开，两张。

我想上报的四份，原文应在，必要时让有关部门查找原文。我们站在哪一边，

空口无凭，有文为证。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提法，我们在他那里是首次见。过了不久，从学部的人那里听到同样的看法，但说法上没有超过许，就没有整理。

我的印象中，对立派的文章中没有比这个清楚地、本质地反映当时斗争的实质和我们的立场的。

许现在天水的某单位，刘志菊在贵阳标准件厂。74年我曾给她去了一信，但她没有回信，近况也不知了。

宗式 77.10.10

79.5.13 给孙韧之（孙蓬一的姐姐）的信

韧之同志：

来信收到了。对老孙的处境我是很关心、很同情。他被捕一年多了，不起诉、不审判，这本身就说明案子进展不大，也可以说是没进展。

在文化革命中，我们一起战斗，在保卫周总理、反对王关戚和谢富治等的斗争中结下友谊。请转告柴大姐，如果需要我这什么材料，我可以提供，需要出庭作证也可以。

申诉书提到的“007密令问题”，北大最早接触到这事的人是我，情况在77年告诉老孙了。申诉书中提到的那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为支持长高司、批判“湘江风雷”反总理，在67年6、7、8月时，学校曾对“007密令”问题作过调查。这次调查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

关于抓叛徒问题，67年4月14日在大会堂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批评北大反谢的那一次，康生给聂元梓一个条子，大意是“聂元梓同志把抓叛徒的事抓一下”。后来成立第二战斗队，专门抓叛徒，和反总理毫无关系。再有是总理给北大一个条子（时间不知）让北大调查一下二机部某人的叛徒问题。除隐患战斗队用这个条子调查了吴传启的材料。目的是反王关。

关于樊立勤的那一段，我了解的是：工作组时期，他不是红人也不是打击的对象，66年7月22日天安门前开援越抗美大会，没让他去，那天江青等来北大，他正好赶上，听了江青的讲话。好像是没有个别召见他。

关键的问题是保周总理、反对王关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十分明确、清楚。

我看此案短时间内解决不了。有什么新情况，望告诉我。

祝好！

胡宗式 79.5.13

79.8.25 给柴树园的信

大姐：你好！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勿念。第一份申诉书是很久以前由你姐转给我的，我作了回信。最近没有接到银川的来信。

从来信中可以看到，学校马书记的谈话还可取。去年北大来两人外调关于邓朴方的事，态度很不好，说聂孙是四人帮的体系。我也使他们不愉快。

法院方面只要是办案人员坚持原则，按法律办事，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目前要安心，但是要积极地等待。新的材料寄来后，我再提些意见。

章铎于 11 日返回宝鸡，因天气太热，没有在北京停留。

由于工作的需要，不久我要调到五车间。来信寄 71 信箱 35 分箱章铎收，或仍寄革新科我收也可以。

王关戚要放出来之说早有，不可信，至少目前如此，他们是四人帮线上的人。前些天关于合二为一的问题平反的文章还点了关铎的名。他们的结局，只能是主犯和从犯的关系。

祝好！

宗式 79.8.25

79.9.4 给柴树园的信

大姐：你好！

来信收到，韧之来信也收到。看了这次申诉后，感到在说理的力量上，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果一个没有参加当时运动的人，整理或看材料，看到我们在 67 年发表了那么多声明，打倒、炮轰老一辈的革命家，就会不解，而把这当成“四人帮”反党活动的一部分。为此，我写了关于二月逆流的一些情况，供你们写材料时参考。关键是分清功与过。另外我以前写给你们如“与许维纲谈话纪要”，

这份材料还在否？这是一份非常有分量的材料：它从对立面方面证明我们保周、反林彪。关于如何反王关戚的问题，我估计老孙会把问题说清楚的。有什么要求及时来信。

我现在调到五车间工作。

宗式 79.9.4

附件：关于“二月逆流派”

若给我们扣上反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李先念等人，一定会找到许多材料的，如总部发表的声明，引发的材料等。这一些不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就会把我们保卫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动，说成是反对他们的。问题的关键是不能以当时声明表面文字而说我们是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下面，就“二月逆流”问题详细谈一下。

在67年1月以前农大曾反了一下谭震林。1月中，戚本禹出面保谭。农大的人写大标语“向谭震林请罪”。我校没有介入这件事。动态报由宗小荣和农口方面联系。这事后，学校搞军训，宗小荣离开动态组。她走后，动态报没有人和农口联系。3月8日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钢院919、石油学院北京公社等单位首先贴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标语。奇怪的是，没有农口的单位。当时师大的人解释“二月逆流”是指谭震林支持农口保守派夺权。动态组对此感到突然，我们及时向总部、校文革报告了情况，但没立即表态 ①对情况不了解 ②我们当时已经形成了反对潘吴的观点，而这一场反谭运动，首先是由他们开始的，我们存有戒心。动态组全力对这次运动进行调查，对农口各单位了解情况。从当时的情况看，找不到这样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谭的理由。我想到这是中央内部斗争所致。当时所能得到的消息：①传说中央开会谭震林反对中央文革（全部消息就这么多，怎么传来的都不清楚）。②王力在广播事业局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有人要代表老干部来讲话”。

师大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他们受后台的指示而动。我组的王铁良在农业部问师大驻农业部的负责人：“谭震林是谁？”答：“农业部长”（笑话）。问他：“你们揪谭震林的后台指的是谁？”答：“揪到谁是谁”。

在反谭的后面，就是要反周总理：反谭开始后不久，我们就从师大的内部了

解到他们下面的部署是反余秋里、李先念、李富春……最后反总理。我们感到事情重大，不能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走，迟迟不表态，为此总部受到下面人的压力，如二团、十六团就自行表态了。12日是个星期天，社会上反谭的呼声高，校内的压力大。我感到有必要讨论一下，就打电话给聂元梓，聂让办公室的人通知文革委员和总部委员到动态报开会。由于是星期天，又是临时通知，只来了十来人，聂元梓、侯汉清等，老孙没有到会。我先谈情况。关于农口问题，我说问题复杂。会议决定暂不表态，由我们继续调查。我说到师大下一步行动，并指明下一步他们要反对周总理时，聂说：“如果他们反对周总理，我们就坚决反击。”

当晚，戚本禹宣布收回他在一月份的保谭讲话。这样总部决定表态，并决定第二天上午全校会议上由我介绍情况。因为我的态度并不十分坚决，介绍时说了谭几句好话（引用戚在一月份保谭时的讲话），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没等我讲完，物理系三年级的一位同学就把我拉下来了，他自行煽动。至六月初，总部一共发表过六份关于农口的声明，其中有两份是我起草的。这六份声明中 ①坚决保卫周总理 ②支持农口的那些组织中，对农业部不表态，即不承认反谭那一派的革命的。尽管支持了其他单位的反谭派，但这一点是问题的关键，明眼人一看就清楚。③声明中当然有打倒谭震林的文字，但纵观全局能说我们是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吗！事实上，我们和农口保谭派的联系一直不断，主要事实如下：①农业部的人领取我们的动态报，就是说几乎天天来北大。我们的人经常去，主要是王铁良。②农业部的保谭干部左叶、李星、谢××三人来动态报，给作战部讲农口的十七年斗争，约在四月底或五月初。③五月初江一真和他的秘书来北大，讲了农口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向我们了解一些事。我讲了当时的反潘吴斗争④反潘吴的斗争在五月份形成高潮以后，江一真的秘书来北大，表示农口的组织（保谭派）也参加。我说“这一斗争复杂，可能出现波折，而你们的组织还没喘过气来，还是不参加为好。”⑤至少我为农口转过两份材料，一份是“516”集体关于谭震林问题而攻击总理的声明原件，时间是6月下旬，我们得到的第一张“516”的传单。二是农口收集到的“516”反革命传单手抄件20余份，并附有农口组织的标语。这两份材料，都转给了总理办公厅。⑥农口反谭派出秦化龙的叛徒问题（秦是反谭派的主要干部）我们在“新北大”上以简讯的形式报道了，给予支持。

在反谭后不久，师大、学部等接着就开始反余秋里、谷牧、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关于李富春问题，刘郢、洪涛大约是在三月十四日，在四个地方贴出“就统战民委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的大字报。我得到消息后，立即到外文楼，校文革在那里开会。老孙和李清崑出来接待我，我主张立即反击，老孙也说立即反击。李清崑说先看一看。这样没有组织队伍去反击。但是总部发表了声明，反对炮打总理和李富春。这份声明后来刊在《新北大》上。我前些时曾寄了一份去。师大等借反余秋里而达到反总理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对余秋里同志的问题，总理作了三次表态：“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每一次讲话以后，师大一伙立刻掀起三次批余高潮，或是贴大标语“余秋里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或是把广播车开到计委门口狂呼“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混蛋逻辑！”或是在地质学院开大会，洪涛在会上狂叫“谭震林和余秋里只不过是二月逆流中跳出来的哼哈二将。”

借陈毅问题也掀起了三次反总理的黑风（主要是北外刘令凯）。总部组织了三次大游行反对这股黑风，其他有些高校也组织了示威游行。北京市委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对这股黑风没放个屁。而小小的聂孙则组织了全市性的游行。

67年5月20日左右，我和交通部调查组20名同志去中南海见总理派驻交通部的联络员，我用半小时的时间谈“我们发现社会上反总理的集团，即潘吴……”

也是5月份，我和李仲谨到矿伏兆的家里，谈潘吴问题。矿指示他的秘书对我们的谈话作了记录。

在67年的上半年，二月逆流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当时社会上分成两大派——一派主张“炮轰”，即认为是内部矛盾。一派主张打倒，而把炮轰派说成是保守派。我们自己也落了个“二月逆流派”的别号。“二流公社”“二流文革”充满我们的耳朵。当时炮轰派的群众对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很有感情的，我自己到外事口、石油部去调查，那里的群众津津乐道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品质。现在如果单凭当时的声明上有“炮轰”字样就认为是“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群众的极大的污蔑。

“九大”以后，我见到了毛主席的讲话，也看到了谢富治的讲话，方知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为此，71年清查“516”时，我就保谭和保李富春同志的问

题作了检查。71年9月8日的全系大会上，迟群之流还批判我如何保二月逆流，是谭震林伸向北大的黑手。但是没过几天林彪摔死了，二月逆流问题也就不提了。但迟群之流又说我“不管是炮轰还是打倒，都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真叫不要脸的人才能说出不要脸的话。

×××给江青的一封信（节选）

说明：1968年8月，宣传队进校后重新组成了牛辉林专案组（由两派人员共同参与）。同年12月11日，宣传队召开全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将“牛辉林现行反革命集团”七名学生揪上台，并宣布了如下处理决定：牛辉林在隔离审查期间，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从严处理，给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徐运朴、王明德、屈长江、李怀进、牛泰升态度较好，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给群众批评，以观后效；王忠林抱有侥幸心理，不老实交代问题，暂缓处理，如再顽抗下去，就从严处理。但8341宣传队进校后，对牛辉林等人的问题做了“一风吹”的处理。这使很多人不能理解，于是，原专案组的一位成员于1970年1月28日夜给江青写信反映相关情况。以下是这封信的内容摘录。

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本校、外单位广大群众的揭发，王关戚反党集团的成员洪涛、刘郢、王恩宇、徐非光、……以及彭炎、阮波等人的交待，及牛辉林等八人的交待、互相揭发，大量的材料和事实都充分证明牛辉林等人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尤其是对江青同志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极其罪恶的人身攻击。……

可是，六九年四、五月份，宣传队对牛辉林等人作了重新处理，销毁材料给予平反，实际上是一风吹。我认为扩大化应该纠正，对牛辉林等人应该区别对待，但不能一风吹。

第一，在重新处理牛辉林等人时，我曾经向宣传队建议说：我们应该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事，要过细地做工作，重新调查研究，对过去整的材料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可是宣传队同志没有调查研究，就给牛辉林等人问题下了结论是一般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并以原材料中有派性，有水分为理由，以中央有指示不准保存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专案材料为理由，全部给烧掉了。

第二，宣传队同志叫我系师生讨论：提出处理牛辉林等人的意见（实际上宣传队的调子很清楚），同学们由于对专案情况不了解，意见很大。因此，宣传队领导小组就举办了参加专案的两派群众学习班，尽管宣传队同志怎样引导，学习班同志仍认为牛辉林等人不是一般议论，而是“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罪行，”并写成文字《关于牛辉林等人的处理意见》，尽管《意见》中已作了一些让步，但宣传队领导看了还不满意，另写了一个《平反决定》，认为“牛辉林等同志”“议论损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错误”。宣传队副总指挥刘增义还特地跑到法律系，假借学习班的名义向广大师生员工说：“牛辉林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牛辉林同志是一般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

迟群两次在我系全体师生大会上讲话，第一次他说：牛辉林等同志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犯了错误，但又说这是由于年轻人“思想起伏”；第二次，他虽然说牛辉林等人的错误是“对阶级的背叛”，但又说是由于年轻人“思潮起伏”。我想，青年人可能思潮起伏，但决不能思潮起伏去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牛辉林等人的“思潮起伏”，我认为是犯罪行为，是不允许的。

谁要是说牛辉林等人又恶毒攻击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就被扣上“派性发作”的帽子。宣传队同志多次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承认牛辉林等人只是一般议论而不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可是他们说不出任何正确理由。在一天晚上，军宣队员郭宏玉找我和另一个同学谈话，当我提到江青同志九·一指示及三·廿七指示时，郭宏玉说：“提起江青讲话那就不好说了吗！你们是怎么上报材料的？”（许多宣传队员都有类似的讲话），我当即义正词严的回答：“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她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她决不会偏听偏信，她的指示是正确的。”郭宏玉无言以对，只好说：“那牛辉林不是在检查里提到江青同志的批评吗？这么就行了吗！”最后郭宏玉对我说：“你自己想不通可以反映给我们领导，但不要在群众中散布，不要犯自由主义！”我想，既然郭宏玉你的讲话是真理，那为什么这样害怕群众呢？

牛辉林等人在《平反决定》公布之前一直不敢公开翻案，承认自己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只是在一些人的再三启发下，他们才敢否定自己的罪行，只承认一般议论。《平反决定》公布后，牛辉林等人一起非常猖狂地与一位搞专案的

解放军吵架；后来，宣传队还邀请我及其他一些同学去批判牛辉林，可是我一发言，牛辉林就叫嚷：“现在不是过去了，你还想整我？！”并非常嚣张地与其他同学吵；可是主持会议的宣传队同志一声不哼。后来，我们几个参加批判的同志都义愤地离开会场。

《平反决定》公布后，宣传队同志又找我们学习班的同志谈话，说：“要把《平反决定放在他们的档案里》，”并对我们说，这事要保密，不要让他们（指牛辉林等人）知道，让他们知道了，他们来闹就不好办了。我想，我们保卫毛主席光明正大，何必偷偷摸摸呢？我怀疑是欺骗我们。后来在整团中，牛泰昇在填写自我鉴定中提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宣传队同志看了，叫他不要写进去，把他抹去。不知道是为什么？

宋一秀给胡宗式的信 76.12.2

宗式同志：

七月二十四日来信，早已拜读，迟复为歉！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决策，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真是人心大快，军心大快。现在全国亿万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愤怒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北大广大革命师生也无不欢欣鼓舞，在校园里鞭炮齐鸣、锣鼓震天。我的孩子们也买了鞭炮，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北大曾经是毛主席抓的点，可是在“四人帮”及其爪牙迟群、谢静宜的直接控制下，几年来把北大糟蹋成不像样子。由毛主席抓的点演变为“四人帮”的黑据点，特别是“梁效”大批判组完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工具，是“四人帮”的伪中央办公厅。多年来“梁效”干尽了坏事，罄竹难书。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和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等人追随“四人帮”，也犯下了一系列的严重罪行。他们极力封锁、歪曲、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又是作报告，又是写文章，向周总理射出了一支支毒箭，在周总理逝世之后，他们还规定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不准戴黑纱白花。对此引起了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无比愤慨；他们整华国锋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在十月四日炮制的反党黑文《永

远按既定方针办》把矛头指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王张江姚“四人帮”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北大王、魏、李、郭等人是知道的，因为校常委徐凯等就曾扬言不久有重大事件发生，命令北大1500名民兵从10月2日到9日集中待命，等等。他们犯下的这一件件一桩桩的反革命罪行，是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我是学哲学的，我相信辩证法。想当初，“四人帮”及迟、谢两个跳梁小丑，何等猖狂，何等不可一世！今天却走向他们的反面，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昨天，北大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斗迟群大会。当初，这个小丑何等骄横，真是妄图一手遮天；现在，受到了革命群众牵制，成了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北大没有军管，只是市委派来一个联络组，组长是西城区委的一个副书记。联络组进校后，宣布魏银秋、李家宽、宋柏年（大批判组组长）办学习班，后来在群众强烈要求下也给郭宗林办了学习班，王连龙不主持工作。现在校党委工作由黄辛白主持，张学书、周培源等能站出来斗争。但北大阶级斗争的盖子远远没有揭开，甚至中央点到的重大事件如炮制《按既定方针办》的黑文的内幕至今没有揭开。因此，北大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停止不前，广大师生的革命积极性被压抑着。看来，关键在于市委的领导。对北大问题的严重性如何估计？揭盖子还是捂盖子？放手发动群众还是束缚群众手脚？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运动就深入不下去，阶级斗争盖子就无法揭开。对此，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都在思考、在议论。有的已出了署名的大字报，其中有我系郭罗基和我、夏剑彘等十五人写的《北大运动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致北京市委的公开信》，有历史系魏杞文等22人写的《北大运动的右倾——回顾与建议》，等等。

北大运动的形势是大好的，好就好在广大革命群众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坚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把北大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定能在北大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让我们共同庆祝历史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致革命敬礼

我仍住在老地方（佟丙八号），有机会来京，请来畅谈☑

宋一秀 76.12.2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